

جوڭگوت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 中國邊政

چۇڭخۇا خۇاڭخۇا سىياسىتى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十二月

220

## 本刊啟事

《中國邊政》季刊自 1963 年六月創刊以來，至今（2020）年已經 57 年近一甲子，所刊登有關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古往今來匈奴、鮮卑、肅慎、柔然、突厥、回紇、契丹、蒙古族、藏族、滿族、錫伯族、維吾爾族、各民族史事，尤以近年來對海外流亡藏人情況及新疆恐爆事件，均邀請專家學者，撰寫較詳盡且深入之專著，據悉頗獲好評。

《中國邊政》季刊自創刊號（1963・6）至 220 期（2019・12）共刊登約二千萬字，就純民間刊物而言，在台灣可說是為期最久之刊物，也是內容最豐富刊物之一。惟近年來台灣社會對大陸邊疆地區及邊疆少數民族之關注力稍遜於已往，國內並無任何大學開設有關於大陸邊疆地區或民族之課程，民間社團中也僅有《中國邊政》協會仍一本初衷致力邊疆方面之研究，及與大陸有關邊疆學術團體機構聯繫交流，多年來曾舉辦多場學術研討會，互相切磋，獲益良多。

近年來由於邀稿不易兼以物價上漲，原《中國邊政》係每季發行一期，茲經會議決定自 2020 年起改為半年刊，每年出刊兩期，雖然減少出刊，但仍本數十年來一貫原則，致力邊疆學術研究，特此奉告海內外對《中國邊政》刊物愛好者，另凡本協會會員如不再需要閱讀《中國邊政》刊物者，自 221 期起不再寄送，如仍需閱讀者，請於 **2020 年四月底以前**賜函本季刊（**主編劉學鈔，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 105 巷 10 號 4 樓**）仍繼續寄贈，特此奉告。

中國邊政雜誌社 敬啟

2019 年 12 月

# 目 錄

從媒體報導看新疆情勢 .....	劉學鈺	1
從九世班禪呼畢勒罕之尋覓看噶廈公所之狡黠 .....	孟 鴻	29
錫伯族作為翻譯民族的回顧與前瞻 .....	張華克	73
維吾爾族的節日 .....	編輯部	99
中國邊政協會 2019 學術交流之旅側記 .....	熊映美	103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五） .....	華 華	109
本協會處理林遙鵬副秘書長治喪事宜二次臨時會議紀錄 .....	編輯部	115
稿 約 .....		117

本協會前秘書長劉學鈞教授（蒙藏委員會前委員兼主任秘書）新著《台灣的邊政研究 70 年》一書已由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949-0172。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民族所共建而成，基此，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語文、地理、習俗、宗教信仰、傳統政治制度……無一不是中國歷史、政治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臺近七十年，有關臺灣的邊政研究及蒙藏委員會之重要措施與裁撤始末，極有必要加以「盤點」。作者將此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敘述近七十年來臺灣的邊政研究，包括研究人員及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民族、蒙古族、藏族來臺同胞，政府及民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成果。下卷則專述蒙藏委員會，包括設立意義與沿革、播遷來台初期措施、歷任委員長任內重要措施、裁撤之經過，與鮮為人知之事件，供後人了解七十年來，臺灣在邊政研究與邊政措施並未缺席。



本協會前秘書長劉學鈞所著《歷史原來是這樣》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627-7749。

歷史是什麼？廣義是過去發生的事，狹義是經過後人篩選過濾的事。現代人要了解歷史必須透過先人留下來的各種史書，歷史是人寫的，寫歷史的史官總會有既定的政治立場，很多主流的歷史說法也不一定是歷史真正的原貌。還原歷史真相，從不同的角度看歷史，也許會發現，我們曾經以為很熟悉的歷史會是如此的陌生。

本書包含以下十個主題：

- 一、北魏後宮多高句麗女子。
- 二、花木蘭其人、其詩、其事。
- 三、掀開五胡十六國序幕的匈奴劉淵。
- 四、北魏洛陽的靈異事件與西域胡僧。
- 五、幾個末代皇帝事蹟。
- 六、成吉思汗的霸業、容貌與陵寢。
- 七、隋、唐先世多胡化。
- 八、五世達賴喇嘛、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
- 九、匈牙利是匈奴的後裔？
- 十、稗官野史中的武則天。

作者根據史料旁徵博引、交叉比對，加上本身專業的經驗與研究的修為，引領大家進入塵封已久的歷史禁地，窺探古代那些不為人知的傳奇軼事，帶給你聞所未聞的閱讀享受，看得過癮、讀得暢快－歷史原來是這樣。



# 從媒體報導看新疆情勢 2019.1.1.~2019.9.30

劉學鈞

前輔仁大學兼任教授、前清雲科大中亞所教授

## 摘 要

新疆古稱西域，位處亞洲心臟地帶，其地緣政治地位至為重要，自清乾隆二十五年正式將之納入中國清朝版圖至今已有兩百六十年之久（美國立國尚不足兩個半世紀），但始終有諸多動亂事件，尤以近一、二十年爆動恐攻事件發生率相當頻繁，在美、日、歐刻意渲染下，將新疆恐爆事件刻意放大，揆其目的是要分化、裂解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不指某一朝代或某政權，以下皆同，不另加注），惟近三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並未發生爆動恐攻事件（至少未見到媒體報導），而美、日、歐意圖分化，裂解中國者，又別出心裁，宣稱中共在新疆推行集中營，或再教育營，（中共則稱之為職訓所），大事評擊，台灣媒體也多據外媒報導加以刊載，本文擬就 2019 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有關媒體報導新疆消息，分析新疆情勢。

**關鍵詞：**新疆，新疆再教育營，職業技能培訓中心

## 一、簡述新疆地理與民族

新疆古稱西域，而西域有狹、廣二義，狹義之西域僅指天山南北兩大盆地；廣義之西域，則除天山南北兩大盆地外，兼指今中亞地區、甚至更西之地區。狹義之西域，即今新疆，其名稱之由來，係清乾時剿滅準噶爾

之亂，隨後進入天山以南敕平回亂，遂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將天山南北全境納入中國清朝版圖，而名之曰「新疆」，稍早，稱天山以北為準部，天山以南為回部總稱之為西域。

新疆位處亞洲大陸心臟地帶，面積約有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東北以阿爾泰山與外蒙古相鄰，西北以塔爾巴哈台山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為界，西南以天山南脈與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相接，以帕米爾與阿富汗、巴基斯坦為界，以喀喇崑崙山與印度為界；以崑崙山與西藏自治區相鄰，東連甘肅、青海。自治區內以天山為界，其北為準噶爾盆地，其南為塔里木盆地。全自治區行政區劃為：四個地級市、五個地區，五個自治州、十三個市轄區、二十四個縣級市、六十二個縣、六個自治縣。另有自治區直轄縣級行政單位：石河子、五家渠市、阿拉爾市、圖木舒克市、北屯市、鐵門市、雙河市、可可達拉市、昆玉市（係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建置）<sup>1</sup>。

至於新疆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元民族聚居地區，在西元六世紀突厥汗國崛起，占有天山南北乃至今中亞地區以前，整個廣狹義的西域各綠洲的世居民族，都是高加索種（即習稱之白種人）操印歐語系吐火羅的各民族<sup>2</sup>，而突厥或回紇都屬於蒙古利亞種（即習稱之黃種人），稱新疆或西域為突厥或維吾爾族的原鄉，純為無稽之說。

西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為遂其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必須「斷匈奴右臂」，遂派張騫鑿空西域之舉，張騫雖未能完成與大月氏結盟，形成東西夾擊匈奴之大戰略，蓋其時大月氏已西徙今中亞兩河流域人民安居樂業，不願再與匈奴發生戰爭，張騫又向漢武帝建議，可與駐牧於今伊犁河一帶之烏孫結盟，漢武帝採其議，先後以細君、解憂兩公主嫁烏孫昆莫（其意為王），無論大月氏或烏孫與西域早住民族均係同源異流之民族，換言之，無論月氏或烏孫也都是高加索種民族，西漢武帝以細君、解憂兩公主嫁烏孫王，隨同前往之漢人（指漢朝之人，其時尚無漢

<sup>1</sup> 見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編《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2017 年，頁 4。

<sup>2</sup> 關於西域早住民族為操印歐語之白種人，可參見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藍琪《稱雄中亞的古代游牧民族》榮新江等主編《粟特人在中國》、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中國西部考古記、吐火羅語考》，王欣《吐火羅史研究》等書。

人之稱謂）婢僕、侍衛、各種工匠有數百人之多，烏孫王為之別立營地以居公主及隨同前往之漢人，此等漢人最後自然融入烏孫民族之中，漢朝之人是黃種人，可見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已有黃種的漢人進入今新疆地區。之後，兩漢經營西域實行屯戍戍邊，更有大量漢人長住今新疆地區。

及至西元四世紀初，中國北方諸胡族如：匈奴、羯、鮮卑、氐、羌、盧水胡、翟……等胡族，紛紛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其中也有部分進入西域，在這些胡族北方大漠以北的柔然，高車（即較勒，或作鐵勒）更是威震西域，而高車汗國更立國於天山以北，其後，突厥族猛然崛起，建立東西兩大汗國，整個狹廣義之西域，都納入突厥汗國統治之下，突厥語自此成為整個西域的「普通話」，及至中國唐朝建立，先後擊破東、西突厥汗國，整個西域籠罩在大唐帝國聲威之下，自然而然有許多唐朝之人前往西域，相傳有「詩仙」之稱的李白就誕生於今中亞吉爾吉思斯坦的托克瑪克（唐時為碎葉），西元九世紀中葉，雄踞大漠南北的回紇汗國為黠戛斯（即元時之吉利吉思，今之吉爾吉斯）所擊破，回紇之眾或向南逃入中國唐朝境內，最後融入中國漢人之中，或向西奔，進入甘州者，臣服於吐蕃帝國，稱甘州回紇；進入高昌者（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稱高昌回紇，又以唐太宗時攻滅鞠氏高昌，將之設為西州，故又稱西州回紇，此部回紇部分進入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沿各綠洲，與當地早住民族相混融，形成後日之維吾爾族，更有龐特勤一支進入今中亞地區，建立喀喇罕汗國<sup>3</sup>，及至蒙古崛起，鐵騎所至無堅不摧，廣狹義之西域，都臣服於蒙古鐵騎之下，從此蒙古族進入新疆與中亞分別建有窩闊台汗國與察哈台汗國，其後以窩闊台入承大蒙古國大汗，原窩闊台汗領地（今新疆地區），逐漸被察哈台汗國所侵佔，但察哈台汗國很快改宗伊斯蘭教，並改操突厥語，並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西汗國被帖木耳所篡，稱帖木耳帝國，一時聲勢之盛，不亞於成吉思汗；東汗國則漸次蛻化為葉兒羌汗國。

按元朝退出大都後（大都即今北京）元朝雖未滅亡，但力量已大不如

---

<sup>3</sup> 關於喀喇罕汗國或王朝之創建者，有維吾爾說，土庫曼說，樣磨說，葛邏祿說，葛邏祿、樣磨說，處月說，突厥說等諸多說法，但此處採魏良弢維吾爾說，詳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7~50。



前，其時非蒙古本支之衛拉特蒙古崛起<sup>4</sup>，聲勢駕凌蒙古本支之上，明末時衛拉特四部之中，以準噶爾最為強大，各部為爭奪草場，和碩特部遷往寧夏阿拉善及青海，土爾扈特部向西遷往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駐牧，今新疆天山以北全為準噶爾部所有（杜爾伯特駐牧於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清康熙時（1662～1722 年在位），準噶爾部首長噶爾丹受西藏喇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教唆，率鐵騎三萬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汗不敵，向南逃入中國清朝境內漠南蒙古錫林郭勒盟北境的達里崗崖牧場<sup>5</sup>，清康熙予以濟助，並允諾來年將親征準噶爾，奪回漠北，讓喀爾喀得以重返故土，次年康熙御駕親征，果將噶爾丹逐出漠北，三汗及其人民乃得重回漠北，再次年（康熙三十年，西元 1691 年），康熙刻意在靠近漠北之多倫諾爾舉行會盟比丁大會（類似當代之閱兵大典），邀漠北蒙古三汗南下觀禮，意在耀武揚威，宣示中國清朝之強盛壯，漠北蒙古三汗目睹清朝強大兵力，又有恩於已，且擔心準噶爾仍會捲土重來，乃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表示願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盟旗，納入中國清朝版圖，但保留三汗名號，康熙自是應允，漠北蒙古從此成為中國領土，並以大漠為界，在漠北者稱外蒙古，在漠南者稱內蒙古，明載於《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之中（《大清會典》類清朝之六法全書），雖將準噶爾逐出漠北，但噶爾丹休養生息之後，復又捲土重來，康熙又兩度親征，噶爾丹終在兵敗之餘，困病而死<sup>6</sup>，但其後嗣者，仍然經常擾邊，成為清朝之邊患，終於在乾隆二十二年（西元 1757 年）徹底剿滅準噶爾，斬殺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sup>7</sup>，由是天山以北已無蒙古蹤跡。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原西陲裏海北境之土爾扈特部蒙古因不

<sup>4</sup> 其原本即為蒙古者稱黑韃靼，也即蒙古本支，如孛爾濟錦部，泰亦赤兀部等，其原非蒙古，被征服後歸入蒙古者，稱野韃靼、白韃靼，即所為蒙古別支，稱衛拉特，明時稱瓦喇，清時稱額魯特，或作厄魯特，有土爾扈特、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此部為蒙古本支），附以輝特，明末以後，以準噶爾部為最強。

<sup>5</sup> 達里崗崖直屬清內廷，供應宮廷所需馬匹、牛、羊肉。

<sup>6</sup> 清代官文書均指噶爾丹因兵敗走投無路而仰藥自盡，如魏源《聖武紀》即作此說，溫達《親征朔漠方略》也作此說，但呂一燃《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噶爾丹服毒自殺辨偽》，考定噶爾丹乃得病而死，並認《康熙實錄》纂改為飲藥自盡，另俄人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也作因病而死。按噶爾丹曾到西藏為喇嘛，依佛教教義，自殺者永世不得超生，是以仰藥自殺之說，似不可信。

<sup>7</sup> 見魏源《乾隆蕩平準部紀》，列《聖武紀》卷四。

堪俄羅斯之強徵暴斂，又得知準噶爾部已被中國清朝剿滅，天山北部空虛，乃決定東返土，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蒙古族，即為重返故土之土爾扈特蒙古。又當清廷剿滅準噶爾部蒙古後，有頗多哈薩克族自中亞東徙新疆北部，形成當地的世居民族。綜上所述，可知新疆地區自古以來民族複雜情形，同時也說明「人」或「民族」都只是土地的過客，任何人或民族，來到世界時，從不曾帶來寸土尺地，連一顆泥沙都不曾帶來，說某地屬於某人或某民族，都是河漢之言，無稽之說，人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永不屬於人。

## 二、近代新疆政治概況

民國肇建之初，新疆即由地方軍閥所把持，雖仍宣稱新疆為中國領土，但並不接受中央指揮，形同地方割據，在 1944 年以前，先後由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統治新疆，茲將此三人統治新疆時所發生重要政治事件酌以標題式列出，至於較詳細情形，可參見劉學洵所著《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一書（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茲分別列出如次：

### （一）楊增新統治時期（1912~1928 年）

1. 哈密維族反回王事件
2. 敕平哥老會事件
3. 伊犁革命黨人鬥爭事件
4. 外蒙古入侵阿爾泰事件
5. 俄國白黨三路大軍入新事件
6. 重視伊斯蘭教，但慎選阿訇，禁止聚眾在家誦經，私立教派、私立門戶。
7. 禁止泛伊斯蘭主義在新疆傳播。

### （二）金樹仁主新時期（1928~1933 年）

1. 向南京國民政府獻羊脂玉獲省主席兼督辦名銜
2. 擴編軍隊鎮壓異己
3. 改土歸流激起民變
4. 隔閡民族禁止互貿
5. 放任經文學堂管理，雙泛思想趁虛而入

6.財金措施雜亂無章。

(三)盛世才主新時期（1933～1944 年）

- 1.全面親蘇
- 2.改善財經措施
- 3.發展屯墾
- 4.設立學校
- 5.反俄清共
- 6.消滅東突「建國」

自民國肇建以來，以至抗戰期間，無論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中央，對新疆都未曾實質統治，此實因中央雖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到了抗戰後期，情況已有所改變，日本攻勢已呈強弩之末，似已看到勝利曙光，因此開始注意新疆問題，如密切注意新疆動態，由蒙藏委員會在甘肅省肅州設立天山組，收集新疆政治、軍事、經濟、涉外等各方面資訊，然後詳加研析，雖然新疆於清光緒十年（1884 年）建省，在形式上與內地各省無異，但新疆民族多元、宗教信仰、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在在均與地各省迥異，在中央並無主管機關，因此有關新疆事物多委由蒙藏委員會辦理，即使晚到 1990 年代，行政院孫運璿院長於視察蒙藏委員會時，仍口頭指示由蒙藏委員會代辦有關在台及海外新疆各民族事務，可惜當時會內一、二蒙籍高階職員反對，而未能落實孫運璿院長指示。可見國民政府確實有意要將納入中央直接管轄，由是積極遊說馬步芳，要他讓出河西走廊，由國軍胡宗南部隊進駐河西，駐紮肅州（即甘肅省酒泉市），以李鐵軍為河西警備司令，占據未來出兵新疆有利的戰略地位<sup>8</sup>，國民政府此一連串措施，對盛世才而言，自然形成莫大威脅。

此外，從國際情勢看，德蘇戰爭爆發後，蘇軍節節失利，而且無從預測德蘇戰爭何時可以結束，況且縱然最後蘇聯獲勝，也必然是慘勝局面，且欲振乏力，蘇聯已不再是盛世才有力的靠山，新疆地域雖然廣袤，但人口稀少，漢人在新疆的人口尚不及全疆百分之十，且經濟落後，蘇聯既不

---

<sup>8</sup> 參見秦孝儀主編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戰時建設》（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出版，1988 年，頁 173～174。

可恃，而中央抗戰則是已現勝利曙光，是則新疆未來再事割據之空間已然縮小，回歸中央乃成必然之趨勢，當時國民政府派駐蘇聯武官郭德全已看出盛世才有回歸中央之意，並向國民政府報告<sup>9</sup>，據此，蔣介石曾三度召見新疆駐京（重慶）辦事處主任張元夫有所垂詢，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國民黨要員唐縱約晤張元夫時，特別問及盛世才與中共的關係時，張元夫答以：「決非同一路線」，因此唐縱建議中央應與新疆多作溝通<sup>10</sup>，與此同時盛世才也派其五弟盛世驥，以新疆督辦公署邊務處副處長名義，到重慶見蔣介石，負責向蔣報告新疆與蘇聯的關係，據稱蔣介石見到盛世驥後，第一句話就是：「過去中央與盛督辦的誤會，都是汪精衛搞出來的。」<sup>11</sup>當然這句話是給雙方的下台階，彼此都心知肚明，但都不予戳破，當時蔣宋美齡也在場，盛世驥除報告當前新疆情況與蘇聯之野心外，更提出新疆事務極為難作，並告以盛世才有意辭去新疆邊防督辦兼省主席之意，其所以會提出，請辭之舉，顯然意在探測中央對他的信任度，與清初吳三桂之辭藩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但蔣介石何等人物，豈會見獵心喜，而輕易上當，遂應之曰：「你告訴你家老兄，他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現在國家有難，不能因為自己的困難而放棄，誰都不做這困難的事，這個國家不就完了嗎？」<sup>12</sup>時為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由是新疆與中央關係立即冰融雪化。

同年七月初，中央派與盛世才有私交公誼之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往迪化，與盛世才作進一步之接觸，盛世才鑒於主客情勢已不利於他，於是順風轉舵，表示今後「誓以至誠擁護鈞座（指蔣介石）與國民黨之領導，效忠黨國。」<sup>13</sup>有了此項承諾，國民政府遂於同年八月由蔣介石親自坐鎮甘肅蘭州，更西至嘉峪關，同時派蔣宋美齡於八月二十九日前往迪

<sup>9</sup> 按郭德全赴莫斯科時途經迪化（今烏魯木齊）時，盛世才熱情接待，並表示尊重蔣介石，郭氏到莫斯科後，將此情況電知國民政府，稱盛世才可能改變立場，見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82。

<sup>10</sup>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羣眾出版社，1991年，頁279，但此處係轉引自黃建華前揭書，頁67。

<sup>11</sup> 見盛世驥《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家盛世才》，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年頁176。

<sup>12</sup> 見盛世驥前揭書頁76。

<sup>13</sup> 見黃建華前揭書頁68。

化，向盛世才轉達中央四項指示<sup>14</sup>，盛世才表示完全接受，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sup>15</sup>自此新疆回歸中央已成定局。之後盛世才開始驅逐在新疆之蘇聯駐軍及清除在新疆之中共人員，不久，中央發表盛世才為農林部長，中央以朱紹良暫行代理新疆省主席，朱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到任，未幾，中央即任命時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仍兼委員表），吳氏到任後，新疆哈、維少數異議份子在外力蠱惑、教唆下，醞釀發動所謂「三區革命」從此以至中共建政、新疆處於動盪不安情勢中。

### 三、「三區革命」

談「東突建國事件」或「三區革命」，必須對「雙泛」主義酌予敘述，所謂「雙泛」主義是指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教主義，「泛突厥主義」源於突厥學，十九世紀末（1889年）俄國考古學會東西北利亞分會組織以雅德林樂夫（N. M. Yadrtssev）為首之考察隊，在今外蒙古土拉河、額爾渾河一帶進行考古，他們認為古回紇汗國汗庭哈拉巴喇哈孫及蒙古帝國汗庭哈拉和林，應該都在此一地帶，最後在額爾渾河之和碩柴達木（Koshotsaidam）河畔發現了轟動學術界之《闕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sup>16</sup>，從此學界對古突厥文展開研究，所謂「突厥學」於焉誕生，原本目的極為單純只是研究古突厥文，充其量兼及古突厥語，如此而已，作為一個學科領域，其基礎並不堅實，但波斯人、阿拉伯人又將突厥族與操突厥語之各民族結合起來，意圖在各個操突厥語的民族中，去強行尋找具歷史、文化的共同點，然後將之稱為「泛突厥族」，此即所謂「泛突厥主義」。但吾人應知語言只是區別民族諸多要件之一，不能僅憑語言一項來認定其民族歸屬，如今日北美洲數千萬黑人，均操英語，吾人豈可認定其為盎格魯薩克遜族？上述泛突厥族的說法，只是憑語言的研究，完全忽略

<sup>14</sup> 詳見馬大正等者《新疆史鑒》，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98～99。

<sup>15</sup> 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台灣蘭溪出版社，1982年，頁4907～4908。

<sup>16</sup> 關於此二碑之建立及當時中國唐朝曾派人參與建碑經過，如舊《唐書》卷一九四稱：「闕特勒死（勒，應為勤之誤），（玄宗）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璽書吊祭，並為立碑，上（指玄宗）自為碑文……」而《闕特勤碑》南面第十二行也提到此事，闕放古突厥文碑之解讀，可參見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一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

了歷史學研究、民於源流考證、民族融合過程，有違科學實證原則，結果導致突厥外延的無限擴大，模糊了突厥史研究範圍<sup>17</sup>，因此「泛突厥主義」只是個內涵模糊不清的泛政治口號。當初之所以出現此一口號，其目的是為對抗泛斯拉夫主義，其後各操突厥語的不同民族，忘卻自身的民族歷史源流，沈溺在「泛突厥」虛幻漩渦而不自知。

至於「泛伊斯蘭主義」。顧名思義就是指凡信仰伊斯蘭教的所有民族、國家團結一致成為一個國家，強調「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泛伊斯蘭主義」創始者為阿富汗人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理論說得好聽，現實卻完全做不到，試看阿富汗本身部落林立，雖然都是穆斯林，彼此卻是誰也不服誰，至今神學士與阿富汗政府仍處於對立之中，再看前此伊拉克攻滅科威特，而今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彼此視對方為寇仇，所謂「天下穆民是一家」，只是宗教口號而已。當初之所以有「泛伊斯蘭主義」之提出，是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提出此一思想，作為被壓迫者情緒的出口，但卻對上正走向頹勢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者的心思<sup>18</sup>，等同為其垂危的帝國注入一劑強心針，因而大力提倡，要把「天下穆民」納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旗下，作為與歐洲帝國主義者一搏的資本，因此所謂「泛伊斯蘭主義」本義本身就不切實際，也只是個虛幻的口號。

當「雙泛主義」向新疆輸入時，極少數野心分子，為這兩個華而不實虛幻口號所迷惑，而英、俄刻意加以利用，蠱惑新疆境內野心分子從事所謂「東突建國」活動，由於盛世才驅逐蘇聯在新疆之駐軍及清除中共在新疆人員，於蘇聯慫恿新疆哈、維異議及野心分子，從事疆獨活動，吳忠信入新履新時，此一活動即已開始，以其發生於伊犁、塔城及阿勒泰三地區，故一般文獻稱之為「三區革命」，其實是受蘇聯操控之叛亂組織，稱「三區革命」甚為不宜。

三區發動叛亂時，對在三區新遷入之內地漢人，幾乎盡行殺戮，事變之後，新疆省主席吳忠信曾命維族塔里海提、錫伯族之廣祿及漢人劉秉義等三人，將事變經過情作一書面報告，在此項報告缺其十二頁<sup>19</sup>，所缺

<sup>17</sup> 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2年，頁23。

<sup>18</sup> 見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

<sup>19</sup> 見《吳忠信主新日記》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頁674~692，其中缺十二頁。

者很可能是敘述伊犁事變時之殺戮情形，按吳忠信日記係交由其親信周昆田（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保管，原預計在台出版，後周氏為人極為謹慎，或許認為其中有若干部份尚不宜公開，以故未在台版，其後將日記交還吳氏哲嗣，最後在甘肅以影印方式出版，所缺之十二頁，可能周昆田先生認為民族間之殺戮事件不宜流傳而予以刪除，當然此僅為推測而已，但願未來能發現所缺之十二頁。

吳忠信在新疆無法解決「三區」之亂，之後由張治中接任新疆省主席，張治中不斷與三區叛亂分子展開談判，也不斷妥協，但三區叛亂分子寸步不讓，幾度協商均無結果，及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二日始達成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條款，此條款主要內容大致為：

「中央給地方各項民族權利和自由；改組省政府，擴大委員至二十五人，其中中央派委員十人，地方保舉十人，准予組織民族部隊。」

上項條款前兩項關於民族權利，自由及省府委員人數及分配，尚稱合理，末項准予組織民族部隊，等於將三區叛亂武力合法化，或許張自忠在當時居於劣勢情況下（國共內戰方殷，抽調不出兵力入疆支援），不得不同意此一條款，同年三月一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屆二中全會，張治中在全會中提出《關於新疆問題報告》，扼要報告與三區代表談判情形，同時並說：

「新疆人民在歷史上備受統治者的高壓，人民必然起來反抗。因此，要伸出友愛之手，全力援助他們。維、哈、回、克、蒙諸族人民身材俊秀，健康活潑，極重清潔衛生，這些方面是漢人所不及的。新疆諸族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他們的文化落後，是統治者造成的，不是他們的責任。新疆突出的問題是水利和交通，中央政府應該大力投資，興修水利，開發礦產，迅修建南疆鐵路。只要以建全的政治力重來安定新疆，新疆一定能安定；以充分的經濟力量來建設新疆，新疆一定可以建設成功。能夠這樣做，新疆當然永遠是中國的領土，新疆各

族人民當然永遠是中國的人民。」<sup>20</sup>

張治中這一段話，贏得不少掌聲，不過張治中說「他們（指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落後。」這句話有語病，按所謂「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出全部物質財富和精財富，尤特指社會意識形態<sup>21</sup>，因此「文化」偏重於生活方式、思維邏輯（也即精神財富）；物質創製是為文明，不同的文明，可以此較其先進或落後，不同的文化，則不能比較其優劣。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兩者是不同的，不過許多人都將之混淆，甚至有些人會說某一民族沒有文化，試問古往今來可有一個民族沒有「生活方式、思維邏輯」？不過有太多人（包括一些學者）混文明與文化為一事，張治中有此誤認，不足為病，此處之所以提出，只是強調維、哈……各族生活方式、思維邏輯並不落後，只是物質建設落後。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張治中以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身分三度到迪化，次日即接見三區代表，三區代表要求將伊犁事變後調入新疆之國軍撤出，更要求地方民族軍擴編為十個騎兵團及三個步兵團，駐防地區也要求由原來的三區擴大為七區，這與原來擬定之二個騎兵團及三個保安隊出入太大。使協商無法繼續。其後蘇聯駐新總領事業謝也夫斡旋之下，才繼續進行協商，從而可見三區幕後確由蘇聯操控。

之後又經過九次正式會談，及無數次非正式會談，最後張治中以建請中央另派年輕者來新談判<sup>22</sup>，才迫使三區代表態度稍為軟化，結果在雙方都讓步情況下，達成協議，組成新的聯合省政府，在新聯合省府中，三區成了最大贏家。

新疆省政府改組，張冷中推舉麥斯武德出任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為親英之疆獨分子，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在英國支持下，新疆首次出現「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事件，麥斯武德即曾介入其中，此時（民國三十六年）以之為新疆省主席，自然與由蘇聯幕後操控的三區人士無法合作，新疆依然動蕩不安，局勢較前更為嚴峻，又在張治中主導下，於民國三十七年底撤換麥斯武德，而以包爾漢為新疆省主席。此時國共內爭已近尾聲，

<sup>20</sup> 見陳伍國、劉向暉《新疆往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頁71。

<sup>21</sup> 見劉學鈔《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出版社，2005年，頁

<sup>22</sup> 見注20所引書頁72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已成定局，中共建政已指日可待，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邀請三區代表出席即將在北京（此時中共已將北平更名為北京）加開之「新政治協商會議」，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區代表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列里汗四人以及新疆民主革命黨迪化區委員會（即「戰鬥社」負責人羅志等五人，自伊犁出發，繞道蘇聯前往北京，八月二十七日，阿合買提江一行搭乘飛機飛經伊爾庫茨克外貝加爾湖上空時，飛機失事，阿合買提江一行五人亡身異域，因此中共另行邀請賽福鼎、艾則孜、阿里木汗、哈肯木巴耶夫及新疆戰鬥社成員涂治等三人前往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此項會議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召開，賽福鼎被選為主席團之一，渠在大會中發言稱：

「新疆人民在和平戰爭的環境中，很關切地期待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後勝利的來臨。新疆人民和中國境內其他人民同樣堅定了他們將來要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的信心和希望，而高興地派出代表前參加解決整個國家的政治組等問題的這一人民政治協商會，這是新疆人民很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sup>23</sup>

至是「三區革命」可說是宣告落幕，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中共所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了「三區革命」的問題，其實幕後真正原因是蘇聯透過《雅爾達密約》，壓迫中華民國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所謂外蒙古現狀，就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中華民國為推卸喪失國土的歷史責任，以狗尾續貂方式、在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並於 1946 年一月五日，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如願以償得到外蒙古以為附庸，但其時國共內爭，國民政府尚有相當實力，因此仍想在新疆製造問題，其後中共在內戰中節節取得勝利，為拉攏中共，始對新疆問題鬆手。

#### 四、中共入新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國共內戰期間，雙方都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當時國民政府在新疆的軍隊，是由陶峙岳所率領，據傳約有十萬人，民國三十八年春後，國民政

<sup>23</sup> 見注 14 所引書頁 115。

府已是日薄西山，幾到無兵可用之窘境，想到新疆陶峙岳手中還握有十萬大軍，便想將之調入內地投入國共內戰，而此時新疆省政府內高層人員上自省主席包爾漢以至劉孟純、屈武、劉澤榮等，心中各有盤算，已非國民政府所能指揮，而張治中於國民政府派其到北京與中共進行和談時降共，張治中與陶峙岳既是軍校前後期同學，張又曾是陶的長官（張任西北行營主任，陶為副主任兼新疆警備司令），兩人公私交誼深厚，中共中央毛澤東要張治中當告陶峙岳說：「人民解放軍已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兩路進軍新疆，大軍一到，玉石俱焚，我希望你能去電，告訴他們和平起義是最好的出路。」時為 1949 年九月八日，毛隨即又說：「那個陶峙岳是你的老同學，關係很好，又是你的部下，包爾漢也是你提拔的，相交匪淺；只要你去電，他們要照辦的。」<sup>24</sup>張治中自是照辦，電報拍出後，一、兩天內，陶峙岳就派員與彭德懷有所接觸，至 1949 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新疆駐軍、新疆省政府先後通電「起義」<sup>25</sup>，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由王震率一兵團二十六軍向新疆抵進，抵達迪化，十二月七日三區民族軍與解放軍會師迪化，同月三十日，中共宣布將原國軍陶峙岳所部改編為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以陶峙岳為兵團司令員，王震為政治委員，新疆至此完全「解放」，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

中共順利建立政權，並擁有整個大陸及海南島，進入新疆的部隊為中共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第一、第二軍，這支部隊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八路軍」，連同「起義」降共的陶峙岳部隊，再加上新疆「三區革命」時的「民族軍」，其人數已然相當可觀，新疆不需要這麼多軍隊，尤其陶峙岳的部隊，「忠誠度」可疑，如果讓他們繼續留在解放軍中，等於在解放軍中放下不定時炸彈，何時會爆炸，根本無從預測，如界將之解甲各自返回家鄉，等於把這些不定時炸彈散布到各省，一旦情勢不穩，很可能遍地開花，如何處置陶峙岳部隊，一定曾經困擾當時的中共高層；至於三區革命時的民族軍，當其發動叛亂時，中共在內戰中尚未取得絕對優勢，因此凡對向國民政府奪權的任何團體，都會給予支持，也因此

<sup>24</sup> 見陳伍國、劉向暉前揭書頁 80

<sup>25</sup> 該電全文見新疆社科院歷史所編《新疆簡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三冊，頁 525~526。

對三區革命的維、哈……各民族組成的民族軍，都視之為是「進步」的，而三區革命基本上是蘇聯在幕後操控，「雙泛主義」為其潛意識，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則是目的，中共既已進新疆，並正式建政，當然不會容許雙泛分子存在，因此如解散民族軍，等於讓雙泛分子遍佈全疆各地，這絕非中共當局所願見到者，如何讓陶峙岳部隊及民族軍解甲而不歸田，將是解決問題之重點。

按中國自西漢派張騫鑿空西域，之後與烏孫結盟，以東西夾擊方式攻打匈奴，終將戰勝匈奴，西漢聲威及於西域（今新疆），派西域都護長駐西域，以屯田戍邊方式宣達漢家聲威，其後歷朝歷代，如聲威能及於西域者，均實行屯田戍邊之策，自西漢至清代歷時近二千年，但始終無法化西域為內地，揆其原因，實由於歷代之於西域，一旦戍邊任務結束（也即中原王朝勢力退出西域），屯田戍卒也隨之撤回內地，始終未在西域安戶定居立足生根，因此西域始終仍是中國的邊陲地區，如何化新疆為內地，必須有足夠的內地人口長住新疆經過數十百年之後，新疆自然會如同內地，本文前面說過人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不屬於人。因此將陶峙岳部隊或入疆的中共解放軍一律留在新疆除保留一部分仍推持武裝以守禦邊防外，其餘一律留在新疆，放下武器，改拿農具或其他生產工具，從事生產建設工作，至於民族軍也編入生產工作，以免他們竄往各地散佈雙泛思想，此一作法既符合歷史狀況，也適應當時現實需要，更為未來塑造國族意識奠基，此應為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理論基礎。

前文提到中共入新之後，在新疆的部隊有三股：陶峙岳所部約有十萬人；入新中共解放軍王震所率之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一、二軍也可能有十萬人；三區革命所組成的民族軍，當初國民政府曾正式編組為地方民族軍，並給予一萬五千人的補給，但據稱實際人數有八萬人之多，中共建政後初期將之編為第五軍，軍長為朱龍·塔伊波夫，並任之為新疆軍區副參謀長，人數更增加為十餘萬人<sup>26</sup>，此一數字可能失之誇大。陶峙岳部隊成員都是從內地徵集的青年，在新疆無親無故，既命令其留在新疆從事生產建設工作，雖未必心甘情願，但也只能接受；中共解放軍原本服從性就

<sup>26</sup> 見劉學鈺《流亡海外維、哈各族近況》一文，該文刊登於《中國邊政》季刊第 78 期，頁 45～47，中國邊政協會，1982 年六月出刊。

高，留在新疆或仍執干戈以衛戍新疆或放武器改拿農具，都不會有多大問題；唯獨民族軍問題重重，他們是新疆的土著民族，對地方既熟悉，語言，宗教信仰均無障礙，而他們原非軍人，只因受雙泛思想之迷惑，幻想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而組成「民族軍」無論軍紀或服從性均差，中共將之編入生產建設行列，與其參軍之目的，有頗大的落差，很難適應有嚴格紀律管理的生產建設工作，所以當中、俄共發生路線爭執時，在蘇聯蠱惑、誘煽下，攜家帶眷集體逃往蘇聯哈薩克境內，蘇聯將之集中在阿拉木圖一帶，1980 年代；據說已有幾十萬人，曾透過特殊管道向台灣方面取得聯繫，但國民黨當局未加理採，遂不了了之，此是一段小插曲，順便一提，這或許是後來新疆生建設兵團沒有維、哈各族、或只有極少維、哈各族的一個很好的注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於 1954 年十月，此時中共在新疆的軍隊共有十九萬三千人，除了留下三萬八千多人（約為總人數 20%）擔任仍執武器防禦新疆任務外，其餘一律編入生產建兵團，其時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及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的王震（稍後為王思茂），把生產建設兵團編為十個農業師，一個建築工程師。稍後，中共中央對新疆人事有所調整，由王恩茂接替王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新疆軍區，由陶峙岳出任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

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後，組織編制有調整，除原有十個農業師一個建築工程師外，另外成立一個運輸處，一個建設工程處，直屬兵團的有八一農學院、被服廠、皮革廠、衛生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此一生產建設兵團，完全採行中共軍方建制，從兵團到師、團、營、連逐級控制，其中心任務從事生產，一旦有警，則在新疆軍區指揮下拿起武器衛戍邊疆，就此一面向看，與歷史上屯田戍邊頗為相似，只是組織更為嚴謹，而且有落地生根打算，這點與歷史上屯墾戍邊極不相當同，既然生產建設兵團要在新疆落地生根，則他們的終身大事總要加以解決，於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透過私人關係給家鄉湖南省的領導去信，要湖南當局大量招募女青年到新疆學習俄文、開拖拉機，進工廠……等，一時湖南各地大街小巷貼滿這類招募廣告，其實招募女青年的真心目的，是在為新疆的軍人找配偶，當然在招募廣告中絕對看不到去新疆是要給在疆軍人作配偶，當時大陸失業率

極高，許多小學、初中女生，看到招募女青年廣告，認為到新疆去既可學到一技之長，又可減輕家裏負擔，於紛紛報名「參軍」，這些湘妹子一到新疆，依其學歷、顏值，依次「配給」黨齡深、淺的幹部乃至士兵，透過「組織介紹」、「個人同意」的程序，「先結婚、後戀愛」的婚姻生活<sup>27</sup>，至今已經超過半個多世紀，不管當年是否真的「個人同意」，如今第三代大多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她們早已經是分不開的命運共同體，至於當年她們的心情與後來現實的生活，在軍區、建設兵團流傳這麼一首「順口溜」：

「誰言大漠不荒涼，地窩房、沒門窗；一日三餐，玉米間高粱；一陣號聲天未曉，尋火種，去燒荒。最難夜夜夢家鄉，想爹娘，淚汪汪遙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許塞外，宜紅柳，似白楊。」<sup>28</sup>

這首似詞的順口溜，對現實生活情況與抽象的心理狀態的描述可說是入木三分，既寫實又典雅，至於出自何人之手，引錄者並未注明，由於年代久遠，已是不可考了。新疆軍區或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員，既已在新疆成家立業，至今已超過六十年，可以說已在新疆落地生根，成為新疆的世居民族了，人，原本就是土地的過客，每一塊土地都承載過無數的過客，土地永遠不屬於人。

1966 年大陸共青團九屆三中會通過「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從此展開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間，生產建設兵團人口增加到七十七萬人（1974 年數字），期間曾將生產建設兵團裁撤（事在 1975 年），裁撤後新疆各項生產銳減，累計財政損失人民幣六億多元，而且兵團人員四處流竄造成諸多問題，不僅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頭痛，更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1981 年，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率軍入疆者，時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會常委），向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提出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議，同年八月中旬，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

<sup>27</sup> 以上分見焦鬱鑒《新疆之亂》香港明鏡出版社，2009 年頁 137～141，其中有頗多具體人名、事跡、可供參考。

<sup>28</sup> 見焦鬱鑒前揭書頁 139。

下，親到新疆實地考察，就在同年十二月三日，決定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制，而且較前更為擴大。

據較新資料（所謂較新，距今也已有八、九年之久，由於更新之資料難以取得）生產建設兵團目前有十四個師、185 個農牧團場、總人數達到二百七十六萬五千五百人（從網路查到係 2015 年數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人口為二千二百二十六萬人<sup>29</sup>，可見生產建設兵團在全新疆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重。十四個師分布全疆各地，其中農十四師駐和田市、農三師駐喀什市、農一師駐阿克蘇市、農四師駐伊寧市、農五師駐博樂市，農九師駐塔城東南方之額敏縣、農十師駐阿勒泰市西南方之北屯市，這七個師都分布在邊境國防要衝，可見其戍邊之用意可能較生產建設為大。<sup>30</sup>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最初設定目標為從事第一產業，（農業、礦業等），稍後跨足第二產業（製造業），近年來更涉足第三產業（服務業），可說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其中有許多企業如新天國際、新疆天業、新農開發，伊力特、新中基、天富電熱，天宏紙業等八家，已經是上市公司，為兵團後續發展，提供了動力。

新疆位處中國大陸西部，自 1991 年到 2011 年二十年，據此間平面媒體刊載曾發生較重大的暴亂事件三十四起（詳細情形請參見本文注 30 所引劉氏之文，列頁 425~428），其他較小的事件可能不計其數，試想若無生產建設兵團二百七十多萬人存在，其後果當難以想像，因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其存在之意義。

## 五、從媒體看新疆情勢

台灣與新疆直線距離三千六百多公里（指台北與烏魯木齊之直線距離），而且自李登輝時代開始推行「去中國化」邁向台獨之路，陳水扁八年更是加速進行「去中國化」，其馬英九八年竟不知撥亂反正，任由情勢繼續惡化，蔡英文執政後更是推行法理台獨在這種情勢下，台灣媒體照理說對大陸新疆地區（或西藏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動態，應該漠不關心才

<sup>29</sup> 此項數字見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7 年出版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頁 4《新疆概況》。

<sup>30</sup> 各師分布位置可參見劉學鈔《再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該文輯入劉著《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台北思行出版社，2014 年，頁 430-431 間所附地圖。

是，然而不然，越是傾向台獨的媒體，刊載有關新疆的消息越多，這種現象頗值探討，本文以 2019 年一月至九月平面媒體，其中一至六月，採《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旺報》《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七月至九月則剔除《蘋果日報》及《旺報》，其所以剔除者，因《蘋果日報》發行人黎某，係港商、而香港近來有部分異議人士與大陸關係不佳，而黎某也為其中之一，誤以為唯有選舉才是民主，而要求特首直選，看似理直氣壯，何以不回想在仍為英國殖民地時，何以不向英國要求港督直選？是否被白種人統治較為心甘情願，黎某以社會公器之媒體作為反中共的平台，將媒體作為個洩忿工具，已失媒體公正立場，兼以售價過昂且廣告太多，等於花錢買廣告，遂將之剔除；至於《旺報》一則售價稍昂，再則其為《中國時報》同一財團，三則其與大陸廣東省某報有合作關係，恐其立場不夠客觀公正，故自七月起也將之剔除。

至於這幾家媒體之背景，需作簡述《聯合報》系其創辦人王惕吾係國民黨中常委、其忠於中華民國自不待言，但堅守媒體是第四權，當年以敢於衝撞威權體制著稱，今雖由其後人接掌聯合報系，但其堅守媒體人立場仍未改變，作為中華民國之媒體，擁護中華民國乃是天經地義，因此聯合報系擁護中華民國反台獨立場頗為堅定；《中國時報》早期稱《徵信新聞》，其創辦人為余紀忠，也曾為國民黨中常委，其擁護中華民國立場也勿庸置疑，可說是不遺餘力，早期對「黨外」之言論每加刊載，完全是一個合格的媒體，其後易手由台商蔡氏經營，仍堅守媒體客觀報導公正評論之應有立場；《蘋果日報》由港商黎氏創辦，初創時以色羶腥吸誘讀者，以語不驚人誓不休方式報導，該報曾自稱在所在媒體中，該報零售量第一，可見該報確擁有相當數量之讀者，該報純以經商方式經營，勿略媒體為第四權之神聖意義，尤以近年來其在港生意，似受大陸影響，而採取反中共態度，因而該報頗有向台灣執政黨傾斜情勢，站到逢中共必反的行列；至於《自由時報》，其創辦人林榮三，原為國民黨忠貞黨員，曾被國民黨拔擢為監察院副長，但其志在更高職位，以所謀不遂，立場由是大變，成為反中國（指文化歷史上的中國急先鋒，該報成為台獨黨「機關報」是逢中必反（包括中共、文化、歷史意義之中國），既是如此反中照理說對中國大陸任何新聞，應該是漠不關心，尤其對遠在天邊的新疆理應

不予聞問，然而不然，2019 年自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此間各平面媒體共出現 97 則有關新疆或維族的消息，其中《自由時報》出現 51 則，竟然居冠，稍後將作分析，茲先將各媒體出現有關新疆或與維吾爾族有關消息，統計如次：

媒體名稱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備註
出現則數	19	2	0	10	15	51	7~9 月後不含《旺報》及《蘋果日報》

從上表看出 2019 年一至九月，此間平面媒體共刊載有關新疆或維吾爾族的消息共有 97 則，其中《自由時報》獨占鰲頭計有 51 則，似乎《自由時報》對新疆情有獨鍾，否則何以不惜媒體有限版面，而對新疆或與維族有關消息，加以報導，然而事實是否如此，本文稍後會酌予分析，現在先各媒體所刊登有關新疆或維族消息，依其性質分別統計如下：

媒體名稱 出現則數 新聞性質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新疆景觀及資源或建設	2		0	5		
自治區一般政情	10	1	0	4	1	6
再教育營或所謂人權問題	6		0	1	11	39
語文宗教	1	1	0		2	3
其他			0		1	3
備註				不含 7 ~9 月	不含 7 ~9 月	合計 97

從上項分類統計中，除了《中國時報》整整九個月二百七十八天，完全沒有刊載任何一則有關新疆或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的消息，關於新疆「再教育營」一事，西方媒體及政府曾大事炒作，在台灣各平面媒體也曾喧騰一時，2018 年九月至 2019 年二月半年間，台灣各平面媒體共刊登有



關新疆或維哈各族之消息，共有九十三則，《中國時報》僅出現一則<sup>31</sup>，2019 年一至九月，竟連一則也未登載，或許該報系認為同報系之《旺報》已有刊載有關新疆消息，故而不必重複，但此項猜測頗有強作解人之嫌，可能之原因應是中時報系老闆在大陸有龐大事業，為了企業不受影響，因而加以忽略，無怪乎此間台獨分子對該報系頗有詆毀。而《自由時報》以其鮮明之台獨立場，竟然在九個月間刊登了 51 則有關新疆或維，哈族的消息，占有平面媒體同類消息百分之六十二，占比之高，令人詫異，似乎與新疆或維，哈各族有特別淵源，然而事實顯然不是如此，其原因容後分析，此處應先將所謂再教育營加以介紹，始能對問題作進一步之探究。

自 2018 年以來中外媒體都以新疆再教育為名，評擊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哈薩克等邊疆少數民族進行迫害，自 2018 年五月十日起，西方國家即開始對再教育營進行批評，如 2018 年八月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副主席麥道高（Day McDougall）十日在瑞士日內瓦指出，中國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及社會維穩的名義，「已將維吾爾自治區變成籠罩在秘密中的廣大囚禁營，一種『無權地帶』（Noright zone）」<sup>32</sup> 美歐國家每喜談其所定義的人權，但批評他國時，則作選擇性的批評，如男女平等，原是美歐國常掛在嘴上的所謂「普世價值」，但碰伊斯蘭國家時，卻絕不提這個「普世價值」了。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是否真有所謂的「普世價值」，還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在問題未釐清時，高談普世價值，並沒有多大意義，譬如：在伊斯蘭世界認為婦女必須包頭巾，這是穆斯林的普世價值，請問美歐人士認同嗎？願意實現這項普世價值嗎？

美國歐洲等西方媒體，所說的再教育營，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表示正確的名稱是「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自治區主席稱：國際上有聲音指新疆有「再教育營」或「集中營」，是有人捏造，說法荒謬。並指出，這是新疆在反恐維穩、反極端主義過程中，建立「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只針對力、極端及分裂主義，並非針對任何民族及宗

<sup>31</sup> 詳情見孟鴻《台灣媒體有關消息之分析（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一文，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第 218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 2019 年 6 月，頁 57~90

<sup>32</sup> 見 2018 年八月十二日《自由時報》A6 版

教人士，並稱「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就像學校，學習語言和技能，充分保障學員的人格和尊嚴不受侵犯，嚴禁以任何方式對中心學員人格侮辱和虐待，並保障學員的人身自由，可以定期回家，有事可以請假。……<sup>33</sup>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雪克來提·札克爾的說法，容或對「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有所美化，但可斷言其非「再教育營」，更非什麼「集中營」，如果勉強要作個比喻，台灣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之下，在新竹、屏東等地設有「游民習藝所」，對沒有身分證，又缺一技之長無以謀生者，一經發現，即送入「習藝所」，強制學習一技之長，所內絕非監獄，沒有「牢房」沒有警衛，可以自由外出，兩者可能有其相似之處，但習藝所絕非監獄，更非集中營，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實。

據報載引外媒消息稱：新疆流亡海外人士所組「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有數千名成員與凱達組織並肩作戰，且在數個戰場扮演關鍵角色，如今同其他各國聖戰士無法返回母國，將在世界各地流竄，特別是東南亞，結合當地恐怖組織或武裝團體，發恐攻或製造動亂，將是東南亞區域安全一大威脅<sup>34</sup>。試想這數千名新疆維、哈各族曾參與凱達組織，如果回到新疆或竄入大陸其他省區，等同數千枚炸彈，不知在何時、何地引爆，是一件何等恐怖之事，這些參與凱達組織的維、哈分子，其「人權」固然需要注意，但那些未參凱達組織的數千萬乃至十三億多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似乎更應該受到保護，美歐式的所謂民主、法治，對美歐以外的地區、國家，往往對加害者的保護，更甚於受害者；但如果事件發生美、歐地區，被害者是美歐人民，則一反既有的態度，可以不顧國際法的約束，萬里追殺加害者，如同美國之獵殺賓拉登，完全無視於非法侵入他國領空等國際法的約束，完全一副黑道老大模樣，「我就是拳頭大，你能奈我何」。

美國有一「自由亞洲電台」，在亞洲各國專門從事分化工作，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該電台 2019 年一月二十二日報導稱：「取得遭轉送他處工廠工作的穆斯林提供的影片，有伊犁的哈薩克族人被送到江西一家國有企業旗下工廠，廠方明言『先政治、後經濟』，意即先轉變思想，再投入

<sup>33</sup> 見 2019 年三月十三日，台灣《聯合報》A10 版

<sup>34</sup> 見 2019 年二月二十日，台灣《聯合報》A12 版

工作，並要求這些穆斯林學漢語、加入中國共產黨。」<sup>35</sup>「自由亞洲電台」這一則報導分明意在挑撥民族情緒，試想今日大陸官方語言是普通話（漢語中的官話語言），要在江西國營企業工作，要會講聽普通話，乃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不禁要問該電台，在美國要找工作，要會講、聽美語，是不是基本要求？而《自由時報》於同年同月二十四日，以《新疆人進國企，被逼入黨學漢語》為標題<sup>36</sup>，刊登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就標題來看，似乎要哈薩克等邊疆少數民族學習大陸的官方語言（普通話，在台灣稱國語），就是壓迫甚至是迫害，那麼美國境內許多早住的印地人以及亞裔新住民，也都操美國的官方語言（美式英語），是不是也是對印地人、亞裔、非裔移民的壓迫或迫害？其實語言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不必賦予過多的政治含義，在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如美國、中國大陸、俄羅斯等，都會以主體民族（在人數上居多數之民族）之語言為官方語言，如美國以美式英語為官方語方，在美國要進入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工作，當然要會說、聽美式英語，對亞裔，非裔而言，絕不構成所謂民族壓迫，而自由亞洲電台稱哈薩克族人到江西國企工作，要先學會漢語，就其語氣看，明顯含有大陸官方對哈薩克人壓迫之意味，而此間《自由時報》更以「被逼入黨學漢語」為標題，顯然反中國（指文化、歷史意義之中國，以下皆同不另加注）意識形態作祟，該報社創辦人乃至編輯、記者似乎完全忘記其祖先來自中國。

綜觀 2019 年一至九月共二百七十二天中，此間平面媒體刊載新疆或與維吾爾、哈薩克等邊疆少數民族新聞，共有九十七則，其中以《自由時報》刊載五十一則居冠，就新聞內容分析（見前表共分為：新疆景觀及資源或建設，自治區一般政情、再教育營或所謂人權問題類、語文宗教及其他）共分五類，其中以「再教育營及所謂人權問題」有五十七則，占全部新聞 52%，其中文以《自由時報》刊載三十九則為最多，似乎新疆或維、哈等族問題在再教育營，以及中共對維、哈各族的人權「侵犯」，而西方媒體在 2018 至 2019 年上半年，也以此作為評擊中共對新疆的措施，甚至此間有媒體引用美國學者（並未指此「學者」姓名及其學經歷，也可

<sup>35</sup> 轉引自 2019 年一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6 版

<sup>36</sup> 同注 35

能只是紐約街頭的路人甲)說：「在新疆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分而被關進中共當局設立的再教育中心的人數可能接近一百萬。」<sup>37</sup>八個月後 2019 年二月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 痛批「至少有八十萬至數百萬維族人遭囚禁在『現代勞改營』」<sup>38</sup>，幾天後荷蘭網路專家揭露 (又是不具姓名)，「中國」政府與名於廣東深深圳的「深網視界科技有限公司」(Sense Nets) 合作，利用人臉辨識及大數據方析科技，嚴格控制新疆地區維吾爾族人的活動，……導致近二百六十萬人的個資、至少六百多萬筆地點紀錄外洩……<sup>39</sup>，這則新聞表面上看是指大陸以人臉辨識科技監控新疆維族，我們不禁要問，這個人臉辨識科技，是那一個國家研發出來的？其研發的目的何在？前幾年媒體刊登美國竊聽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電話，安知美國政府情報單位不會以人臉辨科技，蒐集美國人民的個資，如界要譴責中共，是否對美、歐各國也要一併帶上？關於新疆再教育營，從 2018 年吵到 2019 年，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接掌新疆後，自 2016 年至 2019 年二月，將「新疆恐怖攻擊次數從原來一年多達一百至兩百件，降低到近兩年無任何恐攻」<sup>40</sup>。」同年三月中共召開全國人大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指出「國際上有聲音指新疆有「再教育營」或「集中營」，是有人捏造，說法荒謬，……新疆已經連續兩年多沒有發生任何暴力恐怖攻擊事件，到新疆的人都說，現在新疆很安全、很穩定」<sup>41</sup>，前文提到西方政客或媒體一再指稱新疆再教育營「關押」了幾十萬到幾百萬的維吾爾、哈薩克族人，但中共「屢出言自清並無打壓新疆維多爾族，近日更在《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辯稱，2014 年後，已在新疆殲滅近一千六百個恐怖組織，逮捕近一萬三千多名恐怖份子。」<sup>42</sup>這與關押在再教育營的數十萬乃數百萬人，反差太大，我們無法判斷《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所透露的數字絕對正確，但西方媒體或政客所指的數十萬以至數百萬人，則可斷言是誇大的，不過同樣是

<sup>37</sup> 見 2018 年五月十日，台北《大紀元報》A5 版

<sup>38</sup> 見 2019 年二月八日，台北《自由時報》A10 版

<sup>39</sup> 見 2019 年二月十九日，台北《自由時報》A2 版

<sup>40</sup> 見 2019 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自由時報》A8 版

<sup>41</sup> 見 2019 年三月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 版

<sup>42</sup> 見 2019 年七月二十七日，台北《自由時報》A10 版

《自由時報》於 2019 年九月二日，在 A2 版以《新疆大濫捕，近兩年 23 萬人判刑入獄》為標題，採用美國《紐約時報》分析未經報導的中國官方數據，這就令人覺得奇怪，既然是「未經報導的中國官方數據」，《紐約時報》如何得到此一數據？美政政客、媒體眼見個別炒作新疆再教育營或對維、哈各族的人權問題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因為近三年來確實沒有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於是乃發起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共新疆問題，進行「圍剿」，如美國副國務卿蘇利文（John Sullivan）在聯合國大會場邊會議上，聯合逾三十個家譴責北京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可怕壓迫」<sup>43</sup>。這個蘇利文還強調「聯合國有義務確保密切監督中國的人權紀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必須尋求『立即、不受阻礙及監視地』進入新疆。此次活動是由英國、德國、荷蘭及加拿大等國共同發起，由逾三十個聯合國會員國，歐盟代表、逾二十個非政府組織（NGO）及維族受害者參與，要求中國終止可怕的壓迫行為。」<sup>44</sup>蘇利文可能有失憶症，他根本忘記了，十年前美國在關他拿魔監獄，如何迫害美國抓到到的所謂的伊斯蘭恐攻份子，那時的「人權」到那裏去了？而蘇利文還以為自己是聯合國秘書長，要指揮聯合國如何作為，何況聯合國是否有權派出高級專員到他國進行調查，都還是問題，再進一步看縱然聯合國派出高級專員，假設是進入美國，試問美國情報單位連是「盟友」的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電話都要監聽，那麼進入美國調查的聯合國人員，豈能「不受阻礙及監視地」，建議蘇利文先治好失憶症並面壁自省後，再發狂言。

新疆近三年沒有發生動亂，這雖然是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的夫子自道，但有其可信度，以現代通訊科技的進步，設若新疆地區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傳送到國外，在美歐政客與媒體唯恐新疆不亂的心態下，豈有不大加炒作之理，但在筆者所剪輯 2019 年一至九月份 97 則有關新疆或與維、哈各族新聞中，確實未見到發生動亂的消息，畢竟新疆二千二百二十六萬人安定、平靜的生活，比什麼都重要<sup>45</sup>，

<sup>43</sup> 見 2019 年九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由時報》A7 版

<sup>44</sup> 同注 43

<sup>45</sup> 此項人口數字見北京地圖出版社編印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新疆》，2017 年出版，頁 4

中共當局或許為了讓歐洲國家親身體驗新疆的安定，北京當局擬邀請歐洲各國駐北京外交官組團訪問新疆，在此前曾於 2019 年二月，邀請巴基斯坦、委內瑞拉、古巴、俄羅斯等八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和主要外交官到新疆參觀訪問，據中共新華社稱這些外交官「感受新疆社會穩定，認可去極端化措施」<sup>46</sup>，北京當局之敢於邀各國外交官到新疆參訪，顯然對新疆的安定充滿自信，可見新疆近三年來沒有發生恐暴事件，應該是可信的。

儘管北京在新疆實行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或是西方政客、媒體所謂的「再教育營」甚至「集中營」，有可議之處，「不是最理想的辦法，但卻是穩定新疆代價最小的措施」（見胡勇於 2019 年四月三日在《旺報》D2 版發表以《新疆問題，西方站著說話不腰痛》為題的專文，引用北京《環球時報》之說詞），同樣的，前美國駐北京大使芮效儉「也曾公開表示，他不認同中國在新疆的做法，但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見 2019 年四月三日《旺報》D2 版）如所周知，批評是很容易的，也容易贏得事不干己者的讚賞，例如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就「打著關切新疆人權的幌子，行打擊抹黑中國之實」（見 2019 年四月三日《旺報》D2 版），對此，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早就向盧比奧公開喊話。「願不願意把那些受宗教極端思想和暴恐思想影响的人都接去（美國），讓他們在美國享受『完全的自由』？」（見 2019 年四月三日《旺報》D2 版）想來盧比奧縱然像死鴨子般仍然嘴硬，美國絕大多數人民也不會接受的，這也說明批評他國措施是很廉價政治口號。

## 六、結語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以天山為界，天山以北，月支、烏孫、柔然、高車、突厥、嚙噠、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經是其過客；天山以南則為吐火羅（塔克拉，就是吐火羅的音轉）、粟特、突厥、回紇等民族生息之地，人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不屬於人，所以說某地是屬於某民族，純為無稽之說，如果說某地屬於某民族能够成立，則今日在美國的白人是否應該全部離開美國大地？

中原王朝自兩漢以至清代，都曾在西域推行屯墾戍邊，西域之有中原

<sup>46</sup> 見 2019 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北《聯合報》A10 版

人士定居其間，史冊記載斑斑可考，而隴西麴氏<sup>47</sup>在高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建有麴氏高昌王朝，立國一百四十年（西元 501～640 年），麴氏高昌王朝一切典章制度幾與中原各王朝無異，唐滅高昌麴氏王朝後，更將高昌建為西州，一切與內地無異，這也是無可更易的史實，同樣的吾人不能因此便說高昌是中原漢人的<sup>48</sup>，只能說漢人也曾經是西域（即新疆）的過客。

清乾隆二十二年（西元 1757 年）攻滅準噶爾平定天山以北，繼之於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天山以南之回部，正式將古稱西域之天山南北，正式納入中國清朝版圖，由於乾隆之好大喜功，將天山南北之地稱之為「新疆」，至今（2019 年）已有二百六十三年，較美國立國猶多十九年。清朝之治邊政策，採邊疆各少數民族與中國主體民族（漢人）隔離政策<sup>49</sup>，不讓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接觸、交流，使維吾爾、哈薩克……藏族、蒙古族……等邊疆少數民族孤立於主體民族之外，造成各民族間之隔閡，當清朝國力強盛時，尚能掌握邊疆地區，可是歐洲各國拜工業革命之賜，國力突飛猛進，形成帝國主義，不斷向外擴張，而清朝自乾嘉之後，國力停滯抱殘守缺，猶一味以天朝自居，兩相對照，情勢顯得落後，由是各帝國主義者頻頻向中國扣關，英、俄為競逐中亞，新疆遂成為英俄爭奪之標的，新疆孤懸於嘉峪關外，與內地形成隔閡，有清一代在新疆從未從事基礎建設，而維、哈各族無論在語文，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各方面都與內地主體民族迥異，文明又落後於內地，而中國與歐洲各國相較已明顯落後，由是新疆更顯得落後，英、俄又刻鼓吹維、哈……各族與中國主體民族不同，因此不是中國人，而「雙泛主義」又適時進入新疆，自清朝中晚期以至民國時代，可說是動亂不已，曾經在外力操縱下，出現過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三區革命等鬥劇<sup>50</sup>。

<sup>47</sup> 甘肅省簡稱「隴」，因此有人誤以「隴西」為甘肅省西部，其實非也，因陝西、甘肅之間有隴山山脈，甘肅省東部在隴山之西，故稱隴西，真正甘肅省西部稱河西。

<sup>48</sup> 所謂漢人其內涵極其複雜，最初有華夏、東夷，百越、荆吳四系民族揉合而成，其後不斷吸納四周各民族，越至近代其內涵越多元。

<sup>49</sup> 關於清代治邊政策，可參見劉學銑《論清代邊政之得失》，該文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 年，頁 1～98

<sup>50</sup> 關於東突事件、三區革命詳情，可參見張大軍《新疆史》蒙藏委員會，1964 年；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馬大正、許

中共建政初期，新疆情況尚稱平靜，但自中俄共因路線不同而發生爭執後，新疆維、哈各族在蘇聯教唆蠱惑下，整個民族軍叛逃進入俄境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從此新疆又成多事地區，尤其蘇聯瓦解後，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宣佈獨立，對新疆形成莫大的壓力，動亂、恐暴事件可說是層出不窮，據中國大陸發表之《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提供的不完全統計資料，自 1990 年至 2016 年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即所謂的「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製造了數千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無數無辜民眾被害、數百警察、民警殉職，至於財物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見 2019 年四月三日台北《旺報》D2 版胡勇之專文），2016 年年底以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可說是一個不安定的地區，然而自 2017 年至今（2019 年九月卅日）近三年，新疆未曾發生一起動亂、恐攻事件，這是事實，誠然「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或許不是一很好的措施，被強制進入該中心的人不管幾萬人、甚至二十三萬人（見 2019 年九月二日，台北《自由時報》A2 版），是些人短暫失去自由，如與二千二百多萬人的安全相較，孰輕孰重，已是不言而喻。

當然那些「被」進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二十三萬人，未必都是恐攻分子，但據媒體報導在海外有數千多維吾爾族人參予中東聖戰士組織，加入武裝團體「突厥斯坦伊斯蘭黨」，並與凱達組織並肩作戰，且在數個戰場扮演關鍵角色，如今流竄世界各地<sup>51</sup>，將對東南亞區域安全造成一大威脅，這數千名維族「聖戰士」必有親朋戚友仍在新疆，在「職訓中心」的二十三萬人，或許跟那數千個「聖戰士」有某種關係，因此將之集中施以「職訓」，或許那被進入職訓中心者，確實有一些是宗教極端思想者，如所周知，宗教是感性的，信者恒信，越虔誠越容易走向極端，君不見前幾年在海外西藏流亡政府暗中慫恿下<sup>52</sup>，大陸藏區發生多起喇嘛自焚事件，喇嘛教自稱是佛教，佛教戒殺生，而自殺更是永世不得超，但只要達賴宣稱為喇嘛教自焚，不是自殺，仍可升上西方樂土，於是又發

---

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

<sup>51</sup> 見 2019 年二月二十日，台北《聯合報》A2 版，該報係根據外媒報導

<sup>52</sup> 關於大陸藏區喇嘛自焚評情，請參見拙撰《近年藏情與達賴言行》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201 期，中國邊政協會，2015 年三月，頁 13~53，有關喇嘛自焚部分見於頁 33 之後。



生多起藏區喇嘛自焚事件，直到藏區有人供出自焚事件是海外西藏流亡政府暗中蠱惑，從此遂不再有自焚事件，這就是宗教極端思想，請問如將有這種思想的人，將之送進職訓中心，應該是沒有太大爭議，當然古今中外，在刑事案件審判中，不免會有冤假錯判情形，在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裏的二十三萬人中，也應該有一些是屬於這種情形，其對當局的不滿意，應屬可以理解者。對於社會上極端分子的監控，中外皆然，如美國在數次槍擊案過後，也開始緊盯極端分子，「緊盯」其實就是監控，2019年十月六日，台北《聯合報》D4版，翻譯美國《紐約時報》標題為：「Scrutiny for Extremist Symbols After Attacks in U. S.」漢譯為「攻擊過後，美國緊盯極端分子標記」，美國對極端分子，也採取了監控（緊盯）措施，則大陸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只不過是更積極一些而已，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奧認為大陸的「再教育營」戕害了人權，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回嗆說盧比奧說：願不願意把那些受宗教極端思想和暴恐思想影響的人都接去（美國），讓他們在美國享受「完全的自由」，這個回嗆的很有「藝術」，想來盧比奧必然無以作答。

本文脫稿時（2019年十月十二日），新疆疆已經三年沒有發生動亂事件，這是七十年來罕見之事，但其代價是二十三萬人短期失去自由，如與全新疆二千二百多萬人免於社會動亂的恐懼相較，孰輕孰重，是很值得思索的一個課題。

## 從九世班禪呼畢勒罕之尋覓看噶廈公所之狡黠

孟鴻

前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 摘 要

西藏喇嘛教中的格魯派，有所謂四大「活佛」<sup>1</sup>，在藏族分佈地區，以達賴與班禪地位最高，在宗教上地位彼此完全一樣，只是五世達賴從統治青海、西藏地區的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後人手中剽竊了世俗的政治權力，從此對西藏人民有了生死予奪的權力，無論達賴、班禪都自認是出家之「佛教徒」，彼此在宗教地位上無分軒輊。四世達賴以二十八歲青壯之年驟然辭世，令人不能無疑（四世達賴係蒙古族）藏巴汗，原禁止四世達賴轉世，四世班禪為此極感憂心，恰巧當時藏巴汗深染重病，群醫束手，嗣經精通岐黃之四世班禪為之診治，藥到病除，藏巴汗感激之餘，曾欲厚賜四世班禪，但四世班禪辭謝，僅懇求准讓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以四世班禪對已有救命之恩，始勉予同意四世達賴轉世<sup>2</sup>，可見達賴一系之得以延續其「法脈」，實出於四世班禪一念之仁，然而傳至十三世達賴時，竟然罔顧前情，欲強行統治九世班禪所擁有之扎什倫布寺及後藏地區，甚至威脅到九世班禪之生命，班禪只得逃往內地，終其餘生未能返回後藏，對其轉世童靈，蒙藏委員會完全尊重班禪堪布會議廳及藏地格魯派傳統習俗，尋訪，終於訪得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但西藏地方噶廈公

<sup>1</sup> 格魯派四大活佛指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及章嘉。

<sup>2</sup> 見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39。

所竟橫加阻擾，本文就十三世達賴野心及其與九世班禪結怨因由，班禪辭世，靈童尋訪，認定及噶廈之阻擾，妄想操縱等經過加以敘述。

**關鍵詞：**班禪、達賴、噶廈公所、呼畢勒罕

## 一、達賴、班禪名稱之由來

吐蕃地區（即西藏，因「西藏」係清代之後始有之名詞，元朝以前概稱吐蕃，元朝至清初則稱吐蕃特或作圖伯特<sup>3</sup>）自唐初松贊剛布建立吐蕃帝國後，開始由中原及尼泊爾引入佛教之前，吐蕃地區盛行泛靈信仰近似薩滿之本教<sup>4</sup>，松贊剛布死後，吐蕃王宮內又重新回到擅長咒術巫法的本教信仰<sup>5</sup>，其後松贊剛布玄孫赤松得贊嗣位（赤松得贊為唐金成公主所生），迎請印度密教（已經非正統之佛教，因其吸納了印度教之唯性觀，崇尚幻術）蓮華生入吐蕃宣揚密教，密教曾在西域傳播，德國學者克林凱特（Hans-Joachim Klimkeit）曾在其所著《絲綢古道上的文化》（趙崇民漢譯，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一書頁157指出：

「……這一點表現在密宗的產生，這個教反應了晚期印度佛教的特典。它含有色情成分和令人恐懼的神仙，這也就是構成西藏佛教的主要因素。」

可見密教既「含有色情成分和令人恐懼的神仙」，這絕不是佛教的創教者喬答瑪•悉達多（即釋迦牟尼）所贊成的主張，所以蓮華生傳入吐蕃的密教，不是正統的佛教，因為釋迦牟尼的佛教，最重要的兩個戒律就是戒殺生、戒色情，而吐蕃對此二者皆不禁止，且認為「性交」有助於修行，如十四世達賴在其所著《修行的第一堂課》（丁乃竺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2年）第177～178頁上說：

<sup>3</sup> 關於吐蕃一詞之由來，可參見劉學鈔《藏族源流蠡測》蒙藏委員會，1987年，頁2~5。

<sup>4</sup> 關於薩滿信仰，也即萬物有靈之泛靈信仰，嚴格說尚不能構成宗教，按宗教之構成有其必須具備之條件，詳情參見羅竹風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

<sup>5</sup> 見黃國煜《世界宗教》，台中好讀出版社，2009年，頁231。

「對『佛教徒』來說，倘若修行者有著堅定的智慧和慈悲，則可以運用性交在修行的道上，因為這可以引發意識的強大專注力，目的是為了要彰顯與延長心更深刻的層面，為的是要把力量用在強化空性領悟上。」

如果照十四世達賴所說：要強化空性領悟，就得「性交」，這根本是悖論，所以蓮華生傳入吐蕃地區的密教，從根本上說就不是釋迦牟尼的佛教，一方面推崇釋迦牟尼，另一方面違背佛祖的色戒，怎能稱之為佛教？

佛教源於印度，此乃眾所皆知者，向北傳入貴霜帝國（漢文史科稱之為大月氏國）後，其王迦貳色加大力弘揚，乃得大盛，但與此同時，印度本土早於佛教之婆羅門教開始復興而佛教在印度逐漸沒落，其所以如此者，因佛教內部有若干人妄解釋迦牟尼的教言，發展出與之相違背的修行方法，摻入敗壞社會風氣的「雙修法」號稱密教，既已違背迦牟尼的教法戒律，在本質上已不再是佛教，大可自立門戶另創新教，大可不必扛著佛教招牌，做出釋迦牟尼所禁止的男女雙修惡行，但這些創立及奉行密教者，卻不肯或不敢放下佛教號，仍然披著佛教的外衣，以佛教徒自居，因此使印度教或婆羅門教與之相較，「印度（後期）佛教起碼有如下不足的缺陷：

第一、佛教僧侶入於密教而生活腐敗；

第二、佛教僧侶熱衷于文理空談，僅在學術中心之地，如那爛陀寺等處發展，荒於對民間的深入普及；

第三、佛陀四諦、八正道之教法，對於一般民眾不能即聞即知，也不能即知即行，他們於艱苦生活中，只盼有一個救世主將他們帶往快樂的天堂；

第四、佛教四姓平等之說，破壞了婆羅門僧侶的特權。」<sup>6</sup>

印度後期佛教被密教摻入後，生活腐敗，社會豈能對之有好感，而婆羅門教蓄意復興已達數百年之久，自是趁機「搞」垮印度後期佛教，更迎合印度普通民眾願望，揉和若干佛教理論，以新的姿態出現於印度，重新

<sup>6</sup> 見聖嚴法師編述《印度佛教傳》福建莆田廣化寺印，頁 217~218，但此處係轉引自克珠群佩主編之《西藏佛教史》，頁 3。

獲得印度人民的信奉。

婆羅門教既重新在印度成為主流宗教，後期的佛教也即密教，既難以在印度立足，向西北很方便進入中亞，但西元七世紀後半葉，伊斯蘭教掘起，以其銳不可擋的武力，向外擴張，中亞地區頓時伊斯蘭化，密教僧徒自然無法進入中亞，印度係半島，東、西、南三面臨海，於是密教僧徒只得向北求發展，印度之北就是吐蕃，蓮華生在此種情況下，被迎入吐蕃，從此宗教結合了吐蕃原有本教，演變出吐蕃式的喇嘛教。

喇嘛教由於對教義解釋或修行方式不同，而衍生許多教派，如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覺囊派……等，獲得吐蕃人民的信奉，給予豐厚的供養，而薩迦派更受元朝指派，代為治理吐蕃地區，從此喇嘛教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如所周知，一旦享有政治權力，絕不肯輕易鬆手，而權力會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縱然是喇嘛教的所謂「法王」（執著名號，就是著了「相」，離佛教就遠了），也未能例外，元代薩迦派法王被命為帝師者，含八思巴在內共有十四人之多，由於享有世俗的權力，帝師及其門徒逐漸趨於腐化，喇嘛在大都（今北京）及內地之行為極為穢亂，元末明初葉子奇曾在所著書中敘述當時吐蕃喇嘛在大都之邪惡行為如下：

「都下受戒（都指大都），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妾，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指帝師之弟子），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佈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此處之僧，自文意看，自是指吐蕃喇嘛而言），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鞠，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sup>7</sup>

可見元代時喇嘛之行為業已極端邪惡墮落。

薩迦派腐化情形如上所敘，未幾被噶舉派所取代，吐蕃地區被噶舉派所統治，仍然陷於腐化窠臼，致明代永樂年間（永樂係明成祖朱棣年號，

<sup>7</sup> 見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84。此書明武宗朱厚照正德時已有刻本問世，清《四庫全書》也輯入此書。

永樂共二十二年，西元 1403-1424 年）吐蕃地區喇嘛教之情況「多以唸咒、法術、吞刀、吐火、幻形、移遁、炫惑世人」<sup>8</sup>（此種情形與之前祆教、摩尼教傳教士均善於幻術，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晉書·佛圖澄傳》、慧皎《高僧傳》等書）。可見喇嘛教之吞刀吐火、幻形移遁炫惑世人之「法術」，很可能是受到祆教、摩尼教的影響<sup>9</sup>，永樂時有噶丹派（或作甘丹派）喇嘛羅桑扎巴（或作羅桑扎貝巴），係青海宗喀地方人（今青海省西寧市塔爾寺附近），眼見喇嘛腐化墮落，乃起而提倡宗教改革，倡言「戒、定、慧」，禁止喇嘛娶妻生子，「改革」，吐蕃語讀若「格魯」，所以此派稱格魯派，又其行法事時戴黃帽，故又稱黃帽派或簡稱黃教，其門徒以羅桑扎巴為宗喀地方之「聖者」，遂尊之為宗喀巴、宗喀巴謝世後，並未以轉世方式，但其嫡傳弟子根敦珠巴，採噶舉派轉世方式，延續其「法脈」，一般稱這種轉世產生的喇嘛為「活佛」，其實所謂「佛」，是指修行到「涅槃」境界（不生不死不寂不滅）者的稱謂，既已修行到此一境界，就不會再回到喧囂的俗世來，所以根本不會有「活著的佛」，（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活佛」），在吐蕃語裡對這種以轉世方式的喇嘛稱之為「珠古」、「仁波且」，是指「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世再來」（見胡耐安《邊疆宗教》頁 35），根敦珠巴以八十四歲高齡辭世，根敦珠巴生前曾說過他辭世後，要轉世到漢地，然而當他辭世後，他的弟子們僅輕易地說：「但是那裡（指漢地）佛法不興盛，想來不會在那裡轉世。」<sup>10</sup>而否決了根敦珠巴生前的囑咐，可見轉世一事，活著時候說的話，並不算數，死後身邊當權者或弟子們，才有權決定如何轉世，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當今十四達賴對他自己未來的轉不轉世，甚至說：「如果我轉世，必定是個淘氣漂亮的金髮女孩。」<sup>11</sup>說得五花八門，甚至流於戲謔方式，看來都作不得準。根敦珠巴辭世後，由其弟

<sup>8</sup> 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1961 年，頁 34。

<sup>9</sup> 關於祆教、摩尼教詳情，可參見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證》、劉學鈞《祆教、摩尼教從中亞到中原》等文獻。

<sup>10</sup> 據《根敦珠巴桑布傳》記載：是根敦珠巴自己說他以後要轉世到漢地，而且還要他的大弟子善巴欽波與他一起轉世漢地，仍舊當師徒，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3。

<sup>11</sup> 見 2015 年五月二十二日，臺北《自由時報》A19 版，奉君山專文。

子們決定在距後藏扎什倫布寺不遠的達那浦（在日喀則地區謝通門縣的東部）出生的吐蕃族男孩，後來法號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再轉世為索南嘉措。

索南嘉措出生於 1543 年，（明世宗朱厚熹嘉靖二十二年），當時吐蕃地區政治權力操在噶舉派手中，格魯派頗受壓制，索南嘉措天生點慧，喇嘛教法修養也頗精深，受到許多吐蕃人的尊崇，但對噶舉派的壓制，仍然無力抗衡，深知欲扳倒噶舉派，必得找到有強大武力的集團作為靠山，始克有濟，當時（十六世紀中後葉，西元 1563 年之後）舉目四顧，唯有蒙古吐默特部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武力最為強大，但儘管武力強大，以其非「元裔」<sup>12</sup>，無法成為全蒙古的大汗，聽聞黃教有輪迴之說，有助於其稱大汗，就如同諸胡列國時期（即一般史書所稱的五胡十六國時期），西域胡僧佛圖澄曾經對羯族所建後趙政權的石虎說：「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償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350~351）於是對吐蕃黃教索南嘉措大感興趣，而索南嘉措對阿勒坦汗之武力，更是垂涎三尺，如能以之為後盾，必能扳倒噶舉派，於是雙方遂於西元 1578 年（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六年）五月十五日在青海湖旁察蔔恰勒廟會面，雙方互贈封號，阿勒坦汗贈予索南嘉措的名號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聖」是指超凡入聖，也就是超出塵世間之意；「識一切」是說喇嘛教對在顯宗方面獲得最高成就的喇嘛之尊稱；「瓦齊爾達喇」是梵文 *Vajradhara* 的音譯，譯成漢語是執金剛，是指喇嘛教在密宗方面獲得最高成就的喇嘛之尊稱；「達賴」是蒙古語「海」的音譯；「喇嘛」是藏語上師之意，整個名號的意思就是：「超凡入聖顯、密二宗都獲得最高成就、智廣如海的上師」（以上係參考陳慶英等《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一書頁 80）我們以常情推論，阿勒坦汗不可能識得梵文、藏語，所以這個名號必然是事先與索南嘉措或其手下商量過，所擬出來的，此一推測應可成立。而索南嘉措則投阿勒坦汗所好，贈予阿勒坦汗的名號是「咱

<sup>12</sup> 成吉思汗曾宣稱其博爾濟錦氏為黃金氏族，非黃金氏族不得為大汗，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又窄化為非其嫡系也即元裔不得為大汗。

克喇瓦爾第徹辰汗」，「咱克喇瓦爾第」是梵文 *Cakrayarti* 的音譯，意為轉輪王，「徹辰汗」是蒙古語聰明睿智的汗，正好元朝創建者忽必烈的汗號就是徹辰汗，彌補了阿勒坦汗不是忽必烈嫡系缺憾，由是可證雙方互贈名號一事，是經過精心設計與安排，與雙方人民毫無關係，此乃無可否認之史實，但當前十四世達賴曾多次宣稱「達賴」是否轉世，需看西藏人民的意見，這是一句很冷的笑話，遙想當年索南嘉措接下「達賴喇嘛」這一個名號時，可曾問過吐蕃人民的意見？

索南嘉措接下阿勒坦汗所贈「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一名號時，或許也覺得此名號過於「神聖」，刻意謙虛地將此一名號向上追尊二世，因此根敦珠巴就成了一世達賴，根敦嘉措成為二世達賴，索南嘉措自為三世達賴喇嘛，再說一次，此一名號與吐蕃人或藏族，毫無關係。索南嘉措有了這極為「神聖」的名號，並沒有赫到手握世俗政治全力的噶舉派，所以再進一步要把黃教與吐默特蒙古阿勒坦汗家族綑綁在一起，於決定以阿勒坦汗的曾孫作為三世達賴的「呼畢勒罕」（轉世靈童），這麼一來，格魯派與吐默特蒙古可以說是休戚與共榮辱相關，這一招可說空前的高明，令人歎為觀止。

阿勒坦汗曾孫被認定為是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後，「法號」是雲丹嘉措，並沒有立刻到吐蕃坐床，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雲丹嘉措生長於吐默特蒙古豪門，捨不得讓尚在童稚之齡的雲丹嘉措進入喇嘛寺廟，過著暮鼓晨鐘枯燥的寺廟生活，希望雲丹嘉措能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其二，那時吐默特蒙古與中原明朝在青海發生戰爭，所以推遲了雲丹嘉措入吐蕃坐床。一直到了雲丹嘉措十四歲（西元 1602 年，明萬曆三十年，藏曆第十饒迥水虎年）才從吐默特動身進入吐蕃，於次年（西元 1603 年），在「數千名盔明甲亮的蒙古騎兵的護送下」進入拉薩<sup>13</sup>，住進哲蚌寺。當權的噶舉派面對壯盛的蒙古騎兵束手無策，除了無奈還是無奈，但也更加深了心中對格魯派的怨恨。

四世達賴在吐蕃十四年後，以正值青壯的二十八歲，就突然謝世了，如何辭世，至今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巧的是吐默特蒙古部的力量，也於

<sup>13</sup> 見李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著《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57。



此時土崩瓦解，已無力作為格魯派的後盾。而此時吐蕃地區豪族辛厦巴家族的彭措南傑正式建立噶瑪政權，設首府於日喀則，自上尊號為「第悉藏巴」，意為「後藏上號之王」，漢文文獻稱之為「藏巴汗」，吐默特蒙古勢力衰微了，四世達賴蒙古族的雲丹嘉措去世了，噶瑪噶舉政權建立了，正好下令禁止四世達賴轉世，這對黃教信徒而言，無異晴天霹靂，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喀爾喀部確科爾兄弟率軍進入吐蕃，企圖迫使藏巴汗收回禁止四世達賴轉世的禁令，結果反被藏巴汗擊敗，四世達賴之無法轉世，似已成案，當時四世班禪對此深感憂慮，不久之後，藏巴汗染患重病，羣醫束手，藥石罔效，而四世班禪洛桑曲吉堅贊精通岐黃之術，經四世班禪精心診治之後，竟然痊癒了，藏巴汗在感激之餘，慨然要給扎什倫布寺的阿巴扎倉捐獻一座莊園作為報酬，四世班禪辭而不受，但請求讓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只好接受<sup>14</sup>，由是達賴一系始得代代相傳以至於今，實出於四世班禪一念之仁，換言之，班禪對達賴有再造之恩，依照活佛傳世觀點，此後歷世達賴都應對歷世班禪心懷感激倍加尊敬，才算合情合理。

至於喇嘛教格魯派班禪一系、及班禪額爾德尼名號之由來，也有必要酌予敘述。上文提到四世達賴辭世後，藏巴汗下令禁止其轉世，使格魯派頓失精神領袖，四世班禪適時出現，成為格魯派最重要的領袖，對班禪一系之由來，相傳在傳到吐蕃之前，在印度已有七世，此一部分可以略而不談，傳到吐蕃之第一世班禪，為宗喀巴（羅桑扎巴）之弟子凱珠格勒巴桑布（此為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之譯名，此書係班禪堪布會議廳出版、中國邊疆學會發行，1943年。另釋妙舟《蒙藏佛教史》作開魯哥魯巴桑保，此書係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出版。另胡耐安《邊疆宗教》作凱珠），凱珠格勒巴桑布之「博學德•具妙善」<sup>15</sup>，生於西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後在甘丹寺出家為喇嘛，之後成為宗喀巴之大弟子，遵從宗喀巴之指示，與根敦珠巴都以轉世方式延續格魯派傳承，於西元1438年（明英宗朱祁鎮正統三年）辭世，得年五十四歲，從此以轉世方式傳承，傳到四世時，為羅桑曲吉堅贊，前曾說到藏巴汗曾禁止四世達賴轉世，端賴羅桑曲吉堅贊診治好藏巴汗致命之病，辭謝藏巴汗之厚賜，

<sup>14</sup> 見克珠羣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59。

<sup>15</sup> 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頁121。

只懇求准予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因羅桑曲吉堅贊對已有救命之恩，乃准四世達賴轉世，西元 1622 年（明熹宗朱由校天啟二年），由羅桑曲吉堅贊主持迎五世達賴到哲蚌寺坐床，並為之剃度、取法名、授沙彌戒<sup>16</sup>，成為五世達賴之師父，羅桑曲吉堅贊為保護尚在稚齡的五世達賴不受迫害，遂帶五世達賴避居今藏北熱振寺山後的甘丹康薩地方，親自加以教導，羅桑曲吉堅贊不僅在喇嘛教教法上是五世達賴的師父，在生活禮儀，安全方面，也猶如慈父之對孺子，保之護之，師徒猶如父子，團結一致應對藏巴汗與噶舉派之壓制。

西元 1634 號（明毅宗朱由檢崇禎七年，後金皇太極天聰八年），藏巴汗企圖勾結在青海的蒙古卻圖汗，想以武力一舉消滅格魯派，在此情況下，五世達賴與其師父羅桑曲吉堅贊不得不向外尋求外援，在此需將十七世紀初葉額魯特蒙古情形酌為說明，按額魯特或作厄魯特，明時稱衛拉特或作瓦剌，至清初（仍為後金）有四部，分別為：準噶爾、杜爾伯特（此兩部係蒙古崛起時之林木中百姓後裔）、土爾扈特（此部係鐵木真時代克烈部之後裔）此三部原本皆非蒙古族，而後融入蒙古，屬於蒙古別支，另有和碩特部，係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裔，因爭奪大汗之位不成，向西投入衛拉特集團，和碩特係蒙古本支；另有一輝特部附牧於衛拉特集團，明末崇禎年間衛拉特諸部以準噶爾部在巴圖爾琿台吉領導下（琿台吉，鴻台吉均為漢語皇太子之蒙語音譯），力量最為強壯，而當時各部人、畜均大量增加，為爭奪牧場，時生齟齬，由是土爾扈特部在其首領和鄂爾勒克領導下，西徙今裏海之北、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駐牧；和碩特部在固始汗領導下，向東到今寧夏阿拉善一帶駐牧，稱霸於漠西，頗具威名。五世達賴與羅桑曲吉堅贊共同商議，祕密派人向和碩特部固始汗請求率兵入吐蕃保護格魯派（按當時衛拉特四部曾議定各貴族均派一子到吐蕃出家為格魯派喇嘛·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即派其子噶爾丹到拉薩為喇嘛）<sup>17</sup>，格魯派與衛拉特蒙古有密切關係（衛拉特一詞，入清後稱額魯特或作厄魯特，以下皆用額魯特，而吐蕃入清後稱西藏，以下行文皆用西藏或藏地），因此固始汗（或作顧實汗）願意協助格魯派，兼以青海一地

<sup>16</sup> 見注 14 所引書頁 459。

<sup>17</sup> 見克珠羣佩主編《西藏佛教史》，頁 460。

之草場較阿拉善為佳，能殲滅占有青海之卻圖汗，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誘因。

固始汗、五世達賴及羅桑曲吉堅贊等密商後，決定先消滅卻圖汗，占有青海，擴大和碩特部地盤；其次消滅支持噶舉派的白利土司（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最後入藏消滅藏巴汗，一切如固始汗的計劃順利進行。固始汗率軍控制西藏後，以羅桑曲吉堅贊，於西元 1645 年（清世祖福臨順治二年），援吐默特蒙古阿勒坦賜贈索南嘉措「達賴喇嘛」名號之例，固始汗贈羅桑曲吉堅贊「班禪博克多」尊號，從此始有「班禪」名號，（本文之前使用班禪一詞，是為明瞭起見）。按「班」是「班智達」的省稱，是梵語的音譯，其意為智慧；而「禪」是藏語「欽波」一音的省譯，其意為「大」；至於「博克多」是蒙古語對睿智英武之人的尊稱，合而言之就是具有大智慧而又英明勇武之意，而且被視為是無量光佛的化身。羅桑曲吉堅贊也援達賴之例，向上追尊宗喀巴大弟子凱珠格勒巴桑布為一世班禪，一世班禪的轉世索朗喬朗為二世班禪（1439~1504 年）、溫薩巴•洛桑頓珠為三世班禪（1505~1566 年）。

清順治四年（西元 1647 年），清廷封四世班禪羅桑曲吉堅贊為「金剛上師」；順治九年，清廷封五世班禪到北京時，原要請四世班禪同時進京，四世班禪以年事已高（時已高齡八十六歲），不堪長途跋涉，所以未到北京，四世班禪於西元 1662 年（清聖祖玄燁康熙元年）辭世，享壽九十二歲，可算是高壽。五世班禪法名羅布藏伊喜巴桑布，意為「意善聖智」（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 122），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四月甲辰（陽曆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遣御史鍾申保、內齊陀音呼圖克圖賚敕往召五世班禪<sup>18</sup>（釋妙舟《蒙藏佛教史》稱此年「詔封後藏伊喜巴桑布為班禪呼圖克圖」有誤），同年封五世班禪以「額爾德尼」尊號，「額爾德尼」係蒙古語「珍寶」之音譯（以上見胡耐安《邊疆宗教》頁 39，35），從此班禪額爾德尼成為定稱。

## 二、從互為師徒到壓迫追捕

自四世班禪羅桑曲吉堅贊親自為五世達賴剃度，並為之授戒傳法，從

<sup>18</sup> 見《清實錄》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四月甲辰條。

此形成班禪、達賴互為師徒之傳統，如果就喇嘛教而言，班禪、達賴地位平等，而四世班禪對達賴一系有再造之恩，若無四世班禪治好藏巴汗之病，辭謝藏巴汗之厚賜，但求准予讓四世達賴轉世，則達賴一系「法脈」早已中斷，而四世班禪對五世達賴之護衛、教導，可說是無微不至，恩重如山，凡此均為鐵一般之史實。

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法名班賓益希（此為胡耐安《邊疆宗教》所載名稱。劉家駒《班禪大師全集》作般登益西，法名羅桑般丹益西巴桑布。釋妙舟《蒙藏佛教史》作羅布藏巴勒墊伊喜），於清乾隆六年（西元 1741 年）在扎什倫布寺坐床，乾隆三十年（西元 1765 年）九月庚子，乾隆帝諭曰：

「班禪額爾德尼年齒長成，經典淹洽，復教導達賴喇嘛經卷，理宜加恩冊封。著交該院照例辦理（該院指理藩院，見《清實錄·乾隆朝》三十年乙酉九月庚子條，見《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340）。

從上資料可知六世班禪仍然是八世達賴的師父。由於有許多世達賴均屬未成年或甫成年即辭世，如九世僅得年十一歲（1805~1815 年），十世二十二歲（1816~1837 年）十一世十六歲（1838~1855 年）十二世二十歲（1856~1875 年），因此班禪為達賴之師父之時間，遠超過達賴為班禪師父之時間，就師徒傳承面向看，班禪地位顯然高於達賴。

四世班禪全力護衛五世達賴，並合謀邀請和碩特部蒙古固始汗進軍青海，消滅蒙古卻圖汗，占有青海以之為根據地，進軍消滅藏巴汗，摧毀噶舉派在藏地的勢力，從此就喇嘛教而言，格魯派（黃教）在藏地一枝獨秀，但政治權力則由固始汗掌握，絲毫沒有讓五世達賴分享，雖設有第巴一職，協助固始汗處理藏地政務，但第巴是固始汗親自挑選任命，自然唯固始汗之命是從，但五世達賴天生睿智野心勃勃，深知固始汗智勇兼具，且手握大軍，自是小心翼翼，雌伏於固始汗威權之下，宣稱：

「壬午年（接係西元 1642 年）二月二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敬歸順。霍爾曆二月二十五日（霍爾指蒙古），依“時輪”算規為新年開始之日，汗王（指和碩特固始汗）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王令如大

白傘，覆蓋于三界之頂首。<sup>19</sup>

可見對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之統治西藏，表示完全臣服，當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一再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與五世達賴所說「汗王（固始汗）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完全相違，如果不是十四世達賴與其流亡政府不讀書，就是睜眼說瞎話，欺騙美歐日社會大眾，其用心相當可議。

在固始汗統治西藏時期，五世達賴確實臣服於固始汗，但固始汗去世後，其後繼者一連三個對藏地政務都不感興趣，由是天生睿智的五世達賴，先後換了兩、三個第巴，初時還請示固始汗後人核定，但固始汗後人對藏地政務不感興趣，最後五世達賴逕自任命其徒弟桑結嘉措為第巴，此人點慧無比，深得五世達賴之信任，認為師徒二人，毫無分別，宣稱桑結嘉措所作，等同五世達賴所為，且予公開布告稱：宣告桑結嘉措所作所為與（五世）達賴本人所為完全一樣<sup>20</sup>，從此自蠶食蒙古和碩特部對藏地的統治權，更進而鯨吞之，終於全盤掌握了政教兩權<sup>21</sup>。不僅如此，五世達賴為阻止清朝進軍西南地區，更鼓動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率軍東掠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牧地（按漠北喀爾喀蒙古，即後來之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喀爾喀蒙古之大活佛，也為喇嘛教格魯派「四聖」之一，另一為章嘉呼圖克圖），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敵，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主導下，向南逃入清朝上駟院所屬之達里崗崖牧場（上駟院為清廷宮中掌管牧場之機構。達里崗崖牧場在漠南蒙古錫林郭勒盟北部，但今已被外蒙古侵占），迫使清廷不得不調集兵力向北阻止。噶爾丹東侵，甚至南掠，清康熙為此曾三次御駕親征深入漠北，確實延緩將西藏納入版圖之時程<sup>22</sup>。不僅如此，五世達賴與吳三桂也有使

<sup>19</sup> 見五世達賴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128，按該書原名《天神王臣下降雪域（西藏）陸地事迹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因過於冗長，譯注者將之改為《西藏王臣記》。

<sup>20</sup> 見夏格巴·旺曲德典著，劉立千、欽饒威色、扎西尼瑪、羅潤蒼等多人漢譯《藏區政治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上冊頁253。

<sup>21</sup> 關於五世達賴蠶食鯨吞統治藏地政治權力詳情，可參見《衛拉特三大汗及其後人》一書，頁58~70。

<sup>22</sup> 關於五世達賴教唆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詳情，可參見劉學鈺《額魯特蒙古與達賴喇嘛》，該文輯入劉著《少數民族史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4年，頁

者往來（可參見《清實錄·康熙朝》）。總而言之，五世達賴時期，與中國清朝的關係是陽奉陰違。

五世達賴辭世後，最初認定之六世達賴倉央嘉措，雖有極高的文學天賦，但卻浪蕩成性，好吟唱情歌，而且眠花宿柳，完全違背出家喇嘛戒律，固始汗後人拉藏汗遣使向清朝康熙帝奏報：桑結嘉措所立之倉央嘉措，不是五世達賴真正的轉世靈童，他終日沉湎酒色，不守清規，請予廢立<sup>23</sup>，康熙命將倉央嘉措解送京師，在解送途中於青海貢嘎諾爾附近病逝，（另有多種說法，因非主題，不贅），於是另覓六世達賴，在尋訪、認定過程中，清廷曾徵詢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意見，可見清廷對班禪額爾德尼之重視，同時也凸顯班禪額爾德尼對達賴轉世靈童之認定，具有決定性之影響。

乾隆四十四年（西元 1779 年），適逢乾隆古稀七秩華誕，特邀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晉京祝賀大皇帝古稀大壽，朝廷為接待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來京，特在熱河承德修建一座寺院，供班禪駐錫，這座寺院仿照日喀則扎什倫布寺格局，有兩座金塔殿、佛殿、僧舍等，陳設供餐三所依的稀有供物；又在北京修繕西廣寺，頗為宏佛壯觀<sup>24</sup>，可見中央朝廷對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之禮遇與重視。

關於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晉京恭賀乾隆七秩華誕一事，《章嘉若必多吉傳》有頗詳細之記載，該《傳》稱：土豬年（按藏曆紀年係五行配十二生肖，土豬年即己亥年，西元 1779 年），「班禪仁布欽（按今多譯為仁波且，藏語也作『朱古』，一般漢文多譯為活佛，但並不妥適）駕臨多麥（即青海）的塔爾寺過冬，鐵鼠年（即庚子年，西元 1780 年），從多麥起程，經（內）蒙古地區，繼續前往。這時，章嘉喇嘛奉旨前來七海寺迎接（按即多倫諾爾，地當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多倫縣）」，按章嘉呼圖克圖係清朝所封唯一國師，也為黃教「四聖」之一，在喇嘛教格魯派地位上，與達賴、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量齊觀，清廷之

83~108。

<sup>23</sup>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57。

<sup>24</sup> 見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著陳慶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許德存譯《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1996 年，下冊，頁 802。

禮敬班禪額爾德尼於焉可見。西元 1780 年七月二十二日，班禪額爾德尼一行抵達熱河，在熱河行宮謹見乾隆皇帝，乾隆帝對章嘉呼圖克圖說：「呼圖克圖今日顯得格外高興。」章嘉回奏稱：「今日施主與福田相會，天氣宜人，緣起很好，使人格外高興。」（見注 24 所引書，頁 805），所謂「施主福田」之說似是起於此（之前是否有此說，由於未能遍讀羣籍，不敢斷定），此後由章嘉陪同班禪額爾德尼遊覽熱河各處園林，之後來到專為班禪大師修建駐錫之須彌福壽寺<sup>25</sup>。

次日（七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親自駕臨須彌福壽寺，看望班禪額爾德尼，並說：

「在朕七旬大壽慶典之際，爾班禪額爾德尼前來祝壽，對此方之佛法、眾生都有利益。朕多年來雖從章嘉呼圖克圖學習了一些佛法，然佛法如大海般深廣，朕須料理國事，不得閒暇，未能參究呼圖克圖所授佛法，只是竭力而已。今日我們施主福田相會，可謂前生之誓願與發心之良緣，得以如願以償。朕要向喇嘛求學多種教法。朕以前不會說藏語，為了你的到來，抓緊時間努力向呼圖克圖學習日常用語，但不夠熟練，有關細小的佛法術語，可請呼圖克圖担任翻譯。」<sup>26</sup>

乾隆對於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能來北京為其七十古稀之壽誕祝嘏，至感高興，於七月在避暑山莊淡泊誠敬殿接見六世班禪，並在清曠殿賜坐，饗以茶果，乾隆即詩曰：

「祝釐遠至邕宗風，三接欣于避暑宮。敬一人而千萬悅，垂名冊亦乃予同。（邕，通暢）

雪山青海胥增忭，色屬精金許獻衷。初見宛然舊相識，本來如是非神通。（忭，快樂。屬，音計，類毡之毛織品）」

同月庚子，乾隆御萬樹園，賜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等宴，賞賜金幣等物，乾隆又吟詩曰：

<sup>25</sup> 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外八廟之一，仿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形式建築，專為由西藏前來祝賀乾隆七秩高壽的六世班禪大師而建。

<sup>26</sup> 見《西藏通史》，頁 805。

「聖僧永祐永祐遲，神御巍臨欲觀宜。今佛云當拜古佛、  
古時希有見今時。」

舊藩新部益生敬，設席承筐共受釐。中外一家逮葱嶺，大  
清萬載鞏天禧。」

可見乾隆對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之來京祝嘏，至為高興，特待以殊禮，賜以重寶，按清初康、雍、乾三帝皆天生睿智，凡事均能洞燭先機，但又不願落下痕迹，順治、康熙時，已意識到喇嘛教格魯派對蒙古民族之影響力，至深且遠，而格魯派自五世達賴從固始汗後人剽竊到政治權力後，更妄想擴充其「喇嘛王國」版圖，意欲將大漠南北乃至漠西、青海各部蒙古納入「喇嘛王國」版圖之內，康熙當時尚無力進軍西藏，自無法限制五世達賴之向外擴張，但俟其將準噶爾部噶爾丹逐出漠北後，漠北喀爾喀三部蒙古表示願意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盟旗（但保留三部及汗號），納入中國清朝版圖，康熙自然同意，從此禮遇漠北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意在使其與達賴平起平坐，不受達賴影響，也即使漠北外蒙古脫離達賴之影響（康熙將漠北蒙古納入中國版圖後，始有內、外蒙古之名詞）；不僅如此，更在漠南蒙古也即內蒙古扶立章嘉呼圖克圖，畀以國師尊號，提高其聲望，使之能與達賴抗衡，且多次派章嘉入藏調停格魯派內部爭端，凡此都是在拉抬章嘉之政治聲望，使之與達賴難分軒輊，揆其用意實在於使內、外蒙古雖仍佞崇喇嘛教格魯派，卻可以不受達賴之左右。而此次乾隆之特別禮遇、厚賜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揆其用意也是在拉抬班禪之聲望，以分達賴之勢力，有清一代從表面上看，似乎相當優崇喇嘛教格魯派（即黃教），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目睹蒙古族佞信黃教以至於難以自拔之地，乃因勢利導，鼓勵蒙人出家為喇嘛，清廷出資在草原上興建巍峨堂皇之喇嘛寺院，藉此麻醉、弱化蒙古民族，將昔時驍勇難馴蒙古人，遂利用黃教以馴化，乾隆曾於其御撰之《喇嘛說》中提到：

「……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諂敬番僧也。」<sup>27</sup>

<sup>27</sup> 原件見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但此處係轉引自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



可見清代之在內、外蒙古推崇喇嘛格魯派，有其政治目的，但又恐黃教達賴趁機擴張其「喇嘛王國」版圖，以至尾大不掉，所以又刻意扶植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呼圖克圖與內蒙古之章嘉呼圖克圖，使之能與達賴分庭抗禮，這一套作法，只能靠繼任者之心領神會，並未見諸文字或口傳，乾隆晚年曾頒定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位階，較高位階之仁波且（活佛）以「金瓶掣籤」方式轉世，其意在由中央政府掌握轉世之主導權，蓋當時大活佛之轉世極為混亂，形同作弊，乾隆即曾明白指出：

「……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即轉世靈童）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喀爾喀在雍正之前，僅有三部，雍正時增『三音諾彥』一部，始為四部，新增之三音諾彥部不稱汗），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sup>28</sup>

「金瓶掣籤」原是一個良好方式，既可避免認定轉世靈童時作弊，中央又掌握有轉世之主導權，誠一舉兩得之事，惜乎嘉慶嗣位後，未能體會乾隆之用心，當八世達賴辭世後，藏地依傳統儀軌尋訪其轉世靈童，僅得一人，奏報清廷請准免予掣籤，按清代規定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所有呈報中央公文，須經駐藏辦事大臣轉呈，不得直接呈奏朝廷，經查嘉慶十年（西元 1805 年），八世達賴之轉世靈童隆朵嘉措始生，之後被認為靈異特具請准免予掣籤，時駐藏大臣為玉寧（嘉慶十年至十三年 1805~1808 年在職）<sup>29</sup>，此一玉寧若非對十餘年前（乾隆御製《喇嘛說》頒佈於乾隆五十七年，西元 1792 年）建立之金瓶掣籤無知（果若不知有金瓶掣籤之制，則不配出任駐藏辦事大臣），則應是受藏中僧俗高層之蒙蔽，竟同意請准免予掣籤之奏摺轉呈朝廷，而嘉慶也竟然予以核准，使金瓶掣籤制有了例外，從而可知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如何黠慧，總在設法突破中央的法令。

回過頭來看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京期間，自當年（西元 1780 年，乾

頁 28。

<sup>28</sup> 見乾隆御制《喇嘛說》注 27 所引書頁 29。

<sup>29</sup> 見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1796~1911》，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58~160。

隆模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一連十天在北京觀賞歌舞表演，均由章嘉呼圖克圖作陪，七月二十六日參拜普陀宗乘廟時章嘉也陪同，班禪在大法會上講授兜率百尊母續法。二十九日在大佛寺舉行九朵瑪法會，乾隆帝與六世班禪在法會上相遇。八月三日，乾隆帝賜班禪一顆刻有漢字「寶」字之印。八月六日在須彌福壽寺舉行祈願大法會，八月七日班禪在乾隆七秩華誕聖典上獻壽祝福，總之，此次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晉京可說是行程滿檔<sup>30</sup>，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一直停留到十月二十七日，為乾隆帝講完隨許法，回到駐場之寺院時，微笑著說：「現在我想做的一切事業都已經完成，感到特安樂愉快。」似在暗示一切功德圓滿可以離開塵世，在旁的章嘉聽出言外之意，感到不妙，立時加以勸說，但班禪回到黃寺後，身體情況已然不對，雖經章嘉診脈及祈禱，均未見效，次日（十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親來探視，並囑章嘉身邊陪護，至十一月一日傍晚，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黃寺安然辭世<sup>31</sup>。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北京辭世後，其在北京所得諸多賞賜，法會供養等均運回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其數量相可觀，依照喇嘛教格魯派習俗，此等巨額財富均歸未來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所有，但六世班禪之同母異父兄曲珠嘉措（或作卻朱嘉措），為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十世活佛<sup>32</sup>，認為其同母異父弟六世班禪之巨額遺產，他有繼承資格，乃向扎什倫布寺索討，扎什倫布寺自是不允，曲珠嘉措勾結廓爾喀（即尼泊爾），由廓爾喀率軍攻入日喀則，將扎什倫布寺財物掠奪一空，此事引起清廷重視，立即派遣四川成都將軍鄂輝、副都統佛智、四川提督成德、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等率滿、漢土屯各營兵三千名，火速入藏救援<sup>33</sup>，將廓爾喀軍逐出藏地，更追逐至廓爾喀首府陽布城（今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迫使廓爾喀投降，討回所掠財物，並禁止噶瑪噶舉派紅帽系轉世，此事為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晉京祝賀乾隆七秩嵩壽之行的一段插曲。

<sup>30</sup> 詳細行程可參見《西藏通史》，頁 804~808。

<sup>31</sup> 同注 30 所引書頁 809。

<sup>32</sup> 噶舉派下之塔布噶舉系，其下又分噶瑪噶舉等四支系，噶瑪噶舉喇嘛扎巴僧格（又名旺古熱巴，西元 1283~1349 年），元帝室曾封之為灌頂國師，並賜予一頂紅色法帽，從此稱紅帽派，以轉世方式相傳。

<sup>33</sup> 見《西藏通史》下冊頁 815~816。

上文提到自四世班禪時，班禪與達賴均互為師徒，成為定例，而自九世達賴以至十二世達賴共四世，九世達賴得年十一歲（1805~1815 年），十世得年二十二歲（1816~1837 年，親政僅二年），十一世得年十八歲（1838~1855 年），十二世得年二十歲（1856~1875 年），而同時期七世班禪享壽七十三歲（1781-1853 年）八世班禪也得年二十九歲（1854~1882 年），均較達賴年長，因此達賴多為班禪之徒弟，兩系關係應屬極為密切，但自十三世達賴轉世坐床後，情形有所改變，按十三世達賴其法名全稱為「阿旺羅桑圖丹嘉措直占旺楚雀賴藍布爾解旺德」，簡稱圖丹嘉措，由於其「靈異特著」，奏請朝廷准其免予金瓶掣籤，清廷於光緒三年六月戊子（西元 1877 年七月十四日）得旨：

「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即作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毋庸掣瓶。」<sup>34</sup>

由是於光緒四年（1878 年）正月十二日在貢湯德娃尖寺，由八世班禪額爾德尼為其剃髮授戒，次年（1879 年）六月十三日迎至布達拉宮坐床，按此時已進入清朝季世，列強侵略紛至沓來，不平等條約頻頻簽訂，俄英為謀稱霸中亞，因西藏地勢高亢，具高屋建瓴地緣優勢，均想控制西藏，俄羅斯以其境內有布里雅特蒙古族及土爾扈特（時已稱為喀爾瑪克）蒙古族<sup>35</sup>，此兩部蒙古族均篤信喇嘛教格魯派，而且又都是黃種人，在外觀上與漢人、藏人無甚差異，俄羅斯遂派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多爾智（此人有五、六個化名，顯非善類，曾受間諜訓練），進入拉薩，以重金

<sup>34</sup> 見《清實錄·光緒朝》光緒三年六月戊子條，此處係錄自《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4416。

<sup>35</sup> 布里雅特蒙古聚居於貝加爾湖周邊，原為我國領土，清康時，五世達賴教唆準噶爾部蒙古噶爾丹東掠漠北三部蒙古，而噶爾丹又勾結俄國東侵西北利亞東部外興安嶺地區，康熙不願兩面作戰，在與俄國於雅克薩作戰獲勝後，於西元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將布里雅特蒙古聚居地區，自貝加爾湖至額爾古納河（黑龍江上游）之間之割地予俄羅斯，布里雅特蒙古族遂淪為俄國臣民，詳情可參見劉學鈔《額魯特蒙古與達賴喇嘛》該文輯入劉著《少數民族史新論》一書，台北南天書局，2014 年，頁 84~108。至於喀爾瑪克蒙古，係土爾扈特蒙古，初聚牧於今新疆塔城一帶，明末因與準噶爾部蒙古部爭牧地，乃舉部西徙裏海北境伏尔迦下游東西兩岸之地駐牧，嗣因不堪俄羅斯強徵暴斂，決定於 1775 年俟伏尔迦河冰凍後，河西部分涉河而東，舉部重返中國，不料是年天氣反常，至約定之日，河水猶未冰凍，河東部分先行東返，河西部分只得仍留原地，遂被稱為喀爾瑪克，意為留下者，詳情可參見馬大正、馬汝珩《漂落異域的民族》，劉學鈔《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

結交藏地僧俗高層，謀得為十三世達賴之侍講（時達賴尚在童稚之齡）職位遂得以朝夕均在達賴身邊，從此夜以繼日灌輸十三世達賴「親俄、離中、反英」意識，從此十三世達賴一面倒向俄國，英帝國自是不甘落於俄國之後，屢次表示要與西藏往來、派人入藏經商，都遭西藏所拒絕，英國於西元 1904 年強行以武力進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在英軍進入拉薩前一晚，率若干僧俗官員向北經青海、甘肅逃往外蒙古，原意是要進入俄國，只以當年俄、日在我國東北發生戰爭，俄國敗，英日係同盟，因此俄國不敢接待達賴進入俄境，清廷正與央國交涉，一時不允達賴返藏，而達賴又與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無法在庫倫停留，又不願返回內地，遂在庫倫之西三音諾彥部逗留，名為弘揚喇嘛教，實為接受蒙人「供養」，此時清廷認為如任令達賴在外蒙古游蕩，實不妥當，乃派官員到外蒙古命其返回內地，初在青海塔爾寺暫住（中英仍在談判，英方仍不同意達賴返藏），但達賴人格特質怪異，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容，又到五台山禮佛，此時英國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有所接觸，又以脅迫方式強邀九世班禪到印度，與東來訪問之英國王子見面，達賴對班禪遂產生怨懟，之後達賴到北京謁見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在北京期間與英國駐中公使朱爾典有所接觸，達賴為求能返回拉薩，一改其反英立場，全面親英，恰逢光緒、慈禧先後駕崩，乃趁朝廷忙於國喪之際，奏請返藏，朝廷不查竟准其返藏，時為 1908 年。

十三世達賴返拉薩後，全面倒向英國，對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怨隙更深、晚清朝廷欲在西藏行新政，派川軍入藏，川軍軍紀敗壞，在拉薩胡作非為，危及十三世達賴，又逃往印度，受到英印超規格接待，遂益堅定其親立場，且萌脫離中國傾向獨立，辛亥槍響，民國肇建，達賴返拉薩，驅逐川軍離藏，自此與中央失去聯繫，民國二年（1913 年）更與外蒙古簽訂兒戲式之《蒙藏條約》，雙方互承認彼此為「獨立國」，既要「獨立」，則需擴大藏軍編制，乃向藏人增加稅賦，更將徵稅、徵兵箭頭指向後藏日喀則地區，連扎什倫布寺也不能倖免，九世班禪要求協商，十三達賴以閉關拒之，待其閉關期滿，班禪派四人代表前往拉薩協商，噶廈政府竟將其中三人扣押，班禪感覺到自己生命安全已受威脅，如不離西藏可能會遭逮捕處死，於是決定於民國十二年（西元 1923 年）十一月十五日夜

間，「密率僧俗上差十五人，乘黑夜赴納當、崗金，涉藏青大河，經節那而入曠野草地。此路平常商人，需二月之程，佛（指班禪而言）等星夜遄行僅七日七夜而到，時藏中尚無人知覺。」<sup>36</sup>班禪額爾德尼出走三日後，也即十一月十八日晚，班禪之索本堪布羅桑堅贊、曲本堪布旺堆諾布、森林堪布甘登饒結、古嘉堪布羅桑般丹、羅桑杰加、仲譯青布王羅皆（或作王樂皆）、大卓尼鍾蘇郎、德匡巴夏慈仁、僧綱桑結甲錯、蘇德巴羅桑圖丹、羅桑呷德、大天堪布羅桑郎嘉、蘇討巴普澤、騎木澤旺麻青木普布次子、暨尖禮隨從八名、唸經喇嘛四名及僕役共一百餘人，趁夜逃出，追趕九世班禪一行，（以上所有人名採自《班禪大師全集》），此一百多人渡過藏青大河時，幾遭滅頂，事後據渠等稱：所以能安然渡河者，幸賴三寶加被，始得免於溺斃，此百多人疾行五日五夜，終於追上班禪一行，會合後如向南行，可以通往青海之大路，但班禪突然決定改向北，一隊人馬只得隨之北行，事後始知，如向南行，恰好會遇上拉薩派來的追兵，如被噶廈追兵所捕，後果不堪設想，（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僧俗高層官員殺人手法繁多，但極少公開行刑，總是在暗中下手），扈隨班禪出走一眾，對班禪大師之神異均感敬佩。從此班禪一行力避大道，涉江踏雲，曲入山路，苦行三日到子聰草榻，遇到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師父養珠大師之回脚駱駝百峯，慨然以贈，於是從此始有代步工具，班禪額爾德尼一行乃得以安然到達內地。

### 三、班禪在內地活動及其辭世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因感到生命遭受威脅，決定逃離西藏，他不像十三世達賴首次出逃竟逃往外蒙古（原想逃往俄羅斯，只因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而英日向有同盟關係，故不敢接納其進入俄境），第二次出逃逃往印度，完全無視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事實，甘受外人蠱惑誘煽，實有愧「智廣如海」之名號，就風格而言，實不如九世班禪甚多。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以下均僅稱班禪）一行既已出逃，十三世達賴及其噶廈政府所派追兵，又無法追捕到班禪，據有關文獻記載，十三世達賴

<sup>36</sup> 見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班禪堪布會議廳出版，中國邊疆學會發行，1943年，頁36。

及噶廈為掩飾班禪因感生命受到威脅而出逃的事實，而偽稱班禪臨行前，曾給四大扎倉之活佛及僧俗執事人員留下一份囑托文告，此項「文告」大意略為：

「達賴雖有慈悲之心，但為左右所蒙蔽，不按既有習俗、法規行事，對扎什倫布寺強徵軍餉及新稅、徭役，我為支付軍餉與額外稅賦，乃不得不到內地募化銀錢，求施主佈施；並稱：我離去後，希望四大扎倉全體僧俗人員等，須共同挑起重担，勤奮修持，做好佛事」云云<sup>37</sup>。

此處認定此一「文告」係十三世達賴或其噶廈政府所偽造，旨在迴避十三世達賴或噶廈政府之迫害，又設若果真班禪曾留下此一「文告」，何以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既未加收錄，也未提及有留下「文告」一事，其為偽造應屬無疑。

班禪一行百餘人奔向內地，及至民國十三年元旦，班禪命眾人歇息，時距班禪離藏出逃，已是整整一個半月，歇息時擇地搭起帳幕，聊慶國家新年，其仲譯青布即名此平壩為「喜雄」（係藏語音譯，其意樂壩），歇息之後，繼續向東前進，於元月十一日到東普染，已是商賈往來之「大道」，又經半月，班禪命王羅皆等往蒙古台吉諾爾牧場採買（按青海湖四周有蒙古青海左、右翼兩個盟共二十九個旗駐牧），幸遇外蒙古之珠堪布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屬蘇本羅桑圖丹等專誠供養，於是當地蒙古王公籌搭大型帳幕，率眾歡迎班禪一行（以上均參採劉家駒編譯《班禪大師全集》），從此脫離險境。

班禪一行於民國十三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到達甘肅省安西縣（查其地望清代為甘肅安西州，民國初年稱安西縣，其地在今甘肅省敦煌市東北，今稱瓜州縣，可參見陳潮編《中國行政區劃沿革手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0年，頁184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1年出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頁162），安西縣長陸恩泰對突然到來之

<sup>37</sup> 見李蘇·晉美旺秋《噶廈政府和什倫布寺拉章之間矛盾的由來》一文，該文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頁55~61；另，團康·洛桑德吉，《九世班禪出逃內地前後》一文，該文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頁5~6。但此處係參採自祝啟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頁101，按此書係祝氏遺著，由其妻趙秀英女士整理後付梓。

班禪一行，除熱烈歡迎悉心款待外，不知應如何後續處置，乃立即電告甘肅督軍陸洪濤，陸洪濤也不知應如何處理，乃電北洋政府大總統曹琨，北京得知此一消息後，決定援清代迎請六世班禪之前例與接待規格，按此意見應是當年北京政府蒙藏院的建議，時蒙藏院總裁為蒙族名王貢桑諾爾布，北京政府遂電告陸洪濤本此精神將班禪迎到蘭州，陸洪濤乃遵令電告安西縣長陸恩泰令其為護送員，護送班禪一行到蘭州，並指示沿途各地負責供應一切優予接待，不得怠慢，按安西在甘肅省西部，東去蘭州一千多公里，乃換乘騾轎，沿途經玉門、酒泉（肅州）、張掖（甘州）、武威（涼州）而抵蘭州，在過酒泉時，酒泉鎮守使吳某出面恭迎於道，並留住三日；經張掖時，鎮守使率民眾及附近寺院僧眾拈香恭迎；抵武威時，鎮守使馬廷勵以班禪心傾祖國，率眾舉行盛大歡迎會，在班禪駐錫處以黃緞鋪張，備受優崇禮遇，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到平番縣（今蘭州市永登縣）在該縣過端午節並稍事休息，班禪派蘇本堪布羅桑堅贊打前站，先行到蘭州向督軍陸洪濤致意，並安排班禪抵蘭州後有關事宜，班禪則改乘陸洪濤從蘭州派來八人抬扛的大轎，於農曆六月抵達蘭州、駐錫富擅寺，當班禪一行到達蘭州郊外時，甘肅督軍陸洪濤率文武官員、僧俗百姓數千人郊迎，從北京趕來的「迎護專使」李乃芬也率百人衛隊迎候，並宣佈大總統曹琨簽署賜予班禪「效忠闡化」封號，一掃其在藏地所受之冤曲。（以上多參採祝啟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

班禪在蘭州暫住期間，曾上書北洋政府大總統並獻哈達，該上書略稱：

「前由國務院寄下鈞諭，令於秋涼謁見，並蒙厚意優待，不勝欣幸之至。」

「特派曲本堪布及大堪布噶金曲批二員，恭請大總統金安，呈進哈達、長壽佛、黃氍毹二匹，懇請賞收，余班禪額爾德尼甚願瞻觀顏色，一俟稍涼，當即來京謁見面呈一切。」<sup>38</sup>

由此可見班禪確實心中有國家民族意識，與十三世達賴之挾外自專可說是別若霄壤。

<sup>38</sup> 見《班禪大師全集》，頁38。

民國十三年（1924 年）八月，班禪奉北京政府之命離開蘭州，踏上赴北京之路，「迎護專使」李乃芬率百名衛隊護送，經平涼（今甘肅省平涼市，在蘭州之東）取道西安北行，過平涼時，鎮守使張兆鉀率眾郊迎，時正逢直奉兩系軍閥開戰，曹錕下台，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在西安一帶則有劉鎮華、胡景翼兩軍對峙，無法通過火線進入西安，平涼鎮守使張兆鉀以前方不靖，挽留班禪一行在平涼多住時日，而甘肅督軍也致電平涼，要班禪暫回蘭州，但班禪急於晉京，毅然決定繼續前行，行至乾州（今陝西省咸陽市禮泉縣，已近西安），時迎護專使力主暫停前進，班禪乃派大卓尼鍾蘇郎等前往交戰雙方交涉，請允准通過防線進入西安城，交戰雙方「均以大師愛護祖國，遠道來京，竭誠歡迎，各令地（方）官吏負責送出防線」，可見軍閥雖然蠻橫，但對班禪之心向祖國，仍由衷表示尊敬，是年十二月十日，班禪一行安然進入西安城，守城之劉鎮華率隊迎接班禪於城門外，迎入後暫住八仙庵，優禮有加款待殷切；在西安停留期間，班禪因沿途所見軍閥鬥爭純為私利，置百姓福祉於不顧，甚而屍骸遍野，至為不忍，對軍閥之內戰深痛惡絕，乃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發出）通電全國各部院、各省市、各軍民長官轉各幫辦、會辦、總司令、司令、軍長、護軍使、鎮守使、師旅長、法團、報館、呼籲和平<sup>39</sup>，充分顯現其悲天憫人慈悲心懷，這與五世達賴派濟隆呼圖克圖等七十多喇嘛到準噶爾準噶爾丹軍中，協助準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甚至助紂為虐之作為，與班禪相較實是天差地別，仁與不仁於焉可見。

班禪在西安向全國各界發表通電後，離開西安取道山西太原，向北京前進，陝西督軍劉鎮華派官員護送到潼關（在陝西省中部東端，再往東即進入山西省境），越黃河山西督軍閻錫山即派宋道尹率員前來迎接班禪一行，同時改乘汽車赴太原，抵太原時軍民數千迎於道左，且鳴炮致敬，閻錫山親迎入城，時值農曆除夕（陽曆 1925 年一月二十四日），班禪一行在太原與山西省各界領袖同賀春節，在太原期間曾向北京政府臨時執政致賀書，並派堪布羅桑囊木嘉持賀書及禮物等晉京恭遞，民國十四年一月底，段祺瑞電請班禪進京，並派其長子段宏業，北京蒙藏院代表圖桑諾爾、蒙古王公桑巧及章嘉呼圖克圖等人前往太原迎請班禪來京。二月二

<sup>39</sup> 見祝啟源前揭書頁 103。



日，班禪在北京政府派出之迎接專員陪同下，乘專列火車起程進京，抵達北京時受到北洋政府代表、蒙藏院官員、雍和宮喇嘛及數不清的軍民歡迎，進城後駐錫中南海之瀛台，次日即晉謁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報告藏務及東來使命」，段祺瑞表示「一俟國內安定藏事當可迎刃而解」（以上參採自《班禪大師全集》，頁三十九。）

此時北京正準備召開善後會議，並依據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佈之《善後會議條例》之規定，會議需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參加，據此達賴方面指派頓柱旺結，班禪則以人已在北京，乃就地指派羅桑監贊，另有名義上北京政府所派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實際並未入藏）則指派朱清華與會，用示藏族參與國家重要會議，僅具象徵意義。

此後班禪到東北、內蒙古、華北等地宣揚喇嘛教法，普受內地各族同胞歡迎與景仰，與此同時組成「班禪堪布會議廳」，負責辦理班禪各項政教事務。民國十六年（1927年）四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班禪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賀，次年三月，國民革命軍第六路前敵總指揮兼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為班禪派其四川代表宮敦扎西呈請內附事，呈文國民政府，該項呈文頗具參考價值，茲將之全文引錄如次：

「為據情轉呈事。按據班禪派遣四川代表宮敦扎西呈稱，為呈請鞏固國防，挽救弱小事。緣西藏佛教，以達賴、班禪為主教，蓋西藏佛教普及之地，人民無不尊重信仰達賴及班禪也。達賴駐於前藏拉薩，班禪駐於後藏之筍什倫布，而其政治主權，前藏有一藏王，後藏有一夏白吐藩王，均直接由清政府委任。凡民財諸政，雖自行裁斷，尚須時同駐藏大臣商行。當光緒二十九年時，藏王登莫鋪被達賴及諸大臣同謀定罪，拘禁逼死，從此教政兩權，咸歸達賴專職管握。宣統元年，達賴由京回藏，備聞邊務大臣趙爾豐至，在西藏竭力經營，整頓川軍大隊行進。藏官見勢不逮，日漸消滅，乃欲聯英為外援，時受運動。忽聞漢軍已越江達，而西筍營，相距拉薩只有數日途程，於是達賴畏罪，潛逃印度。時清帝聞達賴已出，曾宣佈罪狀，褫革其名號。這時駐藏之聯欽差、鐘統領等，請班禪到前藏，各民政事，同心合作。自此後藏僧民與漢軍互相為援，一

切餉糈，莫不臂助。至民國元年，達賴乘機回藏，驅逐漢官，解散漢兵，宣言西藏獨立。隨即侵犯西康，占十餘縣地，解決漢軍彭日升統領全部。是達賴妨害於中國，與中國仇怨之一點也。繼而擴充軍備，重興差役。對於班禪及後藏僧民，因為親漢之故，嫉恨在心。乃勢迫借詞定罪，罰巨金資。班禪無奈其何，只得就力量能及者，莫不遵從唯唯。繼又迫令每年納餉銀五萬磅，每磅合華銀五十兩，軍糧青稞十萬克，並將後藏重要辦事人員，置之於獄。班禪見事不佳，無辜定罪，迫令如是，只得將所有數百年儲存佛用器具以及金銀、名馬，一概寄獻達賴。再三要求而不免，不得已，率隨從騎，潛行離藏入京。達賴聞班禪潛行，遣重兵追趕，幸未受遭危險。今班禪數千里苦苦到北京者，思漢藏自吐蕃與大唐和親以來，歷宋元明時皆朝貢中國；清代更為接近，直接管握政治。西藏之主權，均在於中國。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民心無不仰賴，如嫁如繼，相提相攜。維持西藏佛教之秩序，解決政治之腐敗，皆求援於漢。殊英帝國主義者日張其勢，種種侵略之利牙，自西侵蝕，可謂危極矣：藏若失亡，康亦莫保。斯時不惟康藏唇亡齒寒，國家其必為動搖矣！敝班禪觀念及此，非鬥爭個人之利權。所以遠來中原，急急再三要求者，欲求中央政府，以期早日解決康藏邇後之政策，並求脫離英人之侵略，鞏固國防，使萬民相安，廣化佛教，班禪不勝最大希望。今敝班禪到京四載，常見內部各省戰事尚未解決，並在分裂中，對於康藏未顧及。現尚有他國派員來謁敝班禪，並許幫助擔任一切。敝班禪志尚未屈，宗旨正大，豈能輕盼他國相助，故損我國國體？當此漢藏一家，族類相關，但川、甘、雲三省，與康藏歷史素起輻輳，乃最密切者。惟獨四川，故凡關於康藏諸務，時常仰賴川省為前題，中央為後盾。是以鞏固國防，拯救康藏民眾於水火，惟諸軍長是賴。敦以庸才，自前年由京奉命代表川甘後，於今夏進藏。盤桓數日，關於康藏最近情形，略有所聞。達賴新運大批槍彈到藏，與英人日益親善。對於達賴政治方面，分出新舊兩派，

以宗教關係，事事無不由中竭力挽回舊派，即宗教喇嘛也。事雖如此，惟軍財主權，概歸新派掌握，如英國走狗之類。至於路政鐵道，已達大吉嶺。又由杠多至複司馬開修馬路，均有數萬里許，尚繼續進修。倘不速圖挽救主力之方，則西藏之境，終歸於他國所有，不為中國有矣。前彭統領駐康時，已失去十餘縣分。人民苦於藏關苛虐，鶴淚狐悲，無他伸屈，日望真正國民軍人出關。現所有未失之南北兩路，計十一縣分，自反正以來，多數長官敷衍搪塞，只圖個人充囊之計。常為民眾之要求，且重捐卡款，使民生計日迫，不能解決。於是盜賊蜂起，強悍稱雄。自康定以西，惟獨巴塘有少數軍隊，亦不成其偉大事業，不過虛名而已。至於行政及商業，日漸縮小冷落。現康屬有許多無識僧民，以為西藏恃有英人援助，日趨文明，建築旅屋，圖以保險樂居。凡是邊民無依歸，深受頻年兵燹之苦，雞犬不寧。生計愈演愈窮，大有印度亡國前轍之形。蓋自趙爾豐經營西康以來，迄今將近十餘年，皆高談治邊，遠為吶喊，而實際一無確定實行，又無明瞭之表示，是以康事愈趨愈混亂。藏人睹此現象，乃鼓吹噓使定鄉、鹽井、德榮各縣人民，將地方縣知事相繼驅逐，圖收漁人之利。此即最近康藏之情形也。以上所呈各節，敬懇我軍長垂念康藏人民一致擁護川局，各表親善，努力合作，向西進行，則可挽回主權，只享國民幸福。不然，達賴靡弱，大受英人野心侵略，康藏人民，流離悲痛，慘烈胡底，對於國防，曷可勝言？瀝血陳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情。據此。查西藏關係國防，今班禪篤念救國，情殷內附，未便拂其所請。理合據情轉呈，伏候鈞裁。謹呈國民政府。”<sup>40</sup>

從上項呈國民政府文，可以看出十三世達賴曾拘禁藏王逼迫而死，並為擴充軍備，重興差役，其逃印期間，清廷所派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統領鍾穎邀班禪到前藏，共商處理藏地政教事務，由是達賴銜恨在心，及至民

<sup>40</sup> 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128~130。

國肇建，達賴返藏，發動第一次「驅漢事件」<sup>41</sup>，並開始逼迫班禪，遂有逃亡內地之事，更可發現班禪對國事之關心，對藏事之懸念，其心向國家令人欽敬。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表面上國家統一，走向建設之路，實則不然，西藏在十三世達賴控制下，與中央始終採取若即若離態度，新疆則先後在金樹仁，盛世才統治下，雖然承認新疆為中國領土，但並不聽命於中央；外蒙古則在蘇聯操控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除在口頭或文宣上堅稱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領土外，實則對之莫可奈何。至於內蒙古方面，一些在內地求學或赴日本留學之內蒙古青年，則要求內蒙古自治，一時蔚為風氣，時內蒙古舊王公錫林郭勒盟西蘇尼特旗扎薩克德穆楚克棟魯普（兼副盟長，初襲郡王，民初晉為親王，一般稱之為德王，以下均稱德王），想搶得內蒙古自治運動的主導權，但因年事尚輕，資望不足，必須別出「奇策」，以提高其在蒙人中之聲望，同時他深知蒙人佞信喇嘛教，而班禪在蒙人心目中受尊敬的程度，超乎一般政治人物之上，於是德王想透過班禪以提高自己在蒙人中的聲望，遂於民國十八年（1929 年）發起，由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邀請班禪到錫盟貝子廟（在今錫盟首府錫林浩特市）弘法（事前已與班禪身邊之多位堪布談妥），舉辦時輪金剛法會，此一法會為期長達一個月，德王對班禪執禮甚恭，每日三次向班禪頂禮跪拜，狀至虔誠，班禪見德王誠意十足，遂以見達賴時始行的額頭碰額頭之大禮回敬<sup>42</sup>，此不僅給足德王面子，也使德王在蒙人心目中增添許多份量，聲望以是大見提升，對德王推行內蒙古自治運動也增添幾許助力，其實德王內心是想勾結日本搞內蒙古獨立（或許是日本誘煽德王），德王以推動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及伊克昭盟（今已改稱鄂爾多斯市，至於東部蒙古各盟，已被日本所控制）實行自治為名（隱去暗中勾結日本行為），徵詢班禪意見，班禪不知德王暗中勾結日本之事，回答以：「錫、烏、伊三盟會商蒙事很好，現在正是時候了，積極去做就對

<sup>41</sup> 指民元十三世達賴由印返藏驅逐川軍及在藏漢人而言，詳情可參見《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sup>42</sup> 見大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料委員會編《偽蒙古軍史料》，內蒙古文書店發行，1990 年，列《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三十八輯，頁 3。

了。」<sup>43</sup>德王得此「鼓勵」，更積極推動內蒙古自治運動，實則是更向日本靠攏，這一部份是探討班禪論著中較少提到的。

班禪自民國十二年底離開西藏，至民國十九年（1930 年）已有七年之久，其到內地，是逃難性質，終究想返回西藏日喀則自己的寺院扎什倫布寺，遂於民國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函國民政府，請求協助其返回西藏，但其時十三世達賴內則想獨裁西藏，外則甘受英印誘煽意欲脫離中國，在此內外條件激盪下，十三世達賴及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豈能同意心向祖國之班禪回藏，而當時國民政府雖然號稱統一，但西北各地仍由地方勢力所掌握，中央政府力量進不了青海、西康，對西藏更是鞭長莫及，更時時以中英邦交為重，對班禪要求協助其返藏一事，可說是心餘力拙愛莫能助，及至民國二十年（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東三省淪陷，其全面侵華動作日益囂張，國民政府為培植抗日實力，既不可能也不願以武力護送班禪回藏，更何況外交系統，總以中英關係為優先考量，政府對護送班禪回藏一事，轉趨消極，班禪心中之鬱悶當可想見。

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極具爭議之十三世達賴辭世，照理此時是班禪返藏最好時機，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幾乎全為親英印分子所把持，仍是千方百計阻止班禪返藏，詳細情形可參見拙撰《析論九世班禪返藏事件》，該文刊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215 期（2018 年九月），於此不贅，班禪返藏願望始終未能完成，竟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十二月一日在青海玉樹結古寺溘然辭世。

#### 四、西藏地方噶廈妄想操縱班禪轉世

九世班禪原定於民國二十六年底返回西藏，但因身體不適，原定十一月十五日啟程赴西康，不得不延緩行程，數日後病情惡化，護送班禪大師回藏專使趙守鈺急電蒙藏委員會，請求速派能「妙手回春者」到玉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十二月一日上午二時五十分謝世，得年五十五歲。班禪在彌留之際，曾留下遺囑，交待身後諸事，趙守鈺將其遺囑電達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其遺囑全文為：

「余生平所發宏願，為擁護中央，宣揚佛化，促成五族團

<sup>43</sup> 見《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該書列《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十三輯，1984 年，頁 8。

結，共保國運隆昌。近十五年來，遍游內地，渥蒙中央優遇，得見中央確對佛教尊崇，對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堅。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擬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道圓寂。今有數事切囑如下：後藏政務，前已委定羅桑堅贊為扎薩喇嘛，使有宣化使職，亦著由彼暫代。在未到職前，印信暫交丁杰佛，并由堪布會議廳及回藏設計委員六人共同負責，仍宜請示中央，聽候處置。至宣化使署槍枝，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餘獻與中央，洪濟國難，俟余轉生，再請發還。又，關於歷代班禪所享權利，應早圖恢復。最後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共和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扎薩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繼吾志，以促實現，此囑。」<sup>44</sup>

國民政府接蒙藏委員會呈報班禪示寂後，對此極為重視，一則決定追贈班禪為「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名號，并致贈治喪費一萬元；再則特派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前往西康康定致祭，並處理護送班禪返藏行轅及西陲宣化使行署善後事宜。

班禪驟然辭世，其屬下人員頓失所依，內部惶恐不安，其中有極少數心懷異志，基此趙守鈺担心藏軍趁機窺伺，乃電請中央要求將班禪靈柩移到康定，此議也徵得班禪行轅同意，中央即批准趙守鈺之議，是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班禪靈柩離開玉樹，移往康定，次年元月十八日靈柩送達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因康定氣溫較高，恐遺蛻不耐高溫，不敢繼續南下，遂在甘孜對班禪遺蛻按藏族喇嘛教傳統方式進行防腐處理，其後因防腐關係，無法再行移動，移往康定之舉遂作罷。

但班禪遺蛻問題仍有待解決，班禪行轅方面提出要將班禪遺蛻運回西藏，並提出下列具體意見：1.請中央派兵早日以武力護送班禪遺蛻回藏，2.如因抗戰軍興，暫難派兵護送，則請中央授權西康劉文輝與護送專使趙守鈺妥籌回藏辦法，3.如前二者均難辦到，則請中央授權各堪布自行向西

<sup>44</sup> 見《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頁 415~416。趙守鈺致蒙藏委員會宣布班禪遺囑電。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前所引書，頁 219~220。

藏地方噶廈政府交涉回藏方式<sup>45</sup>。蒙藏委員會對以上三項意見，前兩項均有窒礙難行之處，同意由各堪布向噶廈直接交涉，並將洽商情形呈報中央核定後，酌派人員護送至邊境。其後班禪行轅為班禪善後事，派丁杰活佛劉家駒到重慶洽商，班禪駐京代表羅桑堅贊也從香港轉道到達重慶參與洽商。經過詳慎研究，由藏蒙委員會擬就班禪善後處理辦法，此一辦法共有八項如次：

1.西陲宣化使公署應予裁撤。

2.班禪行轅暫予保留，辦公費照發。

3.班禪年俸停發，應否另行酌給撫慰金，請院、會決定。

4.班禪駐京辦事處仍予保留。

5 班禪駐京辦事處附設補習學校，由教育部及蒙藏委員會會同查明，擬具辦法呈核。

6.西陲宣化使公署無線電台，其原由交通部發給者，仍交由交通部處理，餘由班禪行轅擬具辦法呈核。

7.護送專使行署俟戴院長赴甘孜致祭後即行結束儀仗隊亦于同時撤回，行署及儀仗隊經費，均就原有核定數目統籌核撥。

8.其餘各項，均照蒙藏委員會原擬辦法辦理。<sup>46</sup>

此處第八項所說「其餘各項均照蒙藏委員會原擬辦法辦理」，其中有班禪遺囑中所稱：「至宣化使署槍枝，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餘獻與中央，洪濟國難……」，蒙藏委員會已作核定，關於槍枝問題，尚有一小插曲，蓋當時風傳班禪追隨者（即西陲宣化使署）擁有步槍七千餘枝、機槍、大小砲若干，西康軍閥劉文輝對這批武器頗垂涎，有意令其交出，用以擴充己身實力，班禪隨從人身方面，自是不允，雙方一時劍拔弩張，衝突頗有一觸即發之勢，事為中央所悉，以當時正值全民抗戰之際，宜乎全國軍民團結一致槍口對外，豈可兄弟鬩牆，影響抗戰士氣，由是乃派軍事委員會西昌行營主任張篤倫，蒙藏委員會參事趙錫昌立即馳往康定，對雙方人員力事勸導，歷時半月，此一風波始告和平落幕，班禪行轅即行遷往青海玉樹，而張篤倫乃西去甘孜等處，宣慰班禪左右，安撫僧俗，處理

<sup>45</sup> 轉引自祝啟源前揭書，頁 220。

<sup>46</sup> 見《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前揭書頁 221。

其他諸多善後事宜。<sup>47</sup>

九世班禪既已辭世，班禪堪布會議廳之扎薩羅桑堅贊、唐曲雅丕堪布等，遂著手循藏地喇嘛教格魯派習俗，尋訪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轉世靈童），初步在青海、西藏、西康等地尋得聰穎敏慧靈童十六名（見祝啟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列出十六名幼童姓名、年庚、屬相、籍貫、家世等），但克珠羣佩之《西藏佛教史》一書稱尋得靈童九名，此處採祝氏十六名之說（見祝氏之書頁 319），按九世班禪轉世靈童之尋訪，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曾指定魏降巴攜帶噶廈公文，與扎什倫布方面尋訪靈童代表共同尋訪，並決定一俟尋獲靈童，即行派員回藏報告，時為民國三十年（1941 年），換言之此十几名幼童其中必有一人係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同時在尋訪過程中，有噶廈所派的代表參與尋訪，這等同此十六名幼童是經過十四世達賴（時尚在稚齡，未參予政教事務，由攝政代行其政教職權），攝政熱振呼圖克圖、拉毛藏巴護法神、色嘉喇嘛、帕邦喀喇嘛、玉樹拉卜寺隆主佛、拉卜楞寺孔堂佛、西藏多吉秀丹護法神（應即二十多年前，被十四世達賴廢掉之雄丹護法神）、塔爾寺坦吉多連護法神、策覺林佛、拉卜楞寺拉古佛等所認同<sup>48</sup>，也就是說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必在此十几名幼童之中，不可能另外再出現九世班禪的呼畢勒罕，除非根本上否定有「轉世」這一說法。

於是尋訪小組一方面派員將十六名幼童向藏方報告，一方面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將名單向蒙藏委員會呈報。羅桑堅贊在向蒙藏委員會呈報中，將所尋獲靈童逐一加以介紹，尤其對貴德（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尋獲之隆熱嘉措、及共和（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尋獲之索南旺堆的介紹特為詳細，並初步認定此兩名幼童「慧性堪深，靈異昭著，且能認識先佛法器，并其舉止、態度、言語、形容各方面，確有班佛再世之象徵，且該二童降生地址及生產前後發現奇異朕兆，與藏方降神及高明卜筮者所推算情形適相吻合。」此外尚有五名幼童也甚為靈異，似均為轉世靈童正身人選，呈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電告，

<sup>47</sup> 見高長柱《西藏概況》，1953 年由高氏自行出版，但列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一，上項槍枝事件見頁 66~67。

<sup>48</sup> 見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185~188，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所著前揭書，頁 318。



該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令其對赴藏向噶廈報告尋獲轉世靈童人員，給予協助，以利後續工作之進行<sup>49</sup>。

蒙藏委員會對九世達賴轉世一事極為重視，也至為慎重，一方面徵求其駐藏辦事處探詢噶廈方面意見，另一方面徵詢班禪行轅、班禪駐京辦事處意見，綜合各方面看法，再參照蒙藏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日以會令公布之《喇嘛轉世辦法》，堅守清代以來中央對蒙藏地區位階較高之喇嘛其轉世需由各該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籤（見該辦法第三條，至於掣籤，指清乾隆時的規定「金瓶掣籤」，或稱「金奔巴掣籤」），也即蒙藏地區喇嘛教位階頂高之喇嘛如：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等，其轉世均須報呈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籤，此乃堅持自清乾隆以來凡是位階較高的喇嘛，其轉世都需要經過中央核定的程序辦理（即掣籤），如僅尋訪到一位靈童而又「靈異特具」時，也需報清廷，經中央特准始可免予掣籤；第九世、十三世達賴即是經清朝皇帝特准免予掣籤；十三世達賴因受俄國籍布里雅特蒙古喇嘛多爾智蠱惑，兼以當時中國清朝衰敗，遂懷「親俄、離中、反英」意識，其後又為要返回藏地，竟一面倒向英國，二、三其德一至於此，因此民國建立後，竟對中央採若即若離態度，故其辭世後，尋訪轉世靈童時，竟未事前請示中央，但民國政府仍以最優遇方式，特准其免予掣籤；延續自清乾隆以來凡達賴、班禪等高位階喇嘛轉世，均需中央認可之歷史傳統。

上文提到班禪謝世後，經扎什倫布寺、噶廈所派代表班禪行轅人員等，共同尋訪其呼畢勒罕，共尋得十六名幼童，照道理說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必然在此十六名幼童之中，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幾全為親英份子）妄想操縱班禪之呼畢勒罕，處處採取不合作態度，當時國民政府為「以昭公允而資各方信服」起見，特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 年）三月二十六日，由行政院院會通過（時行政院院長為蔣介石）《認證班禪呼畢勒罕辦法》，令蒙藏委員會遵照辦理，該辦法為：

- 1.班禪轉世靈童由班禪徒屬尋訪。

- 2.班禪呼畢勒罕候選人，准由西藏宗教首領就班禪徒屬所報靈童中負責認定三名。

<sup>49</sup> 同注 48，見祝著書，頁 320。

3.呼畢勒罕候選人三名決定後，由西藏地方政府呈報中央派員在拉薩大昭寺舉行掣籤，籤定一名為呼畢勒罕。

從上列三項中，可知中央並未干涉班禪轉世靈童之尋訪，且班禪與達賴原本就是兩個系統，班禪之呼畢勒罕由其徒屬負責尋訪，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而且尋訪之後之靈童候選人，准由西藏宗教首領就候選中認定三人，然後呈報中央入瓶掣籤，此乃極公正之作法，而且也符合有清一代之慣例，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別有居心，意在擺脫中央政府，要想一手操控班禪轉世靈童之認證，據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首任處長，任期 1940.4.1～1943.10.8）得知，噶廈中重要官員曾向原班禪行轅人員表示，「他們（指原班禪行轅人員）依附中央沒有什麼好處，須及早回頭（指投向噶廈依附英印，搞脫離中央的勾當），勿任他人干涉。」<sup>50</sup>這等同預示噶廈政府對班禪堪布會議廳羅桑堅贊等所尋訪之十多名靈童別有意見，要班禪堪布會議廳再多方尋訪靈童，這只是表面說詞，我人應知西藏政教高層講話向來隱晦，直白的說就是要班禪堪布會議廳順從噶廈的意向，「尋訪」噶廈所指定的幼童為班禪的呼畢勒罕，羅桑堅贊自有其智慧，認為噶廈是「處心積慮，詭譎莫測」，難保不會「不惜端藉口發生意外阻礙，或者遷延時日，故意搞亂，或者妄作主張，自行決定，致我佛（指班禪）轉世前途橫生波折。」<sup>51</sup>可見在英印政府操控下的噶廈政府，有意奪取班禪轉世靈童的意圖，已是司馬昭之心矣。

班禪堪布會議廳羅桑堅贊並非庸儒之輩，雖不會屈服於噶廈之詭計，但也無力反擊。噶廈之作法，除向蒙藏委員會請求主持正義外，不得不向青海政府主席馬步芳尋求支持，羅桑堅贊對馬步芳說：

「（噶廈）年來對決定（班禪轉世靈童）正身事不願決定者，其陰謀所在：1.襲用尋訪達賴（靈童）之故技，希圖欺騙，2.欲在彼（指噶廈）勢力範圍內偽造班佛靈童，避免中央勢力入藏，以遂負固不服之心。堅贊等為迅速完成事功，並為粉碎前藏之陰謀計，謹擬辦法：（1）、青海尋得三人即為正身候選，擬仿照達賴七世在塔爾寺決定先例，由此三名決定一名；

<sup>50</sup> 見祝啟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頁 321~322。

<sup>51</sup> 見注 50 所引書頁 323。

(2)、決定時，敬請中央指派大員主持，並召集拉科佛、班佛之師、塔爾寺全體活佛等，在班佛業師宗喀巴誕生之塔爾寺舉行隆重之決定典禮。」<sup>52</sup>

青海省主席馬步芳認為羅桑堅贊所說合情人理，乃致函蒙藏委員會，其函略為：

「(羅桑堅贊所稱各節)極有見地，本府(青海省政府)復查屬實，似應准予照辦，以赴事功，而慰邊情。」<sup>53</sup>

羅桑堅贊不僅向馬步芳陳情，同時也向蒙藏委員會(時委員長為吳忠信，以新疆省主席兼長蒙藏委員會)及行政院院長蔣介石陳情；時蒙藏委員會也認為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工作應已完成，不應拖延，以免夜長夢多橫生枝節，但吳忠信為人老成持重，對藏人、藏事有相當瞭解，已明白噶廈初則藉口尋訪靈童不夠週延，冀圖拖延，繼則想方設法力圖避免中央介入，且拒不執行中央政令，其意在擺脫中央，為此吳忠信提出以下兩點意見，供中央參揀，其意見為：

1.由西藏當局自行認定班禪呼畢勒罕一人，報請中央核定後，派員主持坐床典禮。

2.採納羅桑堅贊主張，仿七世達賴舊例，就所報靈童中，由青海拉果呼圖克圖及各大喇嘛以宗教方式遴選班禪呼畢勒罕候選人三名，報請中央特派大員在西寧塔爾寺宗喀巴大師座前舉行掣籤，決定一人為呼畢勒罕，就近暫安禪榻，容後再派大員護送回藏，定期正式坐床。

吳氏並對上述兩點意見詳析其利弊，但行政院長蔣介石否決吳氏所擬兩點意見，並指示：徵認班禪呼畢勒罕辦法應依照舊日體制辦理，於是一切又回到原點，但也凸顯蔣氏堅持中央對西藏事務擁有絕對終裁權(也即有絕對主權)不容稍有變更，此一堅持具有相當歷史、政治意義。

西藏噶廈方面果然又在班禪呼畢勒罕候選名單上動手腳，增加多個噶廈認可之靈童候選人，其用意是要讓班禪之呼畢勒罕產生於西藏地方；但

<sup>52</sup> 見祝啟源所著前揭書頁 323~324。按藏中傳說一世班禪係宗喀巴之弟子，不過其時尚無班禪之名號，其時法名為開魯哥魯巴桑保，詳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頁 121。

<sup>53</sup> 見《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31-232，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六日馬步芳致蒙藏委員會電。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前揭書頁 324。

羅桑堅贊深知噶廈想藉宗教手段為掩護，將藏內之孩童認證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之正身，用心可卑，為不讓噶廈詭計得逞，羅桑堅贊仍按喇嘛教格魯派傳統例規，在塔爾寺請阿嘉呼圖克圖（為塔爾寺住持，也為格魯派八大呼圖克圖之一）、賽多諾門罕、拉卜楞寺住持嘉木樣呼圖克圖等登坐法台，虔誠卜卦，又由卜筮夙負盛名之特雪多結羌卜卦，更請塔爾寺最受崇信之護法神唐本欽降神等喇嘛教傳統儀軌，都一致指出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降生在青海，且以尋獲靈童中之保慈丹最為靈異，慧性昭著，確係正身，遂將此一結果電告馬步芳，更呈請蒙藏委員會「速派大員飛青，正式舉行決定典禮，以繼法統而昭鄭重。」（見祝啟源前引書頁 326），時為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農曆正月。

依事理之常態，九世班禪轉世問題，到此應告結束，然而不然，不僅噶廈中親英官員對此不表同意，時人在拉薩之班禪行轅王樂階對此也有意見，遂使蒙藏委員會無法接受羅桑堅贊所謂「速派大員飛青，正式舉行決定典禮」，於班禪轉世問題又拖延不決，而且這一拖又是五年之久，在此五年期間（1944-1949 年）蒙藏委員會已經更換了多位委員長（吳忠信、羅良鑑、許世英、白雲梯、關吉玉），可見當時時局之不穩定，在許世英任內（1947.4.23~1948.12.22 在任），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仍然對班禪轉世問題玩弄花樣，當時噶廈曾致函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轉陳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信函，該信函係以類似宣紙之粗棉紙為之，長約 186 公分（上下左右頗多空白），寬約一公尺，寫字部分為長 167 公分，寬 50 公分，漢文在右直行，共有十行，占 17 公文（含落款），藏文在左橫行，共有 47 行，占 29 公分，是一份面積很大的文獻。



茲將此一檔漢文全文抄錄如次：

「駐藏辦事處陳處長請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先生鈞鑑頃由駐藏辦事處陳副處長轉來西文電詳論敬悉，茲因班禪大師轉世事三位靈童內二位轉生阿多地多（按阿多即安多，指青海省），特派秘書王樂階前往迎請去後，接到塔爾寺行轅執事

人及秘書王樂階等來電稱：靈童格窮扎喜已經夭亡，現存在靈童官保慈丹一名上單獨的要為決定，請扎什倫布執事人等轉為呈報西藏政府等語，因此扎什倫布拉章之素喜執事人員拉德密德僧俗人眾全體呈報前來，據報『前蒙承奉達賴攝政二位卦示將三位靈童迎入西藏，在釋迦牟尼佛前並同扎什倫布領袖扎薩喇嘛及素喜各活佛所有在政在野之辦事人員，拉德密德、民眾代表等全體集合場中央求桑打（等於抽籤）以定正身，進行坐床等因，奉此比這樣圓滿而關於人已釋惑之法，再好沒有，如此大恩更無可得，正獲妙果期近不料不得批示核下，被塔寺行轅執事惡徒無召（以下約四字破損）人擅專責權，將官保慈丹內容認定，舉行慶賀典禮，已經過如此放浪情事，班禪大師轉世事宜不但關於敝扎什倫布且有關於全藏人民等眾，應宜不違達賴攝政二位卦示之意，令何而自專將靈童官保慈丹單獨名上定要認定，誠如針錐上玩石，如此違令則政教何方難於理論，現靈童格窮扎喜若真夭亡時，將靈童官保慈丹應由敝扎什倫布拉德密德全體特派秘書王樂階（以下三字破損）等宜遵照藏政府意令迎回並專同敵方隨從人員勿延（以下約四字破損）啟程入藏，至藏境之迎請事宜，已蒙藏政府協助辦理矣。若由中央派遣護送官員，則既勞且耗，加之又恐覆先班禪入藏之轍，而藏政府亦有礙難，致使拖延，請中央不必派護送官兵事，由藏政府轉呈中央，是所至禱，扎什倫布寺全體僧俗民眾一致全叩。』等語，所求甚切，查行轅執事與迎請者（即王秘書人等）意見不合外，根本扎什倫布寺素喜辦事人員以及活佛僧侶民眾全體僧俗均與該行（以下四字破損）各懷意見不能相合，上述所呈之事，均屬實情。現所存之靈童官保慈丹及布拉瑪二位，若併能同時迎入拉薩時，不但為扎什倫布且為全藏僧俗民眾相信起見，在釋迦牟尼佛前虔求桑打卜定正身，以昭大信，若靈童格窮扎喜實係夭亡，則由內地迎請者，惟官保慈丹一名，應於本年內不違藏政府意令即要迎入西藏境內。又轉生於擦哇巴許之靈童布拉瑪，亦不忍如此長期擱延，迎請入藏之人

員應由扎什倫布寺特派即迎入藏，而不得照前拖延，可要速迎起程入藏事經由扎什倫布寺之素喜活佛及僧眾僧俗辦事人員所屬拉德密德民眾等曾與行轅執事及主秘書等專此前後去電矣。由巴許迎請靈童布拉瑪之人員，現已決定不久前往，故向藏政府請求發護照馬牌，已准照發矣。此間本意現所存之二位靈童同時迎請入藏後，在釋迦牟尼佛前虔求桑打卜定正身以昭大信，如陳上述辦理。至於所有扎什倫布職員內不知底蘊之輩，若有陳述謬理無稽自私之意者，望中央切勿聽信任用，若班禪正身決定後，向例舊章當然應予主辦扎什倫布寺之一切外，而此間西藏政府之政教兩權並無干係，而此次為西藏政府所轄屬的一個班禪靈童事，中央又何必定要特派護送官員來呢？希可不必派來是幸。昔年正式的先班禪入藏之時，名為護送隨帶中央官兵同來，因此西藏人眾驚疑交加，故而回不到本寺者，正為此也。此次為一靈童特派中央官兵護送，逾越藏境前來時，西藏人眾驚疑更甚，恐有礙延如昔也。現在中藏兩政府根本上之好情感現正加增上進隆治之際，請軫念於此同，班禪靈童希決勿派中央官兵護送逾越藏境前來為禱。嗣二位靈童均到達拉薩後，在釋迦牟尼佛前舉行桑打日期擇於何日決定後，屆時即電報，特此敬復查照為荷。

噶廈公所叩藏曆戊子八月二十七日印」<sup>54</sup>

上項西藏噶廈「公所」致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公文（見所附公文尺寸略為縮小局部圖），其行格式，或用語與一般漢文文件有極大不同，其出於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但公文署名為「噶廈公所」，見附圖）應屬無疑，但書法端秀老練，可能出於噶廈政府所僱用漢人抄寫員之手，整份

此後人員勿延午  
件僧俗均布該  
明入藏之人員  
身以昭大信如  
中央官兵同來  
及屆時當即電  
報特此

<sup>54</sup> 關於此一文件，係筆者於半個多世紀前，於台北市牯嶺街舊書攤購得，詳情可參見中國邊政季刊 211 期《從一件西藏噶廈公所致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公函底稿，看 1948 年秋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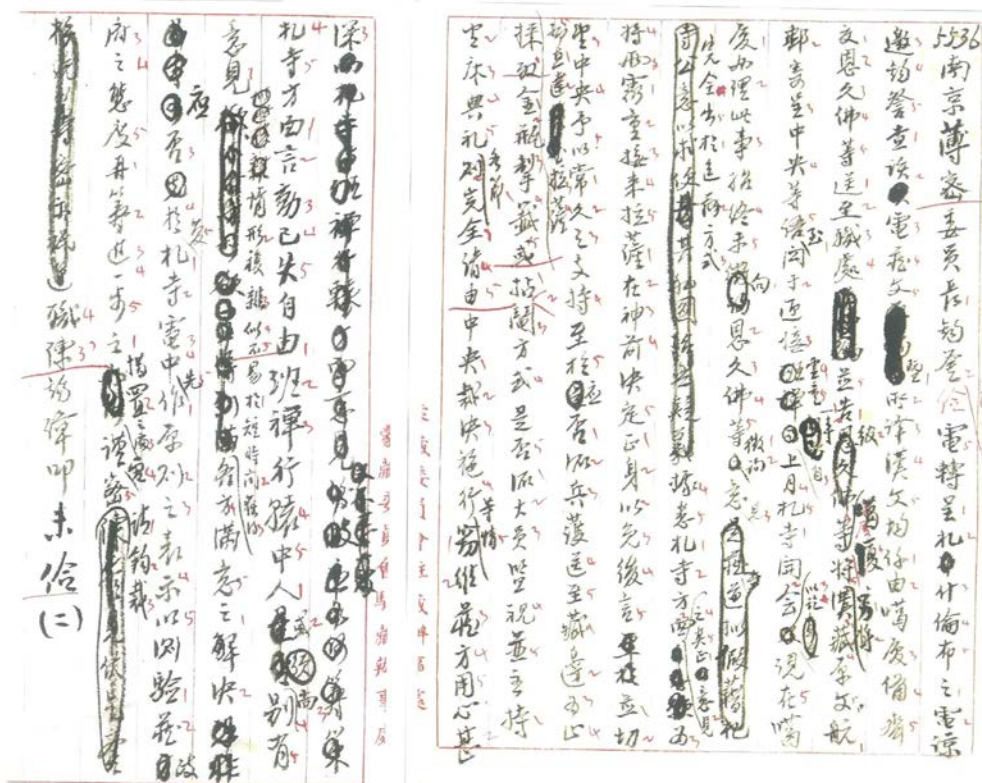
公文長達一千七百多字，但所敘述者不外：不認同中央所核定之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官保慈丹唯一人選，認為另有藏地尋獲之布拉瑪一人，應將此二靈童在釋迦牟尼佛前舉行「桑打」（即掣籤），同時極力反對中央派兵員護送官保慈丹入藏，此外就是對九世班禪大師行轅秘書王樂階表示不滿，如此簡單的三件事，竟用一千七百多字加以敘述，實屬「詞廢」，或許西藏地方官署公文習慣玩廢詞贅語之文字遊戲，此也正足以證明該公文確是出於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另有需特別注意者，在公文中稱西藏地方政府，均用「藏政府」，但在落款時則用「噶廈公所」（如附圖），如所周知，自民國以來地方行政組織，凡具法定地位者，均稱「政府」，如省政府、市（縣）政府，位階低於政府者，或未具法定地位者，多稱公所或公署，在 1934 年以前，內蒙古之盟部旗均稱公署，因此引起蒙人不滿，幾經陳情抗議，始於 1934 年通過《蒙古自治原則八項》，將蒙古盟旗公署改稱為盟旗政府。而該項公文落款自署「噶廈公所」，此種刻意自貶位階（但在公文內文中均稱「藏政府」），似乎與在討好中央，否則何會有此種過度自謙之稱謂出現？

從上項公文中，已可看出噶廈方面已自行尋出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雖稱要與中央核定之官保慈丹在佛像掣籤，此一意見看似客觀公正，其實所謂掣籤，但如果有心造假，仍非難事，如將預計之人選，把其籤條事先將之烤熱，再放入籤筒（或金瓶）中，則自然可以掣出預定之人選，藏地僧俗高層對此故優為之，所以堅持要已經中央認定之官保慈丹與噶廈所「尋獲」之靈童布拉瑪名條放入瓶中，有佛前誦經後掣出，可見噶廈對掣籤一事，早已成竹在胸。而班禪行轅在藏人員或受噶廈蠱惑，或遭噶廈脅迫，而有與堪布會議廳意見不合，關於這一點，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陳錫璋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 年）八月二十八日，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箋函中可以看出（時委員長仍為許世英），由於原函底稿字跡稍為潦草且無標點，更有多處塗改，茲經審慎辯讀並加以斷句，將全函引錄如次（原箋函影印附於文末）：

「南京薄密委員長鈞鑒，儉電呈扎什倫布之電諒邀鈞督，查該電藏文暨所譯漢文，均係噶廈備齊交恩久佛等送至職處，並告彼等噶廈另將漢藏原文航郵寄呈中央等語，至關於迎接靈



童一事，自上月扎寺開會以訖現在，噶廈辦理此事始終未向恩久佛等徵詢意見，完全出於包辦方式，據悉扎寺方面之真正意見為將兩靈童接來拉薩在神前決定正身，以免後言，並切望中央予以常久之支持，至於應否派兵護送至藏邊為止，抑直達拉薩，採取金瓶掣籤或拈鬮方式，是否派大員監視並主持坐床典禮各節，則完全請由中央裁決施行情形，竊惟藏方用心甚深，扎寺方面言動已失自由，班禪行轅中人或尚別有意見，情形複雜，似不易於短時間獲得各方面滿意之解決，應否於發扎寺電中先作原則性之表示，以測驗藏政府之態度，再籌進一步之措置之處，謹電密請鈞裁。職陳錫璋叩」<sup>55</sup>



陳錫璋電委員長現噶廈處理班禪靈童完全出於包辦方式而班禪行轅中人尚別有意見建議於發扎寺電中央先作原則之表示（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此項箋函原件影本如所附，其中特須注意的是「藏方（是指噶廈而

<sup>55</sup> 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2006年，第十二冊，頁401~402。



言)用心甚深,扎寺方面言動已失自由」,按班禪出走內地後,扎什倫布寺,已由噶廈派人接管,原扎寺之大小喇嘛其言行失去自由乃是必然之事,至於「班禪行轅中人或尚別有意見」,顯然以身在拉薩,受到噶廈誘煽蠱惑,甚至人身安全之威脅,始會有與班禪堪布會議廳羅桑堅贊等意見不同。

對於陳錫璋所提「應否於發扎寺電中作原則性之表示,以測驗藏政府之態度,再籌進一步之措置之處,謹電密請鈞裁。」按當時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底,國共內戰方殷政局動盪不安,蒙藏委員會許世英委員長對此似未作指示,而許氏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離職,此一箋函可能「歸檔」了事,靜態的公文可以不予處理,然而動態的九世班禪轉世靈官保慈丹卻不會因公文不處理而停止發展,西藏地方政府意圖否定班禪徒屬所尋訪之九世班禪呼畢勒罕官保慈丹,而以噶廈所尋獲之布拉瑪取代之(雖然表面說是將二童入瓶掣籤,但上文曾提到掣籤或拈鬮,仍然可以人為操控),噶廈之邪惡意圖已為班禪堪布會議廳及班禪行轅人員識破,自是更堅持官保慈丹為九世班禪呼畢勒罕之正身,此際藏中之攝政熱振呼圖克圖,竟被代理攝政打扎活佛及噶廈以親中央之罪名酖殺於獄中,這一幕活佛殺呼圖克圖之醜劇對喇嘛教格魯派而言,何其諷刺,而自此噶廈之反中央及走向藏獨,已是昭然若揭,以是對九世班禪轉世靈童問題,更是極力拖延。

當時國共內戰正如火如荼,國民政府幾是每戰皆敗,政權已呈日薄西山之勢,而中共建政已是指日可待,在此情況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鑒於西藏噶廈當局「狂妄心理因而加甚」,班禪轉世問題實不能再拖延。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一日,以青海塔爾寺法吉佛為首之二十七位高層喇嘛代表其所在寺院之全體喇嘛,聯名電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白雲梯(1948.12.22~1949.6.12 在任)表明官保慈丹確為九世班禪呼畢勒罕正身,籲請政府予以明令公佈並隆重護送入藏,如一時不能入藏,也請援清康熙五十三年(西元 1714 年)七世達賴在青海塔爾寺坐床生床之先例,派大員蒞青主持坐床大典,以順民意,此際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也於同年四月十八日致電白雲梯也作同樣要求,蒙藏委員會收到此兩項電文後,深感九世班禪轉世問題一再拖延,對邊政極為不利,經審慎考慮後,擬具以下兩項辦法:

1.擬請明令公佈官保慈丹為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此一稱謂有誤，既明令官保慈丹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即不應再用呼畢勒罕，可見當時蒙藏委員會缺邊政人才），並准在青海塔爾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員前往主持辦理。

2.關於護送第十輩班禪入藏事宜，擬俟時局平靜後再為籌計。<sup>56</sup>

其時行政院也以時局動盪不安，班禪轉世問題不宜再事拖延，乃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八日在第六十六次會議中做出如下決議：

「呈請總統明令公布官保慈丹為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並准在青海塔爾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員前往主持辦理。」

同年六月三日代總統李宗仁令曰：

「青海靈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圓、靈異夙著，查係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予掣籤，特准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自是官保慈丹成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遂成定案，蒙藏委員會乃遵照代總統令，積極籌備十世班禪坐床大典，此時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極度不安，雖則如此，國民政府仍注意到班禪坐床，可見對蒙藏邊政尚稱重視，行政院原指派白雲梯前往青海主持辦理坐床典禮，但當年六月十二日行政院忽然改組，由關吉玉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遂改由關吉玉前往青海主持此項大典，此項典禮於是八月十日在青海省西寧塔爾寺普觀



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坐床典禮

<sup>56</sup> 見 1949 年五月五日蒙藏委員會呈行政院函，輯入《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346~347，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前揭書頁 343。

文殊殿前大講經堂舉行<sup>57</sup>，由關吉玉與馬步芳共同主持，按其時國民政府已經遷往廣州，經費已是極端困難，仍為十世班禪坐床大典作相當大的支出，足見國民政府對蒙藏邊政甚為重視。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及其呼畢勒罕之尋覓乃至確認、坐床，歷練十多年，至此劃下圓滿句點，也為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大陸前所作最後一件也最有意義的邊政工作。

## 五、結語

在歷史長河中，「西藏」一詞晚至清代始出現，前此均稱之為吐蕃，吐蕃特（或作吐蕃特、圖伯特），其自稱為「蕃」（讀若伯），與中原發生關係始於中國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於其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以宗室女為文成公主，嫁吐蕃贊普松贊剛布，唐蕃關係相當和睦，及至唐中宗李顯於其景龍四年（西元 710 年），又以宗室女為金城公主，嫁吐蕃贊普赤祖德贊，贊普為公主別築城以居之，其時吐蕃確實並不屬於中國唐朝，這是史實，無須也無從否定。其後吐蕃力量壯大，不斷向東擴張，唐玄宗晚年有安史之亂，亂事評定後，國力已大不如前，對吐蕃之擴張，幾束手無策，帝都長安且曾一度落入吐蕃之手，吐蕃盛時曾北越崑崙山，占有西域諸綠洲小國，其勢力更一度伸入今中亞東部，但不久後吐蕃帝國崩解，諸部落各自為政互不統屬，此種情形一直延續到蒙古興起，在吐蕃地區喇嘛教薩迦派領導下，降於蒙古，及至元朝建立，元世祖忽必烈以薩迦派喇嘛八思巴為國師，將吐蕃十三萬戶稅賦賞予薩迦派，從此將吐蕃納入中國元朝版圖，此也是無可否定之史實，元代享祚甚短，元帝脫懽帖木身於西元 1368 年退出大都(今北京市)，明代元立，雖未直接派官統治吐蕃地區，但吐蕃地區喇嘛教各教派首腦均接受中國明朝所頒賜之法號，其吐蕃各教派各有其所轄寺院人民，並無統一之政治組織（政府），各教派首腦既接受中國明朝所頒賜之法號，吐蕃為中國明朝之屬地，也應是毋庸置疑。及清初力量尚未及於青藏地區，吐蕃當時在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統治

<sup>57</sup> 見劉學鈔《蒙藏委員會簡史續編》，蒙藏委員會，1996 年，頁 88；祝啟源前揭書也作八月十日。但之前蒙藏委員會編譯室所編《蒙藏委員會簡史》頁 115，作八月十二日，恐有誤。

之下，固始汗篤信喇嘛教格魯派（即黃教），因此在吐蕃地區格魯派一枝獨秀，當時格魯派有達賴五世與班禪四世為位階最高之兩位轉世喇嘛。

五世達賴天生睿智有極強之權力慾，雖已是黃教之首腦但仍覬覦世俗的政治權力，固始汗生前因其英明有為，五世達賴未敢輕舉妄動，及至固始汗死後，其子及孫對吐蕃地區政務不感興趣，於是五世達賴遂漸次剽竊世俗之政治權力，自蠶食而鯨吞，終於掌握藏地政權，及至中國清朝平定三藩之亂後，乃將吐蕃納入版圖，稱之為西藏，並派設駐藏辦事大臣，幫辦大臣，長川駐節藏地，設有駐藏辦事大臣衙門，在西藏重要地點派駐官兵以為防守，西藏成為中國清朝領土，乃是不可更易之史實。當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純屬一派胡言，不足採信。

自七世達賴以至十三世達賴之認定與坐床，均依乾隆晚年所頒「金瓶掣籤」規定產生，或經皇帝特准免予掣籤，其屬於中國清朝內部事務，也毋庸置疑。十三世達賴經中國清朝於光緒三年（西元 1877 年）三月特准「毋庸掣籤」，並於光緒五年舉行坐床，其時清朝業已隳敗不堪，外侮連連，俄英相爭相謀奪西藏，俄國派其布里雅特蒙古（見本文注 35）間諜喇嘛多爾智，以重金賄賂藏地高層僧俗官員，謀得十三世達賴侍講之職，從此夜以繼日灌輸十三世達賴「親俄、離中、反英」思想，於是十三世達賴對中央日漸疏遠，1904 年，英軍攻入拉薩前夕，達賴竟率親信百餘人逃往外蒙古，意欲進入俄境，惟以當年日俄發生戰爭，俄國大敗，而英日又係同盟，乃不敢接待達賴進入俄境，而達賴唯我獨尊之人格特質，不能與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睦相處，又不肯返回內地，只得游走庫倫西方三音諾顏部各旗，繼續吸取外蒙古人民之「供養」，此際清廷始派員到外蒙，促其速返內地，惟其時中英仍就西藏問題在談判，英方堅不讓達賴返回西藏，清廷遂命達賴暫住青海塔爾寺，但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融，清廷為息事寧人，乃命阿嘉到北京「當差」，形同鳩佔雀巢，未幾又要到五台山禮佛，之後又到北京陛見，在北京期間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多所接觸，態度丕然一變轉而全面親英，之後趁清廷光緒、慈禧崩殂之亂，返回西藏，未幾民國肇建前夕，入藏川軍軍紀不佳，達賴又逃往印度，英印政府待以國賓之禮，及至民國肇建，返回西藏，從此萌生脫離

中國念頭，民國二年（西元 1913 年），更與外蒙古簽訂所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獨立」，其後經中俄蒙三方洽商後，外蒙古改獨立為自治，《蒙藏條約》自然消失，自此西藏與中央形成若即若離態勢，但噶廈中充滿侵英分子，十三世達賴雖然辭世，但藏中親英離中氛圍並未稍改，熱振呼圖克圖任攝政時，雖然態勢稍有改變，革除若干親英官員，但不久在英印政府蠱惑下，親英分子反撲，竟將熱振呼圖克圖毆殺於獄中，西藏政局又由親英分子所操控。

班禪自逃到內地後，對中央多所貢獻，當十三世達賴辭世時，原是班禪返藏之大好時機，但噶廈極力反對，最後班禪於玉樹示寂，噶廈仍阻擾其遺蜕返藏，又對尋訪其呼畢勒罕一事多所干擾，更想操縱其轉世靈童之產生，中華民國政府於撤離大陸前夕，終於以強硬態度頒布命令確認官保慈丹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並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到青海主持其坐床典禮，按自九世班禪辭世，至十世班禪坐床，中間歷經十二年（1937~1949 年），其間中央始終以溫和及尊重西藏噶廈之態度，與之洽商，但噶廈始終以各種方式阻擾九世班禪遺蜕返藏、呼畢勒罕之認定，乃至操縱轉世靈童之產生，最後中央決定不理噶廈，毅然頒布命令正式認定九世班禪之呼畢勒罕，並舉辦十世班禪坐床大典，噶廈對此也無可以如何，從而可知前此之溫和、尊重方式，均屬無濟，處理西藏事務，應從此得到啟示。

## 錫伯族作為翻譯民族的回顧與前瞻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 摘 要

新疆錫伯族，一直有「翻譯的民族」美譽。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求生存的本能。因為錫伯族聚居一隅，且人數甚少，但伊犁向來是五方雜會之地，經常要與漢、維、哈、俄等其他民族交往。為了民族的生存，自然除母語之外，還得學會他種語言。「天才翻譯家」之說，與此不無關係。然而追溯原因，卻與錫伯部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三年（1694），忽蒙上級垂青，兩度擔任外交翻譯員，陪同俄國使臣伊茲勃蘭特，到尼布楚附近蒙古路驛站，處理俄羅斯使者「駱駝、馬等倒斃之事」有關。當時錫伯部社會形象欠佳，不易融入八旗軍旅。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為重塑錫伯部社會形象，將滿文底稿寫好，只要求錫伯「照滿文寫成蒙文文書」即可。此舉果然使錫伯部改頭換面，獲得「翻譯官」的新身分，而得以戮力從公。後來乾隆年間到了伊犁河畔屯墾，滿營、錫伯營、索倫營三營人員，只有錫伯營能堅持翻譯初衷，維持不墜。而滿營、索倫營卻缺乏這種歷史因子，後來走出的道路，也就與錫伯營大不相同。時至今日，為順應「一帶一路」新時代來臨，「翻譯的民族」當以「通心翻譯」自許，在邊疆乘地利之便，支持五通。並靠著戰略突破，創新民族地區人才培養模式，推動民族地區人才隊伍的國際化建設，參與這個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大規畫，以掌握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

關鍵字：錫伯 薩布素 翻譯 新疆 一帶一路

## 壹、前言

錫伯族主要分布在遼寧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口約 19 萬人（2010 年）。其族稱「錫伯」，在漢文古籍中，不同時期曾有多種不同譯音與寫法，如須蔔、鮮卑、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爾、師比、西卑、室韋、失韋、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錫北、錫窩等，直到明末清初時才統一稱為「錫伯」。<sup>1</sup>

關於錫伯族的族源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錫伯族源於古代的鮮卑，居住在綽爾河、嫩江、松花江一帶的鮮卑人就是錫伯族的先民。另一種認為，錫伯是地名，清代輿圖將海拉爾南邊室韋山一帶泛稱為「錫伯」，居住在這一地區的人因而得名。第三種說法是錫伯族與滿族同源，因為錫伯族裡有許多滿族的姓氏。據了解錫伯族對自己是鮮卑人後裔很覺得光榮而且認同。<sup>2</sup>例如北魏是由鮮卑人所建立的朝代，算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相當發達的時期。雲岡石窟佛像石刻藝術世界聞名，遊人如織。據說第十七窟佛像，是仿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容貌而建，<sup>3</sup>十分引人注目。

錫伯族世居呼倫貝爾大草原和嫩江流域，早年受到蒙古科爾沁部的控制。明末萬曆二十一年（1593），滿洲興起的「古勒山之戰」，<sup>4</sup>是錫伯族命運的轉折點，此後錫伯逐步歸服於滿洲。「古勒山之戰」只是一個開端，<sup>5</sup>當時錫伯雖被建州女真的努爾哈齊擊潰，但是並未離開蒙古科爾沁

<sup>1</sup> 唐屹等撰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 81[1992]，初版），頁 87。

<sup>2</sup> 戈思明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BOD 一版），頁 41。

<sup>3</sup> 余秋雨主編，《藏著的中國》，（臺北市：知本家文化，民 93[2004]，初版），頁 165。

<sup>4</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5-26。「昔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蒙古、錫伯、卦爾察等九姓之國，於明萬曆二十一年即癸巳年合兵來犯。其來侵之兵，受天譴責，故我獲勝耳。」「古勒山之戰」又可稱「九姓之師」來犯。

<sup>5</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 82]，第 1 版），頁 104。

部的掌控。直到清朝與俄國沙皇發生戰爭後，才為清朝所徵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爾沁蒙古人將錫伯、達斡爾、瓜爾察人獻給康熙皇帝，換取白銀，每丁白銀八十兩計價，從此錫伯人被編入八旗，駐防在齊齊哈爾和東北其他地區。<sup>6</sup>十八世紀中葉西遷至新疆察布查爾等地，現多聚居於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霍城、鞏留等縣。而在東北的錫伯族，多在瀋陽、開原、義縣、北鎮、新民、鳳城、扶餘、內蒙東部以及黑龍江省的嫩江流域散居。<sup>7</sup>

錫伯族人的語言與古代鮮卑人所說的鮮卑語不同。在元朝時期錫伯族曾學用過蒙語蒙文，清朝時期又學用滿語滿文。留在遼寧省的錫伯人以使用漢語漢文為主，而西遷到新疆的錫伯族軍民，不但保存了本民族的傳統語言文字，還又學得了其他民族的語言，如維吾爾語、哈薩克語、俄羅斯語等。<sup>8</sup>由於錫伯族人民不斷學習，保持獨特的多語能力，成為許多新疆人的溝通媒介，因此常被譽為「翻譯的民族」。<sup>9</sup>

各民族的語言特質不同，有許多成分是來自於歷史的條件。西遷到新疆的錫伯族人，能成為「翻譯的民族」，可能與其生存環境有關，有一位「老出版工作者」仲生，在〈錫伯族史·序言〉裡的描述，<sup>10</sup>十分精闢傳神：

遠在四十年前，不更世事的我，奉調乍到新疆，一頭扎到和闐，無從與任何一位錫伯族人士謀面，但從報端、從與同事閒聊中約略得知，錫伯族人很聰明，是天才的翻譯家。翻譯，在那年月奇缺，更不用說“家”了，當然是很受器重的。當時

<sup>6</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 82]，第 1 版），頁 118。

<sup>7</sup> 唐屹等撰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 81[1992]，初版），頁 90。

<sup>8</sup> 李樹蘭，仲謙編，《錫伯語簡志》，（北京市：民族出版社，1986[民 75]，第 1 版），頁 1。

<sup>9</sup> 關捷，《滿，錫伯，赫哲，鄂溫克，鄂倫春，朝鮮族文化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 1 版），頁 177。

<sup>10</sup>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出版年鑑》，（北京市：中國書籍社，1997，第 1 版），頁 341。仲生本名俞紹顯（1931.11—1996.9）浙江紹興人。副編審。



我心下還有些不以為然：天才之說很難界定，但凡一個民族，有先進，有滯後，可先進者未必個個聰穎過人，滯後者也未必人人愚呆。歲月的流駛，不單增添了兩鬢的白霜，也些微地填充了頭腦的空虛。久久未能忘懷的天才之說，也曾在心頭打過幾個滾兒。所謂天才，無非是正常的或稍高的智商，加上持之以恆的勤奮好學，最好再加上父輩的循循善誘而已。這一點宋代名相王安石在《傷仲永》一文中已斷析得明明白白。沒有後者做為土壤，只能是“小時了了，大卻未必”的平庸之才了。錫伯族聚居一隅，且人數甚少，但伊犁從來是五方雜會之地，經常要與漢、維、哈、俄等民族相鄰或交往，為了民族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他們自然地除母語外，還學會第二種，甚至第三種語言，“天才翻譯家”之說，與此不無關係，這當然不是深諳兵家“知己知彼”的結果，只是求生存圖發展的一種本能。是本能麼？也不盡然。即使在舊時代，民生凋敝的年月，僻鄉老嫗在女工、在茶飯之餘，不是在熒熒如豆的油燈下讀手抄的錫伯文本《三國》與《列國》嗎？《西廂記》、《紅樓夢》更是大姑娘小媳婦閑時的話題。婦女尚且如此，而況其他。衣食足，是求生的願望與本能，追求精神世界的馳騁，文化的富足，思想境界的拓展，則是超然物外的更深更高層次的要求。遙想當年，以“馬甲”起家的民族，不屑於赳赳武夫的蠻慙，卻去不倦地手捧四書五經，卻去填詞吟詩，追慕儒雅的風度。鞍馬弓箭、犁耕撒播之際，還透著縷縷書卷氣，鄉間巷裡飄著幽幽的墨香。相沿成習，時代變易，此風不減。錫伯族人民極度重視民族文化與教育提高的結果，其外在表現形式則是聰明。“艨艟巨艦一毛輕”的骨子裡，就在於“昨夜江邊春水生”。文化的乾涸，誰個聰明得了。普遍地重視教育，注重民族整體文化的積累，自然地能引發天才與聰明。錫伯族不乏學有專長、業有專攻的人士，他們的人數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在印象中，似乎各行各業的專業領域，都有他們施展才能之地。設若他們沒有向學好讀的傳統，一當孩子比桌子高，雖非

家計困窘，也讓孩子拿著三文不值兩枚的東西沿街叫賣，或者雖有萬貫家私卻讓孩子早早混跡於熙來攘往的市肆學習買賣之道，將來也可能大發其財，遺憾的是其結果他們只能從“方孔”中看天觀地了。若人人崇尚，其民族文化素質，豈不堪憂。<sup>11</sup>

仲生所寫與一般描述錫伯族的文章，外觀十分相像，據稱是他琢磨了四十年的感受。言談之間，看似平淡，卻又反映出不少新疆的特色，可說與眾不同。仲生認為，人不是因為生在多語言的環境中，就自然會變成「翻譯的民族」。還得又有許多其他的條件，才能建構出翻譯的素質。他在文章中提到：「雖非家計困窘，也讓孩子拿著三文不值兩枚的東西沿街叫賣，或者雖有萬貫家私卻讓孩子早早混跡於熙來攘往的市肆學習買賣之道」。而文中所述讓孩子沿街叫賣，在內地是罕見的景象。對新疆人卻是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反成當地特色。

原來這與阿拉伯文化有關。新疆是古代絲路的要衝，「重商情結」，一直存在。故而有人分析說：「絲路將基督教歐洲與東方諸國連接在一起，『整個』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的脊柱、脊髓、消化器官和動脈就是絲綢之路。其實，阿拉伯人有重商傳統，其商業活動由來已久。古老的希賈茲商路將阿拉伯半島與敘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印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sup>12</sup>這就難怪，新疆人的小孩賣水果的、烤肉串的、趕驢車的、砌磚牆的比比皆是，一切都以賺錢與否衡量，卻偏偏忘了進教室學習的重要性，以致「民族文化素質堪憂」。

而錫伯族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才因戍邊而西遷新疆的，還沒沾染上這種重商習氣，傳統上喜歡閱讀，重視教育。仲生舉例錫伯族有閱讀、朗誦的習慣。從舊時代起，僻鄉老嫗也愛看錫伯文本的《三國》、《列

<sup>11</sup> 仲生（俞紹顯），〈錫伯族史·序言〉，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 82]，第 1 版），頁 1-2。

<sup>12</sup> 孟昭勳，岳璣主編，《絲路商魂：新亞歐大陸橋再創絲路輝煌》，（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169。「希賈茲商路」就是「漢志商路」，漢志，又稱希賈茲（阿拉伯語意為「屏障」），位於沙烏地阿拉伯西部，北至約旦邊境，南至亞西爾地區的沿海地帶。得名自境內的漢志山脈。漢志地區是伊斯蘭教的發祥地，境內有麥加和麥地那兩座伊斯蘭教聖城。

國》、《西廂記》、《紅樓夢》等書籍。另有一篇文章，所述的滿文或滿漢合璧的書籍種類更多，幾至目不暇給：

錫伯族地區過去有的滿文或滿漢合璧的書籍卻版本各異，種類繁多。諸如，從五經四書，各種辭書到古典小說，應有盡有。就以翻譯滿文的中國古典小說而言，就有：列國傳、開辟演義，封神演義、三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唐、飛龍傳、岳飛傳、綠牡丹，聊齋志異，七俠五義、小五義、小八義、包公案，施公案、濟公傳……等等，凡三十餘種。錫伯族群眾又都喜聞樂聽。每到冬閒時期，或一家，或數家大人聚在一家，聽一位帶有音樂色彩的聲調朗讀者朗讀上述古典小說，有時甚至通曉達旦。通過朗讀，不僅熟悉了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及各種人物，還起到了把作品中的豐富的語匯灌輸到人們的腦海裡，所以，朗讀本身就是極好的語文教育。<sup>13</sup>

仲生僅只列出錫伯文本的《三國》、《列國》等四種書籍，而安俊所述的除了五經四書譯本外，還有《聊齋志異》、《七俠五義》等翻譯滿文的中國古典小說凡三十餘種。另根據安俊的說法，由於「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錫伯語言文字繼承了滿語滿文的所有文化財富，因此錫伯族可以輕易閱讀清代前中期大多用滿文發佈的詔、誥、奏報、公文、札記、家譜等生活文字。此外如滿族宗教神話故事《尼山薩滿》、滿族開國神話故事《三仙女》、滿族創世神話故事《天宮大戰》等，也是十分容易通曉的。閱讀的範圍廣泛，因此能保持極佳滿語滿文程度。

仲生認為，錫伯族聚居一隅，且人數甚少，但伊犁向來是五方雜會之地，經常要與漢、維、哈、俄等其他民族交往。為了民族的生存，他們自然地除母語之外，還得學會第二、第三種語言，「天才翻譯家」之說，與此不無關係，是一種求生存的本能。然而，有些事情很難一概而論。同樣是生活在伊犁的滿營後代，現在卻無法操持滿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請先看看早年新疆伊犁駐防的語言環境：

<sup>13</sup>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年01期，創刊號），頁41-42。

1764 年錫伯族被清朝派往新疆伊犁駐防，正是清朝乾隆 29 年。從康熙到乾隆的 134 年（公元 1662—1795 年）史稱康乾鼎盛時期。這不僅是政治方面，語言文字方面亦然。對滿語文的規範，始於康熙，完臻於乾隆。到了乾隆時期，可謂發展到鼎盛時期。這是早已公認的，毋庸贅述，而當時的伊犁，正是統轄新疆的將軍府所在地。滿營、錫伯營，索倫營都在伊犁。而三營人員全講滿語，上呈下達和相互傳遞的行文大都是滿文。因此，錫伯族雖然離開了東北這一大的講滿語的社會，但仍生活在伊犁這樣小的講滿語的社會環境裡。而歷史事實也不可爭辯地証明了這一小的社會環境，對活的語言文字的保留所提供的條件，所創造的環境，遠遠超越了東北的大環境。<sup>14</sup>

伊犁的滿營，長年生活在伊犁河的北岸，與伊犁河南岸的錫伯營，遙遙相望。根據以上資料顯示，當時滿營、錫伯營，索倫營三營人員「全講滿語」，行文「大都是滿文」。可是 256 年過去了，現在滿營的後代蘇拉宮旗屯，<sup>15</sup>卻全然忘卻了滿語、滿文，只會使用漢語、漢文了。蘇拉，滿語是閒散的意思。蘇拉宮旗屯，早年規模比錫伯營旗屯還大，人數更多。

因此，所謂聚居一隅、人數甚少、伊犁是五方雜會之地、經常要與漢、維、哈、俄等民族相鄰或交往，為了民族自身的生存發展，要多學多種語言，以便「知己知彼」求生存、圖發展的本能。這種解釋，在面對「蘇拉宮旗屯」案例時，似乎又有些不足，甚至讓人有新的疑問產生。所以，民族的經歷過的事件，也就是訴諸歷史，也許是一個較佳的解釋途徑。下面就簡略的回顧一下，錫伯族習得蒙文、滿文、漢文、俄文等四種語言的過程，並從其中尋找一些可討論的蛛絲馬跡。

## 貳、回顧

錫伯族的文化教育發展，可分好幾個階段，其內容又可細分為蒙文、

<sup>14</sup>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41。

<sup>15</sup>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41。

滿文、漢文、俄文等四種，對造就錫伯族為一「翻譯的民族」，頗有關聯，現分述如下。

### 一、蒙文

錫伯族在受科爾沁蒙古統治時期，部分人士便掌握了蒙古語文，以致清初有些人在國際交往中足以充當蒙滿譯員。以下有兩個案例，可以清楚說明當時的情形：

其一：於康熙 32 年（西元 1693 年）10 月 27 日黑龍江副都統闊特虎給齊齊哈爾協領麻齊的來文中稱：“為俄羅斯使者之駱駝、馬等倒斃之事送理藩院行文一封，因此地無有會書寫送往蒙古路驛站之蒙文文書之人，故用滿文寫就了底稿，並蓋了印章。由彼處錫伯中會蒙文者，令其照滿文寫成蒙文文書，送往蒙古路驛站，並按驛站傳送。此送”（轉引自《黑龍江將軍衙門檔》）。其二：於康熙 33 年（西元 1694 年）正月 27 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給齊齊哈爾副都統麻布岱的行文中稱：“此地需派官陪同俄羅斯使者，到達尼布楚之後，同俄羅斯交談通用蒙古翻譯，望派來熟通蒙古語之人。查此地沒有熟通蒙古語者，從在彼處的錫伯披甲中，揀選嫻熟蒙古語，能將咱們的話傳達給他們，將他們的話傳達給咱們者兩名，令帶兩個月的食米，同俄羅斯使者出發，到此來見所派之官。此送”（轉引自《黑龍江將軍衙門檔》）。上例兩份檔案材料說明瞭一個極重要問題，即錫伯族於康熙 31 年才歸順了清朝，也即康熙 31 年以後才接觸滿族，和滿族雜居。可是到了康熙 32 年就有了將滿文譯成蒙文的人才。到了康熙 33 年從將軍衙門所在地的滿、蒙等人員中挑選不出一位能充當滿蒙翻譯的人員，又專門行文從齊齊哈爾錫伯披甲中揀選的事實，說明瞭儘管錫伯族歸順清朝，直屬清朝管轄雖僅僅兩年，其掌握滿語滿文的水準，就已達到能充當兩國邊界談判代表的翻譯的高水準，這有力地說明了錫伯族原來使用的語言，和滿語極為相近，否則是解釋不通

的。<sup>16</sup>

安俊利用這兩個《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例，來說明錫伯族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才歸順了清朝，就能在國際交往中，充當蒙滿譯員，有力地說明了錫伯族原來使用的語言，和滿語極為相近，甚至可說錫伯族講的就是滿語。

然而從錫伯族成為「翻譯的民族」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案例，充當蒙滿譯員，除了初試鶯啼、展露才華之外，還有著濃濃的政治氣息。

有清一代，錫伯被稱為滿洲錫伯部，民國三十六年（1947）以前，「錫、滿不分家」，<sup>17</sup>錫伯族是近年來的新稱呼。而滿洲對於蒙古是相當重視的。例如，在文字上，滿文的創製，因襲蒙文。<sup>18</sup>在政治上，講究「滿蒙聯姻」，蒙古是滿洲的最佳同盟：

明朝末年，在明、清、農民軍三種政治勢力角逐中國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中，清朝之所以能取得最後勝利，並且統治中國長達 268 年之久，是因為它通過聯姻的形式爭取到了一個強大的同盟者，這就是驍勇善戰的蒙古民族。滿蒙聯姻肇始於努爾哈赤。

前面說過，錫伯部本與清朝廷無涉，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才由蒙古釋出，歸順了清廷。滿族在政治上，時刻都需要蒙古的支撐，才會一再進行「滿蒙聯姻」，甚至人口交易。因此以錫伯部充當蒙滿譯員之舉，未嘗不可視為滿洲出手的一場政治秀。因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錫伯部方才歸順一年，就外派擔任重要的外交譯員，不能只看作清廷對錫伯部的信任，還應視為滿洲對於老盟友「蒙古」的重視。

另就「蒙滿譯員」的甄選來說，「蒙古八旗」出自蒙古，會說滿語，成立於天聰九年（1635）間。<sup>19</sup>胡格金臺（敖岳山）就是是來台第一代蒙

<sup>16</sup>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47。

<sup>17</sup> 戈思明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BOD 一版），頁 45。

<sup>18</sup> 吳元豐，〈《滿文老檔》芻議〉，《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1 年 2 月 第 1 期），頁 138。

<sup>19</sup> 陳捷先著，《皇太極寫真》，（臺北市：遠流，2004[民 93]，初版），頁 93。

古旗人，曾撰寫《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一書。<sup>20</sup>書中滿文流暢，展現出這種「兼通蒙滿」的蒙古素養，可稱傳統功夫。朝廷既然要找「蒙滿譯員」，何以不往人數眾多的「蒙古八旗」中選派呢？這點令人百思不解。

此外康熙朝距離清初開國不遠，建州女真本身會蒙語文的人才不少，這可以參考《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的記載。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1599），努爾哈齊與額爾德尼、噶蓋等人，如何將蒙古文字借來創製滿文的：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兒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於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sup>21</sup>

原來早年女真人想寫字，都得先學會蒙古語文，因此才有「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的說法。康熙朝廷要找「蒙滿譯員」，何以不找學過蒙古語文的「滿洲八旗」呢？也讓人滿腹狐疑。

然而前面所提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卻寫信給齊齊哈爾副都統麻布岱說：「此地需派官陪同俄羅斯使者，到達尼布楚之後，同俄羅斯交談通用蒙古翻譯，望派來熟通蒙古語之人。查此地沒有熟通蒙古語者，從在彼處

<sup>20</sup> 胡格金台著，《達呼爾故事滿文手稿》，（臺北市：文史哲，民 66[1977]，初版），頁 1。

<sup>21</sup> 國立故博物院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圖書季刊》，（臺北市：國立故博物院，1970[民 59]，第一卷第一期），卷 2 頁 1。厄兒得溺、剛蓋是額爾德尼和噶蓋的不同譯音。

的錫伯披甲中，揀選嫻熟蒙古語，能將咱們的話傳達給他們。」也就是說，薩布素根本就不要蒙古、滿洲八旗譯員，指名要「彼處的錫伯披甲」，這其中的原因，不盡然是錫伯披甲「熟通蒙古語」，其實還與當時的社會情勢有關：

（錫伯部）在被贖出前，多數人處在貧困當中，因此，為了生存，與蒙古貧民一起行偷盜，攔路搶劫，使社會很不安定。如康熙三十年（1691 年）初和年末，在黑龍江錫伯族聚居區發生了兩起驚動清中央政府的偷盜和攔路搶劫案件：「康熙三十年吉林官兵攜眷遷來墨爾根時，於二月初二日，正白旗波莫都佐領下西訥科依之青驢馬，於錫伯伯都納村地方被盜。十四日，正藍旗精額德佐領下星國之紅花驢牛，於錫伯烏聶恩村被盜。同日，正紅旗佐領額爾古勒之青騾馬，於五家子地方被盜。…錫伯皆係蒙古所屬之人，我等不可擅自察議，故諮文於院，請由院派官察議歸還。」另一次情況也比較嚴重：「據茂興驛站筆貼式穆占、須催郭鳴鶴稟稱，十月二十一日，據本驛站唐洪印、劉三稟報：我等將布匹等物裝於二車，套馬四匹，自伯都納驛站起程，行至松花江、嫩江匯合處樹林地方，遇錫伯二名、蒙古二名。彼等走過時，見其中二人持弓箭，一人佩腰刀。我等隨後行路，忽從林中拾【骨包】骨箭、舉著腰刀而來。我等護財不給，驅車急馳。因【骨包】箭射中唐洪印胸部，遂即仆倒。來砍劉三時，迎擊之，奪回所持之刀，奔向圖西吞具告。持弓之賊，將駕車之馬四匹，裝衣服布匹之褡褳一個搶去，並將唐洪印之衣帽剝去。認識所有行劫盜賊等情。次日方到，看其蹤跡被風沙掩沒，不能辨明。距離圖西吞五里處被劫。此賊非攔劫之賊，皆係附近所住村民，在捕魚之處，見伊等未帶器械，遂行搶劫。將此緣由，已告知達爾汗王下都統烏濟瑪等等因。」<sup>22</sup>

<sup>22</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 82]，第 1 版），頁 120-121。



錫伯部在被贖出之前，社會形象著實欠佳，四處掠奪財物，屢屢紀錄在案：「二月初二日，正白旗波莫都佐領下西訥科依之青騙馬，於錫伯伯都納村地方被盜。十四日，正藍旗精額德佐領下星國之紅花騙牛，於錫伯烏聶恩村被盜。同日，正紅旗佐領額爾古勒之青騾馬，於五家子地方被盜。…」由於不斷竊奪八旗官兵財物，幾與小偷、劫匪的代名詞等同，無怪困擾達爾汗王，<sup>23</sup>並震動中央。

但是因為「錫伯皆係蒙古所屬之人，我等不可擅自察議，故諮文於院，請由院派官察議歸還。」也就是說，錫伯部的「主子」蒙古科爾沁部，來頭甚大，是滿蒙關係的要角，也是錫伯部的靠山，一般官員無法「擅自察議」。明知牛馬的所在，卻拿不回來，只能乾瞪眼，請朝廷設法解決。朝廷遇到這種狀況，也是束手無策。

然而天賜良機，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廷因關內平亂調防，東北要塞、台站駐守八旗缺員嚴重。<sup>24</sup>朝廷很快就想到，乾脆花錢向蒙古收買錫伯部，以解決病根。這是一個三贏的作法，一方面募得八旗兵源，一方面解決社會問題，還讓蒙古科爾沁部獲得不少白銀，落實滿蒙一家的承諾，堪稱完美。唯一可能有問題的部分，是八旗官兵與錫伯部以往結怨頗深，如何化解，還是傷透腦筋。但是錫伯部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三年（1694），「突然」蒙上級垂青，兩度擔任外交翻譯員，可能就是解決錫伯部編入八旗，產生磨擦問題之舉。因為在此之後，再也沒有擔任類似工作的紀錄。

錫伯部的社會形象，經此公開重用之後，已經完全「漂白」，不再被視為是偷雞摸狗之徒。從事態發展的脈絡，可以猜到，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為了使錫伯部能挺直腰桿，戮力從軍，特別派遣錫伯譯員，陪同俄國使臣伊茲勃蘭特，<sup>25</sup>到尼布楚附近蒙古路驛站，處理俄羅斯使者「駱駝、馬等

<sup>23</sup> 達爾汗王（達爾罕），屬蒙古科爾沁部，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封滿珠習禮為多羅巴圖魯郡王。順治九年（1652年）賜達爾罕號。順治十六年（1659年）晉封和碩達爾罕巴圖魯親王，掌左翼，詔世襲罔替。康熙四年（1665年）滿珠習禮逝世，長子和塔襲和碩達爾罕親王，停巴圖魯號。康熙三十年（1691年）時，是第三代達爾汗王，和塔之子班第（1671—1710）在任。

<sup>24</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82]，第1版），頁117。

<sup>25</sup> 王思治，馮爾康，《康熙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6[民95]，初

倒斃之事。」<sup>26</sup>事情本來不大，但是說起來卻是對外交涉事務，頗為中聽，這點可看出薩將軍對照顧錫伯人重新加入社會方面，確實是用心良苦，「恩同再造」。

當然這種滿蒙同體、愛屋及烏的行為語言，也使錫伯部感受到清廷的重視，開始循規蹈矩。從此每月按時領用「皇糧」，不再是蒙古科爾沁部的包衣，缺衣少食，而整天想入非非。其中的變化，當然是天翻地覆，即使旁觀者，也能感同身受。至此「翻譯官」的新身分，一併形塑完成，無論是社會的刻板印象，或是錫伯部的自我期許，都極正面。於是到了伊犁河畔屯墾，滿營、錫伯營、索倫營三營人員，即使基本條件相同，卻只有錫伯營能堅持翻譯的重任，維持不墜。而滿營、索倫營卻缺乏這種歷史因子，後來走出的道路，也就與錫伯營大大不同了。

## 二、滿文

前面說過，錫伯部在接受科爾沁蒙古統治時期，部分人員就學習過蒙古語文，以致清初有些人在國際交往中充當蒙滿譯員。不過錫伯部雖會說滿語，卻未曾接受過正規的滿語文教育。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將錫伯部以每人八十兩白銀贖出之後，錫伯部開始和滿族直接交往，加入八旗，開始全面接受滿語文教育。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奏准，在墨爾根兩翼各立一學校，設助教官，挑選錫伯、索倫、達呼爾佐領下幼童各一名，教習書藝。<sup>27</sup>這是黑龍江地區設立義學的開始，讓錫伯部族初次接受了正規的滿語文教育。

---

版），頁 233，236。

<sup>26</sup>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47。錫伯是到尼布楚附近蒙古路驛站，處理俄羅斯使者之駱駝、馬等倒斃之事。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連滿文底稿都已經寫好了，只要「照滿文寫成蒙文文書」即可。作者或許有些誤會了，說錫伯歸順清朝僅僅兩年之後，「就已達到能充當兩國邊界談判代表的翻譯的高水準。」然而兩國邊界談判的《尼布楚條約》，正式簽字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 年 9 月 7 日），不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三年（1694）這兩年。另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 82]，第 1 版），頁 362，也有類似誤解。

<sup>27</sup> 萬福麟修，張伯英纂，《黑龍江志稿》，（臺北縣：文海，民 54[1965]，影印本，據民廿一年排印本影印），卷 2。

### 三、漢文

乾隆末年，隨著伊犁地區軍事防守和屯墾事業的加強，漢族戍軍和墾民不斷增多，伊犁地區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因此客觀上要求雙語教學。到了嘉慶年間，這一要求更加強烈。有鑒於此，給事中永祚奏請在伊犁地區設學，<sup>28</sup>專門教授漢文，但遭到嘉慶帝的嚴厲申斥。雖然這一請求未能實現，但在此之前設立的「敬業官學」裡，還是招收許多學生包括數名錫伯學生進行滿漢雙語教學，這是錫伯族學漢語之始。<sup>29</sup>以下是嘉慶帝斥責永祚「設學一摺」的聖諭：

諭內閣：大學士會同禮部議駁，給事中永祚奏請伊犁地方設學一摺，所駁甚是。伊犁地處極邊，多係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遊牧之地。迥非烏魯木齊建立府、廳、州、縣，設有學額者可比。該處毗連外域，自當以嫻習武備為重。若令其誦讀漢文，勢必荒疏藝勇，風氣日趨於弱，於邊防有關礙。且屯田民戶及流寓商賈來去無常，亦未必盡能讀書識字。倘伊犁地方增設學額，則吉林，黑龍江等處煙戶繁稠，不便當奏請設學乎？此事如係漢員陳奏，或尚云未能深悉邊地情形。永祚身係滿洲，乃以斷不可行之事摺拾陳請，大屬不曉事體矣。至該給事中摺內稱，派官犯生監充當教習，及效力贖罪之科甲出身廢員充當主試，必係現在伊犁官犯中，有其親友在內，故有此沽名取巧之奏。希冀為伊等邀恩地步耳。永祚，著傳旨申飭。<sup>30</sup>

<sup>28</sup> 王成勉主編，《雙中薈：歷史學青年學者論壇》，（臺北市：新銳文創司，2013[民102]，初版），頁091。明代「給事中」為低階七品言官，但可直接面聖彈劾百官，遍覽六部公文。清朝沿襲明制，雍正元年（1723），六科給事中改隸屬於都察院，品秩提高為正五品，轄下有筆帖式等輔佐官職。

<sup>29</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82]，第1版），頁364。

<sup>30</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108，頁11-12。清仁宗在台灣民間是形象清新的好皇帝，也台灣的民間傳說故事《嘉慶君遊台灣》的主角。大意是在清朝乾隆年間，尚未內定為儲君的嘉慶帝曾經微服出巡遊歷台灣的故事。故事中說台灣南投縣草屯鎮「慶安宮」，本為一土地公廟，因土地公顯靈，指點嘉慶君免遭奸人謀害，「慶安」二字意為「保佑嘉慶君平安」，後傳說為嘉慶君所賜名，由廟升格為宮。嘉慶君民間故事多與王得祿有關。王得祿（乾隆三十四年-道光二十一年，1770-1842）福建省臺灣府諸

嘉慶皇帝的嚴厲斥責給事中永祚，說「若令其誦讀漢文，勢必荒疏藝勇」，正是清廷堅持「國語騎射」的制式想法。嘉慶的父親乾隆，曾為保持王朝的長治久安，強調保留滿洲舊俗，以保證八旗兵戰鬥力，這當中「國語騎射」被排入首位，<sup>31</sup>而嘉慶禁學漢文的舉措，只是這種戰鬥意志的延續罷了。不過更早設立的「敬業官學」，還是「暗度陳倉」，繼續招生進行滿漢雙語教學，其中包括錫伯學生在內，可見學習漢文的風潮，嘉慶皇帝也難以阻擋。

#### 四、俄文

錫伯族與俄羅斯民族直接交往始於清同治年間。同治三年（1864），正好是錫伯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遷新疆一百周年，新疆爆發回變（1864—1877）。這場新疆事變，還與浩罕及俄羅斯的入侵交織在一起，十分複雜。<sup>32</sup>光緒三年（1877年），回變首腦阿古柏服毒自盡，清軍乘機消滅阿古柏政權，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持續十餘年的新疆回變結束。然駐守伊犁河北索倫營的錫伯、達斡爾等族軍民，被迫於同治五年（1866）左右淪入俄國境內，在俄境居留數年，得以與俄羅斯族直接交往。光緒八年（1882）簽訂《中俄伊犁界約》後，<sup>33</sup>金順奉令率兵進駐伊犁，才擺脫沙俄統治。在這十餘年期間，錫伯營軍民也開始接觸了俄羅斯文化，其中扎拉豐阿、福善二人，以不足十歲的稚齡，開風氣之先，學會了俄語文。後來二人在中俄塔城地區為官，就積案處理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sup>34</sup>

#### 五、小結

回顧錫伯族之所以能成為一「翻譯的民族」，實與錫伯族的文教發展經歷，有著密切關係。錫伯部經歷了四個階段，分別習得了蒙文、滿文、

---

羅縣溝尾（今嘉義縣太保市）人，官至太子太保。而嘉義縣有太保市，便得名於王得祿官銜。

<sup>31</sup> 孫文良等著，《乾隆皇帝》，（臺北市：知書房，2012，第三版），頁240。

<sup>32</sup> 果遲著，《晚清風雲》，（北京市：東方，2006，第1版），頁358。

<sup>33</sup> 李之勤著，《西北史地研究》，（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1版），頁381。

<sup>34</sup> 賀靈，佟克力著，《錫伯族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民82]，第1版），頁372-373。

漢文、俄文等四種語文，形成了翻譯民族的基本條件。其中尤以錫伯部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才歸順了清朝，卻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三年（1694），突蒙上級垂青，兩度派出擔任外交翻譯員，最為傳奇。分析其原因，實因錫伯部早年的社會形象欠佳，清廷徵召擔任譯員，作用在於「漂白」身分，而非僅只利用其蒙語專長。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為使錫伯部能以嶄新面目，溶入八旗，堪稱頗為用心。另從薩布素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黑龍江地區設立義學，讓錫伯部族首度接受正規的滿語文教育來看，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對於錫伯部的循循善誘，態度是相當一貫的。然而薩布素的導演，卻使錫伯部西遷新疆後，真的走上翻譯之路，獲得「翻譯的民族」美譽，有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勵志實例。

### 叁、前瞻

現在工業發展，大部分為傳統產業與數位新創兩大部分，齊頭並進。翻譯民族如何掌握二十一世紀脈動與契機，讓翻譯事業，無論傳統產業與數位新創，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不致使整個產業夕陽化，甚至迷失方向，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 一、傳統產業

翻譯事業的傳統產業部分，就是翻譯滿文檔案。學者戈思明今年出了一本力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就記載了錫伯族參與翻譯滿文檔案的最新動向，現摘錄如下：

錫伯族參與《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翻譯工作。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出版的這套叢書，總計二百八十三冊，其內容「收錄所有軍機處滿文月摺包內涉及新疆事宜的錄副奏摺、上諭…等 72812 件，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於宣統三年（1911）…」《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的出版，不僅被中國大陸視為清朝合法統治新疆的又一項鐵證，對於不諳滿文的中外清史學者也期待早日能見到漢譯本問世。二〇一四年七月起，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二十餘位精通滿文的錫伯族被組織起來，開始翻譯其中一小部分（約十

本)。由於他們皆非學院派出身，只能邊做邊學，在逐漸克服了滿文公文用語、職官名稱、詞彙量大等令人頭痛的問題後，多半都能堅持做下去。這些年邁的錫伯族知識分子的滿文造詣堪稱全世界第一把交椅，實有必要將他們公諸於世，名單如下：富爾和春、孔淑瑞、何文君、文學名、賀元福、佟祥照、劉枝兒、郭金英、付榮光、佟秀珍、孔蔚蘭、趙春芳、趙春英、郭榮蘭、穆德珍、巴尚貞、巴永堅，安彭齡、吳文齡、關英傑、王恩謙、安如玉。<sup>35</sup>

《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一書的作者，能蒐集到《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翻譯者的名單，實讓人大開眼界。因為戈思明讚譽「這些年邁的錫伯族知識分子的滿文造詣堪稱全世界第一把交椅」，能將這批翻譯者集中運用，可說是許多關心滿學發展人士的一貫夢想。2014 年竟然付諸實施，當然令人振奮。

不過上文也提到，由於這批翻譯者多不是學院派出身，需要面對滿文公文用語、職官名稱、詞彙量大等「令人頭痛的問題」。

其實滿文翻譯真正頭痛的問題，是在於歷史時空的重建。所謂滿文「公文用語、職官名稱」等，只是反映了其中冰山的一角。其間類似的疑問，可能層出不窮。

就以滿語地名形成的特點來說，滿語地名大部分出現於滿族共同體產生之前，是滿族先人女真部落較為原始經濟的反映。這些漁獵經濟時代產生的古老地名，經過長期的歷史變遷，一直流傳下來。一個看似簡單的地名，其中反映了滿族先人的生產生活、民俗狀況及部落之間較為鬆弛的交往關係。例如忽汗河即呼爾哈河：

與漁獵經濟有關的滿語地名。這類地名在黑龍江省數量較多，如唐靺鞨族中心忽汗州，即以忽汗河得名。忽汗河即呼爾哈河，滿文為 HUrhan，漢語含義為“圍網”。圍網係一種原始的捕魚工具，它是漁獵經濟時代的產物。這條河即今之牡丹

<sup>35</sup> 戈思明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BOD 一版），頁 249-250。

江，發源於吉林省敦化縣，流經黑龍江省寧安縣、牡丹江市、海林縣和林口縣，於依蘭縣匯入松花江。<sup>36</sup>

前面學者安俊說過，「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這點是千真萬確的。錫伯語與滿語，基本上完全互通。然而錫伯族知識分子所生活的年代，到底與《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的「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於宣統三年（1911）」，大不相同。既然忽汗河即呼爾哈河，就是現今的牡丹江。不知道這些歷史變遷，翻譯根本無從下手。從這種歷史時空關係來看，滿文翻譯就不是一本《滿漢辭典》所能簡單解決的了。因此，如何彌補譯者對清代時差、代溝間的距離，才是當務之急，也是最需要克服的難關。

據悉 2017 年這項活動略有改組，重新做了調整。由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和石河子大學簽訂了翻譯協定，其中由於牽涉到版權等諸多事宜，所以選擇了合作。主要負責人員還是「石河子大學兵團屯墾戍邊研究中心」厲聲教授，翻譯人員則以北京故宮、察縣及東北三方人員為主。推動的力道，比以往更強勁。察縣的任務 2018 年是 32—41 冊 10 本，今年 2019 是 71—80 冊 10 本，聽說本年內計畫出版 5 本，整個項目預計 10 年完成。

## 二、數位新創

上面談過了錫伯族翻譯事業的傳統產業部分，這裡就要說一些比較「尖端」的數位新創事業：

7 月 22 日，筆者收到相識十數年的滿文學者吳元豐的一條信息，告知“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研發專案已於當天下午正式結項。該軟件在對滿文檔案掃描圖像進行識別後，能自動轉換成拉丁字母，也可以轉換成標準的滿文，極大提高手寫體滿文向拉丁字母和滿文標準字體的轉化效率。“經專家評審，認為此次研發的滿文輸入法和軟件達到了國內外領先水準，具有重要的推廣實用價值，可用以建立滿文檔案全文檢索資料庫，為實現滿文檔案的數位化和資訊化提供新的現代化途

<sup>36</sup> 黃錫惠，〈黑龍江省滿語地名翻譯的幾個問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54-55。

徑。”終於成功了！還記得今年春節電話拜年時，吳元豐先生特意向我提到正在主持“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研發工作，說自己眼看著快到退休年紀了，“這兩件事做完，心裡就踏實了。200多萬件檔案，靠我們這輩子能翻譯多少？不借助這些現代的新技術，將來非爛在庫裡不可！”吳元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巡視員、兼滿文處處長、研究館員，從事滿文檔案整理編目和翻譯研究。應該說，對中國的普通百姓言，這個名字非常陌生；但是在國內、國際滿學界，這個名字卻如雷貫耳，甚至，是一個傳奇。<sup>37</sup>

關於吳元豐，文中說到他的官銜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處處長」，其實他有一個更傳奇的身分，就是他也是錫伯族的一員。類似吳元豐到北京工作的錫伯族滿文學者不少，如安雙成、安俊、趙志強、郭美蘭等，都頗有成就。

能開發出「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錫伯族當然感到是與有榮焉。本軟件正式發表的日期比《北京日報》公布的晚了兩年，是2018年11月5日，於北京故宮建福宮舉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滿文檔案工作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上才正式推出的。<sup>38</sup>

「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看似新奇。然而對於一般從事文字編輯工作的人士來說，「中、英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卻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經常用到的電腦工具。例如一般人有可能會碰到，將圖片文字轉換成word的難題。通常要將圖片文字轉換成word的檔案，有些是掃描的，有些是用相機拍下來的，但不能在電腦上編輯。如果想要將圖片文字轉換成word可編輯文字，一般人都會想到按照圖片手打，可是一兩張圖片，文字不多的時候，還可以勉強接受。但如果一本書、一冊檔案，動輒五六萬字，要轉換成可以編輯的word，那就不是手打那麼簡單了。光靠手打根本完成不了整本書的圖片文字轉換工作，因為工程量太大了。而「中、英

<sup>37</sup> 京梅，〈吳元豐：找到破解瀕危滿語的金鑰〉，《北京日報》，（北京市：北京日報，2016-08-23），副刊。

<sup>38</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項目組，〈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系統研發及應用〉，《歷史檔案》，（北京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19年02期），頁141-144。



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就是很好的使用工具，不只解決量大的問題，而且識別速度快，準確率高。

「中、英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問世的時間，至今已近九十年了。文字識別，俗稱光學字元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概念是在 1929 年由德國科學家 Tausheck 最先提出來，並申請了專利。20 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學者開始研究漢字識別，並取得不少成果。1987 年日本已研製出幾種商品化的漢字閱讀機，其中東芝公司研製的 OCR 光電字元閱讀機，對單一印刷體的二千中文字元集達到 99% 的識別率，識別速度為 100 字/秒，但他們使用的是當時的大型電腦和專用積體電路，造價昂貴，難以普及。<sup>39</sup>1990 年南開大學王慶人教授率隊赴美，經過近一年的努力，1991 年秋推出了第一版英文識別軟體。近年由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研製的清華 TH-OCR 產品和由漢王集團開發的尚書 OCR 產品，已經技術成熟，市場上都有相當高的佔有率。

「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的問世，雖比「中、英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晚了許多年，但是使滿文檔案經過圖像掃描、進行識別後，同樣能自動轉換成拉丁字母，也可以轉換成標準的滿文，真是大功一件。如此一來，以往視為夢想的「滿文檔案全文檢索資料庫」，就能很快建立起來。將來，甚至走向人工智慧、電腦翻譯一途。滿文檔案，很可能也不再靠人工翻譯，而是藉著這些現代的新技術，加速進行。即使各地有兩百多萬件庫房存檔，也能瞬間譯完。

然而具有人工智慧「滿文翻譯軟件」的建立，還是要靠人力來完成，這就要請年輕一輩的錫伯族多多偏勞了。憑著「翻譯的民族」基本功夫，加上最新的電腦技術，排列成完善的辭庫，藉著嘗試與錯誤，創造出最有效率的滿文翻譯軟件。這樣的翻譯事業，是互聯網時代的新生事物，與傳統產業的滿文翻譯，有著明顯的市場區隔，可以分進合擊，創造雙贏。

### 三、通心翻譯

身處伊犁邊疆地區的錫伯族，屯墾多年，除了務農，知識分子就業是

<sup>39</sup> 史瑞琦，王慶人，〈按印刷漢字筆劃尖端數粗分類的方法及漢字識別系統〉，《中文資訊學報》，（北京市：中國科學院軟體研究所，1987 年 03 期），頁 26-33。

一大難題。二十多年前，曾在察縣七鄉遇到一位提早退休的小學校長佟肖。佟肖夫妻承包了數畝農田，兩人駕著驢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著農家純樸安定的生活。佟肖會多種語文，滿文、俄文、維吾爾文尤其擅長，哈撒克朋友也多，不愧是「翻譯的民族」。只是翻譯不能換錢養家，還是得每天下田幹活。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共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sup>40</sup>同年 10 月 3 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演講，提出與東盟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sup>41</sup>「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來臨，讓伊犁邊疆地區的格局性質開始有了改變：

我國邊疆地區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載體。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離不開我國邊疆地區。陸海內外聯動實際上就是要進行陸海統籌；東西部地區雙向互濟實際上就是要將沿海開放與沿邊開放有機地結合起來。“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離不開我國邊疆地區，企業引進來和走出去都需要經過我國的邊疆地區。我國邊疆地區需要抓緊機遇，進一步在區域開放與合作方面下功夫。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sup>42</sup>

以上文章的說法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離不開邊疆地區。尤其是企業，無論是引資進來，或是銷貨出去，都需要經過邊疆地區。邊疆地區忽然間成了最前線，而非無足輕重的末端。邊疆地區一定要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當口，抓緊機遇，進一步在區域開放與合作方面，多下功夫。

<sup>40</sup> 張玉蓉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旅遊合作機制研究：以西北五省區為例》，（成都市：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第 1 版），〈引言〉，頁 3。

<sup>41</sup> 于瑩，劉大海，安晨星，〈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評價體系構建與應用——基於中國與海絲路沿線國家指數分析〉，《南海學刊》，（海口市：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19 年 02 期），頁 90。

<sup>42</sup> 邢廣程，〈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構建中國邊疆學〉，《兩岸「少數民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臺北市：中國邊政協會主辦，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協辦，2018 年 4 月 21-22 日），頁 23。

機遇，當然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抓得到的。俗語說：「台上一刻鐘、台下十年功」，只有真本事，才能面對各種挑戰。「翻譯的民族」，如何接招，以下有一段話語，可以參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首談“絲綢之路經濟帶”時，就高瞻遠矚地提出“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實現這五通，當需語言互通。政策用語言表述。要深入瞭解各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對策，協商制定區域合作的規劃與措施，並使這些政策、法律、規劃、措施為民所知所用，環環都需語言參與。道路聯通更需語言連通。道路是有形之路，語言是無形之路。共同規劃道路、共同修建道路、共同使用道路，需先修建語言之路。語言之路不通不暢，道路規劃和道路修建、使用的各種技術與服務，也都實難通暢。至於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更是離不開語言服務，更需要語言支撐。“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軟”，但要把“一帶一路”建設為命運共同體，利益互惠，責任互肩，民心相通或比其他“四通”更為根本。“一帶一路”，可以用英語等作為通用語，但這種通用語只能“達意”，難以“表情”，只能通事，難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區域各國各族人民最樂意使用的語言。粗略而計，“一帶一路”65+個國家的國語或國家通用語就近50種，算上這一區域民族或部族的語言，重要者不下200種。這50來種或者200來種語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語，應當列入“一帶一路”語言規劃的項目單中。<sup>43</sup>

以上文章，說出了一個重點，就是「一帶一路」固然可以用英語等語言，作為通用語。但是這種通用語只能達意，難以表情，只能通事，難以通心。民心相通，或許比其他四通，更為根本。如果想要表情、通心，需要使用「本區域各國各族人民最樂意使用的語言」。

這段話簡直就是為錫伯族而設的。因為身為邊疆民族的一員，錫伯族

<sup>43</sup> 李宇明，〈“一帶一路”，語言“鋪路”一序〉，王輝主編，《“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2015，第1版），頁001-002。

正是伊犁這一帶的翹楚，提起語言溝通能力，無人可以超越。因此本節標題的「通心翻譯」，就是在說五通中，最不容易的「通心」，需要錫伯族上陣效力，並達成這項劃時代的重大任務。

前面說過，錫伯營軍民開始接觸俄羅斯文化時，曾有扎拉豐阿、福善二人，以不足十歲的稚齡，開風氣之先，學會了俄語文。後來這二人在中俄塔城地區積案處理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從這個案例中可知，「通心」工作早在清朝時就有人進行過，成效也確實不錯。現在再來重複一次，何難之有？

然而「一帶一路」到底是新興事物，錫伯族在上場前，還是要有些基礎建設才行。否則只靠隨機應變，遲早會發生問題。因此學者建議應當盡快啟動「一帶一路」術語研究項目，制定有關術語使用與翻譯原則，提供具體翻譯詞表，擬訂「忌諱詞表」或「不建議使用詞表」。也就是先搞清楚，那些話可以說，那些話最好別說，以站穩腳步，及時為邊境內外提供語言諮詢服務。何況，「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一時衝動，不是短期計畫，不只是一個空虛的口號，也不僅僅在謀中國的自身利益。而是一個持久推進，需要更多的參與者，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大規畫。欲達此宏志，必須有科學的語言規劃，步步為營，以做好「通心」的鋪路工作。<sup>44</sup>

#### 四、戰略突破

「一帶一路」是一個好的構想，但是任何構想，還是要面臨現實的挑戰。尤其新疆這類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往有其侷限，需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積極、合作的態度融入「一帶一路」戰略發展，因此有學者提出以下突破策略：

“一帶一路”戰略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應該以更加開放、包容、積極、合作的態度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更好地推進民族地區經濟進步。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迎來更

<sup>44</sup> 李宇明，〈“一帶一路”，語言“鋪路”一序〉，王輝主編，《“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2015，第1版），頁004。

加廣闊的投資、市場、政策空間，但也遇到了貿易保護、國際化人才供給不足、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等問題的制約，在這些因素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應該堅持推動民族地區經濟“走出去”、打通民族地區同沿線國家地區之間的經濟大通道、創新民族地區人才培養模式等路徑，進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下的民族地區的融入和深化發展。<sup>45</sup>

從以上劉國斌所寫〈民族地區融入「一帶一路」戰略的困境與突破〉一文中，可以明顯看出，民族地區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主要區域，通過民族地區的發展，將中國內陸地區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之間聯結起來，形成不同地域範圍不同層次的區域性合作經濟組織，方能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戰略。

就以 2014 年 7 月起，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組織二十餘位精通滿文的錫伯族專家，開始翻譯部分《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一事為例。由於這批翻譯者多不是學院派出身，需要面對滿文公文用語、職官名稱、詞彙量大等「令人頭痛的問題」，以致 2017 年這項活動有了改組、調整之舉。其實這正反映劉國斌所寫民族地區「國際化人才供給不足、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等問題。

也就是說，錫伯族雖然是伊犁這一帶的語言溝通翹楚，其能力無人可以超越。但是璞玉尚需雕琢，才能價值倍增，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在面臨新環境、新事物、新構想出現時，還是需要有人出面帶領著進行戰略突破，而創新民族地區人才培養模式，就是當務之急。「因此需要進一步打造民族地區服務「一帶一路」戰略的人才隊伍建設，推動民族地區人才隊伍的國際化建設，創新民族地區人才培養模式。首先，國家應該加強對民族高校及職業教育學院的支持力度，加大教育部對這些高校的資金投入，培養出一批應用型、理論性、實踐性、技術型以及複合型人才。」<sup>46</sup> 這

<sup>45</sup> 劉國斌，〈民族地區融入“一帶一路”戰略的困境與突破〉，《青海民族研究》，（西寧市：西寧市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辦，2017 年 02 期），頁 192。

<sup>46</sup> 劉國斌，〈民族地區融入“一帶一路”戰略的困境與突破〉，《青海民族研究》，（西寧市：西寧市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辦，2017 年 02 期），頁 192。

種看法，既加強了區域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造就了國際化人才的供給，極為正面，相當值得肯定。

#### 肆、結語

錫伯族主要分布在遼寧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口約 19 萬人（2010 年）。而新疆錫伯族，人數僅約兩萬，卻一直享有「翻譯的民族」美譽。

有人認為，錫伯族之所以是「天才翻譯家」，與以下三個條件有關。一、喜歡閱讀。愛看錫伯文本的《三國》、《列國》、《西廂記》、《紅樓夢》等書籍。二、重視教育。小孩只許進教室學習，不能到處賣水果、烤肉串、趕驢車、砌磚牆。三、為求生存。在伊犁這個五方雜會之地，以往曾有同治三年（1864）新疆回變（1864—1877）爆發，浩罕來的阿古柏當了新疆王，政教合一。還有俄羅斯的入侵，新疆一團混亂。直到光緒三年（1877 年），阿古柏服毒自盡，清軍消滅阿古柏政權，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持續十餘年的新疆回變才算結束。在戰亂無休的新疆，要發揮本能才得以求生存。如此自然除母語之外，還要學會他種語言，以便與漢、維、哈、俄等其他民族交往。

不過錫伯族的翻譯事業，新疆因素固然佔比甚大，卻並非全部。追溯其他原因，倒是與錫伯部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三十三年（1694），忽蒙上級垂青，兩度擔任外交譯員，陪同俄國使臣伊茲勃蘭特，到尼布楚附近蒙古路驛站，處理俄羅斯使者「駱駝、馬等倒斃之事」有關。

根據史載，錫伯部早年隸屬蒙古科爾沁部。在被贖出前，多數人處在貧困當中，為了生存，常與蒙古貧民一起行偷盜，攔路搶劫，社會形象欠佳。尤其與八旗過節甚多，而不易融入軍旅。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為重塑錫伯部社會形象，緩和與八旗的對立，將滿文底稿都寫好，只要求錫伯「照滿文寫成蒙文文書」即可。此舉果然使錫伯部改頭換面，獲得「翻譯官」的新身分，而便於戮力從公。後來乾隆年間到了伊犁河畔屯墾，滿營、錫伯營、索倫營三營人員，只有錫伯營能堅持翻譯的初衷，維持不墜，或與薩布素的用心設計有關。而滿營、索倫營卻缺乏這種歷史因子，後來走出

的道路，也就與錫伯營大大不同了。

時至今日，翻譯民族所應考慮的，是要如何掌握二十一世紀脈動與契機，讓翻譯事業，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此無論傳統產業：例如錫伯族參與《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翻譯工作。或是數位新創：例如「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都要齊頭並進，致力新創，才不致使整個產業夕陽化，甚至迷失方向。尤其在面臨新環境、新事物、新構想出現時，當務之急還是需要有人出面帶領著進行戰略突破，創新民族地區人才培養模式，推動民族地區人才隊伍的國際化建設，以適應跨地區、跨行業、跨領域的最新經濟活動情勢。

此外為迎接「一帶一路」新時代的來臨，「翻譯的民族」當以「通心翻譯」自許，在邊疆支持五通，就是：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以多語言能力優勢，協助邊境各國，在進出之間，促進政策、法律、規劃、措施的落實。發揮錫伯族強項，一同克服思想障礙，互通民心。「翻譯的民族」尤不宜自掃門前雪，當師法俄文先驅扎拉豐阿、福善二人事蹟，勇於繼續學習，合作共贏。相信錫伯族必能因地利之便，捷足先登，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本文於 2019 年 5 月投稿，於 2019 年 8 月審查通過）

## 維吾爾族的節日

編輯部

新疆地區人民以維吾爾族為主，信奉伊斯蘭教，其年俗活動與中國其他各地均有不同。伊斯蘭教不過年，只過兩個節，即開齋節與忠孝節。

每年回曆九月，凡十歲以上的男女教徒都要持齋，每天從黎明開始斷絕飲食，至日落星現，方許照常飲食。齋戒期間要嚴守誠律、每天沐浴淨身、按時禮拜，並禁止飲酒，以示虔敬。因為齋戒期間的嚴肅，所以在封齋前十五天，大家都守歲遊戲，度過巴拉提節。至十月一日這天，伊斯蘭教徒稱之為開齋節，三十天齋戒期滿，從夜半開始，便徹夜歡舞到天明。這個節日多半吃甜食，如糖果、炸散子等擺在桌上，客人用一點就走了。

忠孝節是在開齋節後七十天，也就是回曆十二月十日。這個節日是為紀念伊卜拉欣甘願以自己的獨子為犧牲祭祀真主而來，這一天要宰羊，也有宰駱駝和牛的。羊肉在中午以前煮好，用大盤盛放在桌上，供客人食用。

伊斯蘭教徒在過節前一定要先全身沐浴、換新衣，去清真寺禮拜後，再彼此拜節。父母也會在晚上將壓歲錢塞在小孩枕頭下，次日孩子醒來摸著了就覺得很開心。

在新疆地區，這兩個節日的頭三天由男人拜節，其餘廿六天、七天的時間，則留給婦女回娘家或拜訪親友，也就是說，開齋節與忠孝節合起來，婦女一年有五十多天的假期，比起其他地方的婦女，真是幸運的多。



## ئۇيغۇرلاردىكى بايراملار

شىنجاڭ (ش. تۈركىستان) بۆلگەسىنىڭ ئاھالىسى، ئۇيغۇرلاردىن ئاساس تاپقان بولۇپ، ئۇلار مۇسۇلمان ۋە ئۆرپى ھەرىكەتلىرىمۇ جۇڭگو نىڭ باشقا يەرلىرىدىن ئايرىم. مۇسۇلمانلار، يېڭى يىل دەپ ئۇنى بايرام قىلىپ ئۆتكەزمەيدۇ، ئۇلار، ئىسلام ئادىتى بويىنچە روزى ھېيت ۋە قۇربان ھېيتى دىيىلگەن ئىككى دىنى بايرامنى داغدۇغا بىلەن ئۆتكۈزىدۇ.

دىنى ئادەت ئىجابىچە، ھەر يىلقى ھىجرى توققۇزىنچى (رامازان) ئاي، روزا ئېيى بولۇپ، بۇ ئايدا بۇتۇن ئاقىل ۋە بالىغ بولغان مۇسۇلمانلار روزى تۇتۇدۇ. ئۇلار، ھەر كۈنى تاڭ يورۇماستىن ئاخشامدا كېچە قاراڭغۇسى باشلىغانغا قەدەر كۈندۈزى ھىچ نەرسە يېمەيدۇ، ئىچمەيدۇ، روزا تۇتقاندا، ھەر مۇسۇلمان غۇسۇل-تاھارەت بىلەن پاكىز يۇرۇپ، تاڭت-ئىبادىتىنى قىلىدۇ، ھاراق ئىچمەك ھارامدۇر. شۇنىسى مۇبارك كى ئۇيغۇرلار، ھىجرى سەككىزىنچى (بارات) ئاينىڭ ئورتاسىدا بىر بارات بايرىمى قىلىشىپ قاپاق كۆيدۈرۈپ، داغدۇغۇلۇق بىر بارات كېچىسىمۇ ئۆتكۈزىدۇ. ئامما ئۇ، بىر قىزىقچىلىق سانالغان بىلەن مىللى ۋە دىنى تەرەپتىن بايرام قاتارىغا كىرمەيدۇ. ھەقىقىي بايرام ھىجرى ئونىنچى (شاۋال) ئاينىڭ بىرىنچى كۈنىدۇر. بۇ بايرام ئوتتۇز كۈنلىك تۇتقان روزانىڭ قابۇلى ۋە شەرىپى ئۈچۈن بولۇپ، ئارپا ئاخشىمى دىن تۇتۇپ خوشال-خۇراملىق باشلايدۇ ۋە ئەرتىسى سەھەر، بامدات نامازىدىن كېيىن روزا ھېيت نامازى ئوقۇلۇپ، ئۈچ كۈنلىك روزا ھېيت بايرامى باشلىنىدۇ. بۇتۇن ئۇيغۇر ۋە مۇسۇلمان جەمىيىتى بايرام شەرىپىگە قۇتلاشلار قىلىدۇ، ئويۇن-تاماشە، داققا-دۇمباق، نەغمە-ناۋا، ناخشا-ئۇسۇل دېگەندەك كۆڭۈل كۆتۈرۈش ھەرىكەتلىرى ئېلىپ بارىدۇ. ئۆيىمۇ-ئۆي، سېلىنغان ساڭزىلار، داستۇرخانىدىكى تاتلىق مەزىلەر بىلەن بې-زەلگەن بولۇپ، كەلگەن-كەتكەن قوناقلار بۇنىڭ بىلەن ئۈزۈتۈلىدۇ.

بۇتۇن خەلق بىر-بىرىگە ھېيتلىشىدۇ، بىر-بىرىنى قۇتلىشىدۇ.

قۇربان بايرىمى، روزا ھېيتىدىن يەتمىش كۈن كېيىن دۇر. يەنى، ھىجرى تەقۋىمىچە ئون ئىككىنچى (زۇلھىججە) ئاينىڭ ئونىنچى كۈنى بولۇپ، بۇ بايرام، ئىبراھىم ئەلەيسالامنىڭ ئوغلىنى (ئىسمائىل) ئاللا نىڭ ئەمرى بويىچە قۇربان قىلىشقا ۋە ئوغلىنىڭ بۇ ھەرىكەتنى قوبۇل قىلىشقا قارىتا بىلدۈرۈلگەن ھۆرمەت ۋە ئېتىقاتىدىن ئاساس تاپقان.

شۇڭلاشقا، ئىچكىرىدىكى مۇسۇلمانلار (تۈنگانلار) قۇربان ھېيتىنى، ئاتا-ئانىغا ھۆرمەت بايرىمى دەپ ئاتايدۇ. بۇ بايرام كۈنى قۇربانلىق قوي سويۇلىدۇ، شۇنداقلا، تۈگە ۋە ئۆي (ھۆكۈز) قۇربانلىق قىلغۇچىلارمۇ بولىدۇ. بۇتۇن قۇربانلىقلارنىڭ ئېتى (گۆشتى) پېشىندىن ئاۋال پىش-رىلىپ، چوڭ تاۋاقلارغا ئۇسۇلۇپ، قوناقلار (مىمانلار) نىڭ شەرىپىگە داستۇرخانىغا قويۇلۇشى كېرەك.

بۇتۇن مۇسۇلمانلار، بايرام نامازىدىن ئاۋال غۇسۇل-تاھارەت ئېلىپ، يېڭى كىيىملەر كىيىپ، خانىقا ۋە مېچىتلەردە ئۆتكۈزۈلىدىغان ھېيت نامازىغا بېرىشىدۇ، نامازدىن كېيىن ئۆز-ئارا ھېيتلىشىش باشلايدۇ. ئاتا-ئانا بولغانلار ئارپا ئاخشىمىدىن تۇتۇپ ھېيتلىق پۇل-لارنى بالىلارنىڭ ياستۇقى ئاستىغا تىقىپ قويۇشىدۇ، بالىلار، گەرتىسى قويۇپ بۇ ھېيتلىقلارنى كۆرگەندىن كېيىن تېخىمۇ كۆپ خوشلىققا سا-زاۋار بولىشىدۇ.

ش. تۈركىستاندا، بۇ ئىككى بايرامنىڭ باشلاپقى ھەر ئۈچ كۈنى گەرلەرنىڭ ھېيت قىلىشى بولۇپ ئادەتلەشكەن. ھېيت ئايلىرىنىڭ قالغان يىگىرمە ئالتە-يەتتە كۈنى خاتۇنلارنىڭ ئۆز ئائىلىسىگە قايتىشىغا، تو-نۇش-بىلىش، ئۇرۇق-تۇققان، گەل-ئاغىنىلىرىنى ھېيتلىشى ئۈچۈن ئايرىلغان. شۇڭلاشقا، روزا ھېيت ۋە قۇربان ھېيتى بولۇپ، بىر يىلدا، خاتۇنلارنىڭ ئەللىك نېچچە كۈنلىك تەتلىلى ئورتىغا چىقىدۇ، شۇ نىڭ ئۈچۈن ئۇيغۇر ئاياللىرى باشقا يەردىكى خاتۇن-قىزلاردىن ئىنتايىن بەختلىكدۇر، دىيالايمىز.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好報需要時間，惡報只在旦夕。（藏族）

曲解真理，國家遭殃；吞食乾饅，食道受傷。（藏族）

自己釀的酒，不好也得喝。（藏族）

客大了壓主，虎大了傷人。（藏族）

愛情要到花叢裡找，幸福要到民間去尋。（維吾爾族）

好事導向幸福，惡事引往墳墓（維吾爾族）

想死的老鼠，咬著貓尾巴玩。（維吾爾族）

一事做好，能免百難；一事做壞，可招千災。（維吾爾族）

過河莫丟柺杖，相逢莫要撒謊。（彝族）

誠實是立身之本，輕浮是敗事之根。（壯族）

清不過泉水，實不過娃子。（壯族）

即使捨棄性命，也不出賣朋友。（哈薩克族）

正義雖非利劍，卻能戰勝一切。（維吾爾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中國邊政協會 2019 學術交流之旅側記

熊映美

中國邊政協會會員、汕頭大學兼任教授

2019 年 10 月中國社科院在內蒙古阿拉善左旗舉辦「海峽兩岸民族地區生態、文化與小康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國邊政協會為協辦單位，並派出多人參與盛會，故特為之記。

大會於 10 月 12-14 日舉行，會議主辦方為內蒙古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承辦方為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及內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協辦單位除中國邊政協會外，尚有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及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等學術單位。

然而行前約一個月，十年來一直持續為兩岸學術交流付出極大心血的本協會林遙鵬副祕書長，為此次會議特將手術延期，竟然因心臟病發遽爾辭世，令兩岸相關人士非常震驚與哀傷。為因應此一突發變故，楊克誠理事長特別於 9 月中旬，召集劉學鈞常務理事、張華克常務監事及趙竹成祕書長等，開了兩次臨時會議。除了決議請許麗英小姐接任副祕書長之職外，此次交流會議，由羅中展理事接手擔任稿件接洽及聯絡事宜窗口，張華克常務監事負責協辦。使本次兩岸民族地區學術研討會，得以繼續推動。

10 月 11 日兩岸與會人員，開始由各地出發，向銀川邁進。因氣候因素，各個班機抵達銀川河東機場時，多有延誤。承辦單位接機人員亦不辭辛勞，徹夜翻越賀蘭山，接送到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終於在 12 日大會開幕之前，使全員到齊。

開幕式在阿拉善賓館貴賓樓二號會議室舉行，由齊木德道爾吉教授主持。阿拉善左旗領導蒞臨致開幕賀辭之後，兩岸代表陸續致辭，包含中國社會科學院員郝時遠學部委員，以及本協會羅中展理事等。出席學者共約 37 人，分別來自大連、吉林、銀川、呼和浩特、北京、南京、浙江杭

州、廣東汕頭、台北、南投、高雄、台南等地區城市，分屬 25 個機構單位團體，堪稱一時之盛，嘉賓與學者們在開幕式完畢後即於廣場前合影留念（圖 3）。

研討會於迎賓樓會議室舉行（圖 1）。本次大會論文報告一共 27 篇，4 個主旨演講，23 篇學術報告。陸方學者發表 19 篇，台灣學者發表 8 篇。四個主旨演講如下：中國社科院郝時遠前瞻論述「建設內蒙古亮麗風景線的幾點思考」、銘傳大學楊開煌剖析「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析論」、南京大學范可所長講述「人類學視野裡的生存性智慧與生態文明」，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主任則以內蒙近年發展狀況總整報告「技術專利、金融資本和國家稅收對草原畜牧業的影響」共同發表人達林太研究員，以歷年資料彙整出推演公式，分析出各因素影響程度。由於「中國邊政協會（微信版）」的傳播效果，會員秦偉騰、白中琿、趙竹成等不時給予按讚，可見現場傳出的圖片、文字，也頗受到外界關注。

學術論文裡，大陸學者報告內容包括：青海海晏縣民族地區生態、文化與小康個案、蒙古族游牧生態知識的價值及啟示、牧區蒙古族游牧生態知識的價值及啟示、論鄉村振興與小牧戶現代化、阿拉善長調民歌的生態理想、論套西地區的生存抉擇與生態變遷、阿拉善左旗生態建設管窺、非平衡草原生態系統與「圍欄」、阿拉善左旗的文化生態與民族關係、西藏農牧區社會事業發展的實踐及意義、生態移民的閩東經驗、蒙古國草原畜牧業的困境與名牌化出口策略、阿拉善蒙古附清考述、清代翁牛特右翼旗貴族家譜考述、清末民初內蒙古東部地區的水資源和漁業、內蒙古牧區實行牧業大包幹責任制社會歷史背景等 19 篇。

台灣論文內容包括：錫伯族作為翻譯民族的回顧與前瞻、以賽德克族為例討論少數民族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西藏文字與文化發展、賽德克族清流部落傳統知識暨狩獵文化、西拉雅族生態、文化和社會變遷、被忽略的蒙古原鄉--保育與持續發展、滿文檔案與新疆錢幣變革史等 8 篇。

總計此次研討會共討論了賽德克族、西拉雅族、滿族、維吾爾族、錫伯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及畚族的歷史文化及生態經濟，探討層面廣泛且細緻深入；主旨演講專家們也針對少數民族文化經濟最新發展的各個面向，提出回顧分析結果及前瞻性的綜合論述。閉幕式由內蒙古大學斯琴高

娃副教授主持，齊木德道爾吉、郝時遠、楊開煌等發言人發表精彩講評（圖 2），讓與會者擴展了視野，為此次豐富而成功的學術交流做出了完整結論。

會議期間，大會還安排了文化考察行程，以充實蒙古見聞。13 日下午訪視達賴六世圓寂地阿拉善南寺（廣宗寺），由住持喇嘛在廟門口為每人舉行獻哈達儀式，十分莊嚴隆重。接著再前往北寺及極有當地特色的阿拉善沙產業園區，試吃肉苳蓉、鎖陽、黑果枸杞、駱駝奶酪等沙生特色動植物產品，據說都具有滋陰補陽奇效。由於園區動線流暢，展品豐富，試吃品項眾多，價格又公道，當天銷路不錯，人人滿載而歸。

14 日上午參觀阿拉善沙漠越野賽車場地-2019 阿拉善英雄會、阿拉善衛特拉民俗文化傳承教育中心（圖 4）、定遠營阿拉善博物館等地。英雄會越野賽場在騰格里沙漠舉行，會場除建造了各樣沙漠越野賽車道外，還有航空飛行表演基地以及多座遊樂園，並提供全區 Wi-Fi 覆蓋及超過 400 個蒙古包，供參賽者及遊客住宿，場面完備且盛大。與會者一到訪，巧遇今年第一場大漠飛雪，女士們紛紛叫苦，拿出厚重冬衣穿上禦寒。然本會學者戈思明僅著夏季長袖單衣，且不穿外套，在雪地中行走自如，毫無懼色，讓大家頗為驚奇。

15 日與會代表各自踏上歸途，返程仍循原路貫穿賀蘭山往銀川市，沿路看到沙漠山區地理特殊景觀，遠眺西夏王陵、長城遺址、風力發電設施以及山嶺上巨大駱駝地標，可說美不勝收。經車上蒙古學者斯琴高娃解說，才弄清楚原來蒙古語的「阿拉善」，就是在指賀蘭山，可說恍然大悟。

到達銀川，台灣學者代表受北方民族大學丁明俊院長盛情邀請，出席北方民族大學回族學研究院師生座談會。與會老師包含杜華君、馬建福、勉衛忠等，學生為博碩士生有馬豪、徐琳脂、菅哲等共二十餘人。會中學生們多能提出問題，台灣學者也詳加解說，十分熱烈。由於 2017 年兩岸學術交流會曾在該校舉行，由丁院長主持。當年所交的朋友，這次又重逢了，大家都感覺非常親切，紛紛合影留念。本協會常務監事張華克也代楊克誠理事長及劉學鈺主編贈送丁院長新出刊的中國邊政雜誌數冊（圖 5），作為見面禮物。北方民族大學校園美麗，又是舊地重遊，依依不捨

中互道珍重再見，圓滿的結束了這次學術交流之旅。

與會代表名錄（按漢語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姓 名	性 別	工作單位	職務/職稱
包 喜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行政秘書
陳建樾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研究員
陳又新	男	中國邊政協會	理事
達賴	男	阿拉善左旗	學者
達林太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恩克哈達	男	內蒙古作家協會、 阿拉善作協文學創作室	副主席/主任
洪宜君	女	台灣成功大學	獨立研究者
郝時遠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研究員
黑 龍	男	大連民族大學民族史研究所、 國家民委蒙古國研究中心	所長/主任教授
甘德星	男	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
戈思明	男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	原組長
姑茹瑪	女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員
劉 玲	女	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副主任/研究員
羅中展	男	中國邊政協會	理事
馬 英	男	阿拉善盟文聯	原主席
麥拉蘇	女	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	副教授
那順套格套	男	阿拉善盟黨校	副教授
訥木和吉日 嘎拉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齊木德道爾 吉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原副校長/主任 教授
仁 欽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姓 名	性 別	工作單位	職務/職稱
方素梅	女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研究員
范 可	男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所	所長/教授
斯琴高娃	女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文化所	副教授
蘇德斯琴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吐爾文江吐爾遜	男	浙江師範大學中國邊疆發展研究所	所長/特聘教授
烏日陶克套胡	男	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	院長教授
吳忠良	男	吉林師範大學滿學研究院	副院長/副教授
謝詠梅	女	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	教授
熊映美	女	廣東汕頭大學	教授（退休）
楊開煌	男	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玉 海	男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贊德來	男	阿盟人大工委	原副主任/作家
張少春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張華克	男	中國邊政協會	常務監事
張海洋	男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教授
張淑珍	女	中國邊政協會	理事
周競紅	女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研究員





圖 1 2019 兩岸交流會議開會情形



圖 4 參訪阿拉善民俗文化傳承教育中心



圖 2 左起：齊木德道爾吉、郝時遠、楊開煌



圖 5 左起：丁俊明、張華克



圖 3 2019 兩岸「民族地區生態、文化與小康社會」學術交流研討會嘉賓學者合影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五）－ 鄂倫春族食品「一狍四吃」

華華

### 壹、前言

鄂倫春族是一個分佈於大陸北方邊區的少數民族。根據 2010 年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全國有鄂倫春族 8,659 人，多集中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和黑龍江省北部的呼瑪、遜克、嘉蔭等縣與黑河市瑯琿鎮。2019 年 5 月間統計，黑龍江省有鄂倫春族 3,871 人，佔鄂倫春族總人口的 47%；內蒙古自治區有 3,573 人，佔 44%。

鄂倫春這一族稱，是崇德五年（1640）三月間，太宗皇太極派大將薩穆什喀、索海，往征虎爾哈部，傳回的奏報中，首度出現的，當時稱之為「俄爾吞」。<sup>1</sup>

然而早在元朝時，鄂倫春人卻常被稱為「林木中百姓」和「北山野人」，分佈極為廣闊，屬於遼陽行省管轄。明朝時黑龍江以北，有「乘鹿以出入的北山野人」之稱。清初文獻曾把鄂倫春人叫做「樹中人」，或將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以北叢林中遊獵、養鹿的鄂倫春人稱為「使鹿部」。

鄂倫春人與鄂溫克人關係很近，早年都屬於「北山野人」一系，可說是族出同源，不分彼此，於是至今也常有「使鹿的鄂溫克人」的說法。2018 年海峽兩岸召開的「鄉村振興與部落重建」學術研討會，中國邊政協會與會者楊克誠、劉學銚、陳素甜等人，在蒙古族學者烏日的陪同下，參訪呼倫貝爾大草原根河市飼養馴鹿的鄂溫克神秘部落「敖魯古雅」，就

---

<sup>1</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51，頁 8-9。

留下了與馴鹿合影的珍貴照片，可為見證。<sup>2</sup>

以前介紹過鄂溫克的族稱，意思是「下山的人們」。<sup>3</sup>至於鄂倫春人的部族名稱，是以「春-tʃə n」字作為末尾音節，其構詞形式在北方少數民族中常見。根據學者愛新覺羅·烏拉熙春的分析，以「春-tʃə n」作為末尾具有「擁有者」的意思。例如：莫爾千，是「馬 mori-」加上「擁有者-tʃə n」，等於「養馬之人」。而鄂倫春，則是「鹿 oro-」加上「擁有者-tʃə n」，等於「養鹿之人」。<sup>4</sup>可見鄂倫春人的族稱，意思更近於「使鹿部」。

早期鄂倫春人與鄂溫克族人一樣，在冬季來臨之前，會大量宰殺牲畜，尤其是自己飼養的馴鹿，以儲存肉類，度過寒冬。居住在高緯度地區的鄂倫春人，經常在陽曆 10 月初，就會遇到第一場瑞雪。冬季可以延續到第二年的四月。如何籌備這七個月零下氣溫的人畜糧草，當然是一般鄂倫春人都會關心的大事。

鄂倫春人早年以肉食為主。在以往的社會裡想要儲存肉類，可沒有冰箱這類先進的電氣設備。鄂倫春人宰殺牲畜之後，想得到的儲存方式，就只能靠煙燻、烘烤。因為即使是尋常的食鹽，也是要以乾肉交換而得。所以鄂倫春人不可能像湖南老鄉一樣，在鮮肉上「豪邁的」抹上大把食鹽、硝石、花椒、八角等，再煙燻一天一夜，把肥油逼出，製作成美味的「湖南臘肉」。鄂倫春燻肉，不那麼講究工序，純粹為了保存食物而已。也正因為如此，就發展出一套「一狍四吃」的獨特料理法，也算是一種意外的收穫，值得加以介紹。

## 貳、鄂倫春族食品「一狍四吃」

狍子肉是鄂倫春人的最愛。清代早期黑龍江、大興安嶺一帶，人煙稀少，狍子滿山遍野奔跑，取得十分容易。以遊獵、養鹿維生的鄂倫春人，

<sup>2</sup> 林遙鵬，〈2018 年海峽兩岸「鄉村振興與部落重建」學術研討會記述〉，《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107[2018]9 月，215 期），頁 148。

<sup>3</sup> 華華，〈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三）—鄂溫克族食品「灌血腸」〉，《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108[2019]6 月，218 期），頁 148。

<sup>4</sup>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從語言論證女真、滿洲之族稱〉，《滿族文化》，（臺北市：中華民國滿族協會，民 79[1990] 年，第 14 期），頁 57。千、春，只是翻譯上的異寫，發音相同。

也跟狍子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把吃狍子肉當成生活飲食的必要部分。

不過東北的人口，在過去三百年間，可說是意外的有了爆炸性的成長。就以清初十分偏僻、以流放重犯聞名的寧古塔為例。當時寧古塔是吉林的一部分，屬於吉林將軍管轄。從順治十四年（1657 年）舉人吳兆騫，因「丁酉科場案」流放寧古塔開始，<sup>5</sup>這裏就成為重犯聞之色變，有去無回的苦寒絕境。吉林省內重犯其實沒收到幾個，人口總數卻從清初的寥寥數萬人，到 2001 年人口暴增至 2,690.8 萬人，<sup>6</sup> 成長率驚人。由於人口負載過重，天然環境遭受破壞，青山不再，野生狍子也跟著絕跡。現在東北的狍子，多為人工飼養的了。不過鄂倫春人逢年過節，還是想一嘗狍子肉的美味，算是發思古之幽情吧。

「一狍四吃」說來並不複雜，就是先將狍子宰殺、去蹄，剝下外皮。這時，第一種吃法出現了，可稱之為「品狍肝」。方式很簡單，就是剖肚取肝，直接分享大嚼。鄂倫春人認為，狍子肝臟對於人體有「補眼」的神奇作用，只有生吃，才能充分發揮功效。而且狍肝帶著淡淡的草香，無疑是天下最滋補美味的聖品。吃狍肝時，可用隨身小刀，豪邁的切下一片狍肝，入口即化，一吃難忘。

當然，不習慣生食「沙西米」的鄂倫春人也有。<sup>7</sup>何況「補眼」對獵人的射擊技術，固然有加分效果。不過近年生態保護觀念盛行，鄂倫春人雖有擁槍特權，卻沒有無限制濫殺的許可。每個鄂倫春獵人，一年只能獵取三頭成獸，另有禁獵期、禁獵區等的種種限制規定。以致再好的「眼力」，遇到這些善意的法條，也變得「無用武之地」了。既然「補眼」的功效並不那麼重要，生食狍肝的習俗，也就逐漸的淡化了。

接著來看狍子的第二吃。狍子的正式名稱是「東方狍」，與台灣的山

<sup>5</sup> 丁酉科場案發生於清朝順治十四年（1657 年），歲次丁酉。因科場公開受賄作弊事發，屢興大獄，株連甚廣，立斬多人，相當血腥。

<sup>6</sup> 曾早早，方修琦，葉瑜，〈基於聚落地名記錄的過去 300 年吉林省土地開墾過程〉，《地理學報》，（北京市：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主辦，2011 年 07 期），頁 985-993。吉林省至 1711 年人口總數約 9.9 萬，1850 年的 32.7 萬，1912 年約 558 萬。

<sup>7</sup> 「沙西米」是日語「刺身 Sashimi」的譯音。常讓人直接聯想到各種生魚片，但其實「沙西米」可泛指各種生食肉類，包含鹿肉、雞肉，或是馬肉。

羌，親緣關係很近，都屬於「鹿科」動物，<sup>8</sup>外型也十分相似。只是台灣山羌成熟時只有 13 公斤，而「東方狍」體重可達 30 公斤，顯然狍子是巨大得多了。以屠宰率百分之五十估算，解下的瘦肉可多達 15 公斤。如果一時吃食不完，就得面臨保鮮的問題，這時鄂倫春獵人的煙燻、烘烤功夫，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鄂倫春獵人會以柴刀，劈砍黑龍江、大興安嶺一帶，隨處可見的樺樹，搭起臨時小屋「仙人柱」。這是一種圓錐形的窩棚，跟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帳篷，極為相似。鄂倫春語的「仙人柱」，其中「仙人」意為「木杆」，而「柱」是「屋子」的意思，倒不是真有「仙人」住在裡面。鄂倫春人對這種窩棚的叫法，與赫哲人的叫法不同。赫哲人稱這種窩棚為「撮羅子」，那是東北人較為熟知的名稱。

在「仙人柱」裡面辦起炊事，好處很多。不只可以遮風避雨，產生暖氣，也可以讓煙燻、烘烤的火力，更為穩定。如此鮮肉在轉變為肉乾的過程中，品質得以確保。通常鮮肉條是垂直懸掛的，排列於橫木之上。下方鮮肉受火較強，常被火苗光顧，在烈火的熱炙之下，鮮肉下端就變成香酥的烤肉了。鄂倫春人會不時把這部分的熟肉，當場以小刀切下，沾點鹽水，大口品嘗。這正是狍子的第二種吃法「烤狍肉」。

等到肉乾燻製的過程，告一段落。接著就換上一口吊鍋，第三種吃法「煮狍排」於焉上場。

說起吊鍋，這可是中國十大菜系之一「鄂菜」的特色。湖北人煮吊鍋，特重風味。吊鍋湯先以蘿蔔打底，再鋪上竹筍、香菇、木耳、黃花、百果、蕨苗、南瓜片、紅棗等山珍乾料，再逐層堆放手工製作的油豆腐、肉糕、腐竹、丸子和蛋絲。接著再將瓦罐燜燉好的草魚、豬肉、土雞等水陸空三味，整齊排放在最上層。吊鍋煮開後，葷素食材相互交融，湯汁翻滾、兼具「香、脆、鮮、滑、甜、嫩、軟、細」等百味，口感純正上乘，這可是老饕們的最愛。

鄂倫春人料理的吊鍋可沒那麼講究，鍋裡只放進山泉水。接著把狍子的骨架、狍子頭加上零碎筋骨等，通通丟進鍋裡，蓋上鍋蓋。水開了燜煮半小時，就可以揭開鍋蓋吃肉了。「白水烋肉」（烋 ㄏㄨ）是「煮狍

<sup>8</sup> 鹿科學名 Cervidae，東方狍學名 Capreolus pygargus，山羌學名 Muntiacus reevesi。

排」的正式名稱。抓起肋骨肉排來，一手拿小刀切下一根肋骨，啃食排骨肉，是鄂倫春人心目中的絕佳美食。如果覺得肉還沒什麼滋味，就沾沾鍋旁的一碗鹽水，讓肉汁更加鮮甜可口。鄂倫春人只關心「原汁原味」，至於湖北人怎麼煮吊鍋，完全不在「使鹿部」的考慮之列。

啃完了「煮狍排」，鄂倫春人會在肉湯裡灑上幾把小米繼續煮。號稱「原湯化原食」，喝一碗健胃益脾的「燉狍粥」，畫下「一狍四吃」的完結篇。

「一狍四吃」是鄂倫春人逢年過節，所能享受的絕佳傳統風味餐。既能懷舊，又能沐浴於森林芬多精中，<sup>9</sup>領略原始風情，是款待外來貴客時的第一選擇。通常此菜一出，總能賓主盡歡，不醉不歸。<sup>10</sup>

### 叁、結語

許多人對清朝時的人名，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像是納蘭性德、福康安、和珅等，讓人感覺四平八穩，福祿壽喜。或是電視裡的「還珠格格」、「如懿傳」、「甄環傳」等清宮劇裡的人名，如詩如畫，個個美若天仙。

其實清朝初期的人名，大多俚俗，且充滿野性。像是太祖努爾哈齊的祖父名為「覺昌安 giocangga」，<sup>11</sup>「覺」的意思正是「狍子 gio」<sup>12</sup>，是當時建州女真，頗常見的野生動物。而清太祖的名字「努爾哈齊 nurgaci」<sup>13</sup>，原本意思是「野豬皮 nuheci」。<sup>14</sup>不過努爾哈齊這個滿語名

<sup>9</sup> 芬多精（Phytoncide）是植物的花、莖、幹、葉，所散發出來的抗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通常帶有香氣。

<sup>10</sup> 鄂倫春人常以禦寒、敬神、解悶、助眠、社交、傳統等理由，美化飲酒的作用。連進入鄂倫春人村屯，都必須先飲下馬酒兩杯，取其「好事成雙」的吉祥意味。傳說清代早期鄂倫春人所飲的酒，以馬奶酒、野柿子酒等自然發酵的過濾酒為主，酒精度數很低，酗酒問題較少。後來東北柳條邊開禁，大量漢族、回族、朝鮮族等遷入東北，以玉米、高粱為主的蒸餾酒出現，酒精度數提高，酗酒才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sup>11</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滿洲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 53[1964]），卷 1，頁 11。

<sup>12</sup>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 63[1974]，初版），頁 168。

<sup>13</sup>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第 1 版），頁 1146。

<sup>14</sup>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 63[1974]，初版），頁 340。

字「野豬皮」，並不是對他的一種侮辱，反而是對他的一種期待。因為當時在東北地區，人們認為野豬是一種勇猛的象徵。至今鄂倫春獵人還流行一句諺語「一豬二熊三老虎，野豬獠牙最恐怖」，就是明證。當初努爾哈齊的父母在給他取這個名字的時候，看來是希望他能夠像野豬那樣強壯、勇猛。另外曾率領清軍入關的努爾哈齊第十四子「多爾袞 dorgon」，<sup>15</sup>名字的意思是「獾 dorgon」。<sup>16</sup>獾的牙齒極為鋒利，比野豬獠牙更為堅硬，經常與獅子、老虎搏鬥，堪稱天不怕、地不怕，超級凶猛。因此清宮劇所反映的富麗堂皇，往往是清朝中、後期的狀態。清初的關外野性面貌，過於原始，既不好演，也欠雅觀。

前面說過，崇德五年（1640）三月間，太宗皇太極派大將薩穆什喀、索海，往征虎爾哈部之後，陸續收服了許多鄂倫春人，容納為滿族的一份子。因此，後來清宮裡一直保有「吃大肉」習俗，竟與鄂倫春人「一狍四吃」的「煮狍排」、「燉狍粥」，十分相似。<sup>17</sup>可見二族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密切關係。清朝宮廷裡，經常在年節、吉日時祭祖，其中必定有一個儀式性的節目，就是分食白水煮大肉，以示不忘本。按慣例都是全豬下水清煮，不放任何調味料，只許沾著鹽吃。這種儀式，不只清宮，還通令各地駐防旗人，就地舉行。讓平日錦衣玉食的許多滿洲王公貴族，頭痛不已。竟然坐立難安，食不下嚥，視為畏途。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鄂倫春人愛食狍，白水清燉好味道，傳入清廷成祖制，王公看了直想逃。」

<sup>15</sup>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第1版），頁1153。

<sup>16</sup>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臺北市：學海書局，民63[1974]，初版），頁95。

<sup>17</sup> 張華克校註，《清文指要解讀》，（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94[2005]，初版），頁215。在註一八九項下：「大肉指豬肉。滿族祭祀時宰豬分切出來的整塊的供神肉計十塊，煮熟後主人親戚以刀片食，叫做吃大肉。另稱為「小肉 sori yali」的，則為分切剩下的殘餘骨頭、肉碎、耳朵、尾巴等拿進房裡處理再加小米等煮過，供上下生熟人等分食的就叫做吃小肉。」所以鄂倫春人的「煮狍排」、「燉狍粥」，與滿族的「吃大肉」、「吃小肉」可視為同源餐食。

## 中國邊政協會辦理林遙鵬副秘書長 治喪事宜二次臨時會議記錄

### 第一次臨時會

時間：民國 108 年（2019）9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至 10 時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8 號寒舍艾美酒店一樓餐廳

### 第二次臨時會

時間：民國 108 年（2019）9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 號 11 樓美德向邦公司會議室

參加人員：楊克誠理事長（主席），劉學銑常務理事，趙竹成秘書長，張華克常務監事（紀錄）

主席致詞：向各位報告一個不好的消息：長年服務我們中國邊政協會的副秘書長林遙鵬，他和他的夫人 9 月 8 日下午參加了新北市的造勢晚會，一起回家的時候，身體不適，到醫院發現是動脈剝離，進加護病房急救到十一點多，沒有撐過去，令人非常遺憾與不捨。因此通知各位開會安排後續的事情。

討論事項：（略）。

會議決議：

- 一、楊克誠理事長執筆的「悼念林遙鵬先生」文字、圖片，由張華克常務監事負責校對、排版並影印 100 份，攜到板橋公祭會場發放。
- 二、請許麗英小姐接任副秘書長處理財務及會務工作，相關公文資料請馬文吟小姐撥冗協助辦理。另每月加發許副秘書長津貼 4000 元，馬小姐津貼 1000 元。
- 三、中國邊政雜誌因經費考量，自民國 109 年（2020）第 221 期起，改為半年刊。為撙節開支起見，凡大陸學者、教師升等、碩博士學位發表等均暫不給予稿酬。



- 四、同意中國邊政雜誌在澳洲與當地部落格合作上網，另考慮中國邊政雜誌在新加坡設籍以加強吸收通訊會員。
- 五、十月中旬將參加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鎮「海峽兩岸民族地區生態文化和小康社會」會議，由羅中展理事擔任本會窗口，接洽稿件及聯絡事宜，張華克常務監事負責協辦。
- 六、少數民族美食專欄已出刊 34 期，為引進具體成果，可設置出差費列入兩岸交流年度計畫。



左起：許麗英、張華克、楊克誠、劉學鈞、趙竹成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05 巷 10 號 4 樓，劉學鈺。

電話：（02）2219-9314

0921-883325

